

法轮功维权案辩护词汇编

史无前例的法庭辩护 中国律师勇气震撼中南海.....	- 2 -
王博案的辩护词：宪法至上 信仰自由.....	- 4 -
李和平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的无罪辩护书.....	- 13 -
李和平律师：迫害法轮功是滥用公权力的犯罪行为.....	- 25 -
在反迫害中更好的运用法律知识揭露邪恶讲清真象.....	- 26 -
一篇辩护词.....	- 49 -
深圳市高源被非法庭审 律师做无罪辩护（附部分辩护词）	- 55 -
无罪辩护后的反应（附辩护词）	- 57 -
北京律师金光鸿为大法弟子贾文广所做辩护词.....	- 62 -
一位法轮功家属的辩护词.....	- 63 -
七旬夫妇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词.....	- 67 -
一篇未能到庭演讲的辩护词.....	- 71 -
法轮功信仰者乔华荣的无罪辩护词.....	- 74 -
法庭辩护词：真正的罪犯是发动迫害的江泽民.....	- 77 -
浙江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德喜在法庭上的辩护词.....	- 83 -
法轮功学员王孝民妻子的辩护词.....	- 85 -
针对非法判决的辩护词样本（参考）	- 88 -
一篇未能出庭宣读的辩护词.....	- 93 -
太原大法弟子季国媛的法庭辩护词（图）	- 96 -
女儿为父陈百合的上诉所作辩护词.....	- 101 -
一位武汉大法弟子的辩护词.....	- 104 -
内蒙古大法弟子周金鹏法庭辩护词.....	- 105 -
遭非法判刑大法弟子正义凛然的辩护词.....	- 110 -
谢燕益律师对法轮功学员邓小明的无罪辩护词.....	- 112 -
谢燕益：法轮功学员吴从美无罪辩护词.....	- 128 -
谢燕益：信仰无罪-法轮功学员张建平二审辩护词	- 147 -

史无前例的法庭辩护 中国律师勇气震撼中南海

王博一家

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案二审于 2007 年 4 月 27 日上午 8 时半，在石家庄中级法院开庭。六位北京代理律师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邬宏威，在法庭上义正词严的以宪法至上、信仰自由、维护人权的角度，从宪法和立法、司法程序、法律事实的各个层面，为王博案三个当事人做了非常精彩的辩护。场面极其震撼！

这是中国大陆律师界首次有人冲破中共政治禁区，不惧中共威胁，在法庭上用勇气、正义和智慧为法轮功辩护，从法律层面上系统的、全面的为受冤者伸张正义，为全民反迫害留下了伟大的历史见证！

中共如临大敌

开庭当日，法庭内外戒备森严，内有法警，外有公安和防暴警察，而且头一天就有大批的警察在街头游荡、排查。中共女法官魏素贞坐在旁听席，看到有人陆续进入法院旁听，到法院大厅呵斥法警“为什么放这么多人进来，外面的公安是干什么吃的”。之后，有三名法轮功女学员很快的被绑架，塞进警车拉走，其中一人高声抗议警察绑架，还有一人高喊“法轮大法好”。

律师当即向法官强烈抗议称，公开开庭，27 人办理旁听证，为何只准几人进场，法官心虚下，又放进几个人，王博亲友总计有 8 人旁听。

除此外，旁听席上还有一些法官和中共官员及值勤的警察，另有石家庄市电视台在录像。

当三辆警车押送法轮功修炼者王博一家三人到法庭时，戒严的警察不下 600 人，法院门口的整条街道戒严，在便道和快车道两边警察组成双排人墙。如临大敌！

警车通过后，石家庄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还现场抓走了一个正在拍照的法轮功学员吴磊。据悉，开庭结束后，被警察抓捕人员陆续被放回家，但仍有人被扣押。法轮功学员吴磊至今未放。

一身浩然正气

王博的代理律师李和平当庭宣读了六位律师为王博、刘淑芹、王新中的“宪法至上 信仰无罪”联合辩护意见。李和平律师一身浩然正气，为维护法律的尊严慷慨陈词，期间曾多次遭遇法官的无理打断和威胁，李律师不为所动。

当李和平律师回答信仰法轮功属于信仰自由的范畴时，中共法官刘斌称李和平有“思想有问题”，检察官岳昆仑更是发出威胁。王博与其母刘淑芹当庭抗议“不许威胁我的辩护律师”。据目击者称，刘斌、岳昆仑被李律师驳得理屈词穷，气急败坏。

辩护律师们，各展风采，从不同角度就王博案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司法程序错误等做了全面的辩护。邬宏威律师更从法理人情的角度，就刘淑芹在大冬天依然被迫穿着单衣之情景，谴责迫害，入情入理，令现场一些法官亦为之动容。

法轮功学员王博及母亲刘淑芹、父亲王新中还当庭揭露一审法官和警察的犯罪行为，陈述他们三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如毒打、体罚、威胁、恐吓。同时还表示了他们对法轮功信仰以及他们反迫害的坚定立场。

光天化日之下暴行

由于中共当局施压，滕彪律师没有参加辩护，但仍坐在旁听席上表达关心。退场时被一群法警围殴，并像拎小鸡一样扔到法院大门外的便道上后，扬长而去。期中还有两个 20 岁左右的小法警充满仇恨的对滕彪律师拳脚相加。滕彪律师一身是土，西服袖子撕扯下大半，只剩少部分相连，随身物品不知去向，电脑包被好心人从警察手中夺回并归还。

滕彪是法学博士、著名学者，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曾经上书人大取消收容制度，被评为 2003 年度全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获 Gleitsman Foundation 社会成就奖。

在石家庄中级法院法庭内外，众目睽睽之下，这一群穿着制服的中共法警，在中共法官和警官的默许下公然施暴，让民众“大开眼界”。——光天化日之下都这样，背着人的恶行该是怎样的残暴。

勇气震撼中南海

庭审快结束时，从法庭内列队跑出 600 名左右的防暴警察，站成双排人墙，从法院门口开始，将法院前的整条街道戒严，法院内外还有很多流动法警和便衣。一直等候在法院外的法轮功学员突破警察的阻拦，和所有的辩护律师热烈握手，并对律师们顶着压力为法轮功辩护、为王博案辩护表示感谢、问候和敬意。

李和平等六位中国大陆律师公开为法轮功学员辩护，为被中共指定为镇压和打击的对象辩护，这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的历史上还是首次。据悉，律师们的勇气震撼中南海！

然而，对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了解，以及对法轮功学员坚持真理的钦佩和感动，却又是律师们勇气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据悉，当了解到王博一家不幸的遭遇，以及他们依然坚定信仰，抵制对法轮功的迫害，北京这六位正义律师被深深打动了，他们终于答应代理王博案件。因此，尽管在律师办理手续的第二天，中共北京司法局就找上门表示“关注”，紧接着中共北京国保警察大举施压，甚至以开除公职相威胁，李和平等律师最终还是站在了中共法庭内的辩护台上！

著名法学家、学者袁红冰日前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2007 年特别精神信仰奖》颁奖辞中指出：“面对比法西斯更为凶残的中共暴政，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以坚忍不拔的意志，维护自己信仰权利的行为，证明了一个真理，强权没有能力战胜精神信仰。面对惨绝人寰的政治大迫害，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以和平而又英勇顽强的方式对暴政的抗争，正在赢得历史的尊重。”

王博案的辩护词：宪法至上 信仰自由

2007 年 4 月 27 日上午 8 时半，石家庄法轮功信仰者王博案二审在石家庄中级法院开庭，六位北京代理律师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藤彪、邬宏威，在法庭上 义正词严的以宪法至上、信仰自由、维护人权的角度，从宪法和立法、司法程序、法律事实的各个层面，为王博案三个当事人做了非常精彩的辩护。

这是自 1999 年 7 月中共开始血腥迫害法轮功信仰者以来，中国大陆律师首次以群体身份为法轮功信仰者做无罪辩护。同时也是继高智晟发表三封公开信之后又一爆炸性事件。中共当局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指使其豢养的法警对藤彪律师当场大打出手，以泄其恨。

他们的这份当庭宣讲的辩护词从此成了中共当局绞尽脑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加以封杀的对象，唯恐其将中共的罪恶再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然而它们的这一切努力再次落空，这份属于公共的辩护词终于闯出牢笼，成为中共邪恶的铁证！在此向所有冒着性命安危把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平安传递到海外的正义人士表达我们的衷心感谢！

丁柯

2007 年 8 月 6 日

现将原文公布如下：

宪法至上 信仰自由

为王博、王新忠、刘淑芹案联合无罪辩护意见

我们是，北京市高博隆华事务所李和平、黎雄兵律师，北京市国纲律师事务所张立辉、李顺章律师，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腾彪律师，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邬

宏威律 师，受韩岭荣女士的委托，分别为韩岭荣的外孙女王博，女婿王新忠，女儿刘淑芹辩护，鉴于我们的委托人相同，被告人是整个家庭的三名成员，被告人都有法轮功 信仰者的身份，并因同一组事实同一个罪名被起诉判刑；同时基于辩护人对宗教信仰自由之于政治、道德以及维系人类自由和幸福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基于辩护人对当下中国必须将信仰自由这个话题从宗教和政治这两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移放到更为审慎更为理智的法律平台上考量的期待，我们联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一部份：重申本案涉及的普世原则。

一、 我们重申本案涉及到的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人 类作为整体，有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作为个体，人类需要心理、情感、精神的慰藉和灵魂的生活。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际遇、文化滋养和生命体验，产生了不同的 宗教信仰。我们认为，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力，是一个人保持人性发展和生命完善的重要条件；信仰的权利，就像生命的权利一样，不证自明。公民信仰自由 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始于公元 313 年罗马领袖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共同签署的《宽容诏书》《米兰赦令》。它第一次规定，信奉各种宗教都享有同样的自由，不受歧 视；但人类经过了极为艰苦的奋斗、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终于在近代把信仰自由确立为一条普世规则。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 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 仰的自由。”1987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受到压制，而有损其选择宗教 或信仰之自由。人人有表明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所规定以及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 须的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6 条也明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

无疑，宗教信仰自由涵盖三个维度：第一，宗教自由原则，即作为公民 信仰的对象，宗教本身有生存、发展的自由；第二，信仰自由原则，即公民对各个宗教有选择信与不信的自由，及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第三，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团体、党派、组织、个人，包括宗教都不得采用暴力或其它侵权手段干涉公民信仰何种宗教、信与不信的自由以及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 践，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三者不可或缺，不可分割。“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这三个词在习惯用法上可以相互代指。

我们 认为，信仰自由意味着允许个人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形式，既可以选择公认的大的宗教，也可以选择较小的、新兴的宗教；既可以选择已有的教派，也可以创立一个 新的信仰体系；既可以是无神论，也可以是有神论、多神论或怀疑论。信仰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或者信仰上帝、真主等等，它们和信仰关公、悟空一样，都属于 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同时，公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各种宗教活动，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公民一旦没有参与宗教实践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宗教 信仰自由就是一纸空文。

二、 我们重申本案涉及到的政教分离原则

世界历史上，在政治尚未开化的朦胧时期，宗教与政权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宗教被立为正教，另一些则贬为邪教、异端；有的被立为国教，另一些则惨遭打压、取缔；有些宗教干脆与政权合二为一，对其它宗教一概斩尽杀绝。随着政治文明的进展，信仰自由最终被确立。由杰佛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宣称：“信仰什么宗教，是上帝赋予人的天然的权力，不受他人的强迫，如果允许政府把权力伸张到信仰领域，由官吏作主，那就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信仰自由”；杰佛逊对政教合一的历史进行了批判：“认为自己的信念和思考方式是唯一真实和永远正确，而且仗势强加于他人，建立和维持一个错误的信仰，这种情形已经发生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历经全部历史时期”。杰佛逊提出并完善了政教分离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现实政治。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相互没有统领和依附的关系，它从理论上斩断了两只手：一只是教会伸向政权的手，任何教会休想用设立国教的形式攫取世俗权力；另一只手是世俗政权伸向宗教的手，统治者休想利用教会干涉人民信仰自由，用信仰增加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政教分离原则的提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它的最终实施，建立了一道政教分离之墙。它意味着，信仰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宣教者无罪，信教者自愿，任何势力无权干涉。说到底就是人们有信邪教的自由，至少是信了“邪教”也不会失去人身自由。可以说“邪教”在这个世界占了多数，这可以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导出：每一个教派都宣称自己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那剩余的靠谬论建立的教派当然是“邪教”了。在无神论者眼里，所有的有神论都归于邪教了。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再没有任何一个声称厉行法治的国家政权还有权宣布他喜欢的宗教为国教；同时，它也丧失了宣称一些他不喜欢的宗教是邪教的权力。因为一旦政权有认定正、邪教的权力，一神论宗教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多神论宗教是邪教。反之，多神论信仰者掌握的政权就有可能宣称一神论宗教是邪教。而无神论宗教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所有的有神论信仰是邪教，信仰自由根本没有任何保障。

我们认为，信仰乃是一个人的内心的选择和私人的生活，是公权力不应涉足的社会私域，政府绝无理由介入灵魂的事务。政府既无权力确立一种全民的信仰体系（如马克思主义），也无权评判或取缔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中国要成为受人尊敬的负责的国际家庭的一员，应该信守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践行普世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各个宗教、教派间保持中立，不高抬任何宗教，也不歧视任何宗教，更不对任何宗教扣“邪教”帽子，也不对任何宗教的信众进行不公正对待，停止对信仰自由的粗暴侵犯和干涉。我们认为，当下，关于制裁邪教和取缔法轮功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三、 我们重申本案涉及到的“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刑罚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

任何初通刑罚的人士都会知道，在刑法领域，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宗教信仰是属于思想层面的，它不应受刑罚处罚，更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宗教信仰

而遭受不公正对待。信仰本身或者信仰者的身份不是犯罪的处罚对象，不受刑罚惩治。

有人问，日本政府不是取缔了奥姆真理教这个邪教吗？我们的回答是，日本官方并没有称奥姆真理教是邪教，并且这个宗教仍然合法存在。1993年3月，东京地铁遭受沙林毒气攻击，12人死亡，5000人受到不同程度伤害。教宗麻原弘晃是杀人主谋。麻原还涉及其它几起毒杀谋杀案，共计27条人命。案件共经历了7年10个月，开庭257次，2003年2月结束一审，宣称以麻原为首的12名凶犯被处死刑……。就连这样一个鼓吹暴力，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宗教，1997年1月，日本最高司法部门也否定取缔奥姆教的动议，隶属于日本法务省的公安审查委员会在2000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中称奥姆教为“实行过无区别的大量杀人行为的团体”应予以“观察处分”，日本实际上承认了奥姆教的继续存在的合法性。

对这样的宗教国家就不管吗？也不是的。1999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打击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两个方案，即《关于对实施大规模滥杀行为的团体进行限制的法案》和《破产特例措施法案》。前者要对“曾肆意进行大规模滥杀的团体加强监控，后者则用经济手段对其进行惩罚。这两个法案都没有出现取缔邪教，或者禁止教徒维持信仰的文字。——难道日本不清楚奥姆真理教的危害吗？是立法机构想遗留祸根让东京再来一次混乱吗？显然都不是，而是他们更清楚的知道公权力运用的界限。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之罪；到了信仰这一精神层面，政府和法律已经管不到了。很显然，有些信仰会扭曲或背离了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以恶为善，杀人有理，蔑视人权。但是，只要它没有进入犯罪或预谋犯罪的刑事制裁领域；或者虽然犯过罪，但已治罪，目前也已经停止犯罪；在这些情况下，行为已经越出刑法领域，只能加强监督，这是现代法制观点。

对于某些离经叛道的教义，也只能由社会的舆论和公德去制约，通过批评和思辨，凭藉信徒的自由意志，自愿予以纠正。杰佛逊针对一些人唯恐正道不行、邪教祸世的忧虑，有一段名言：“真理是伟大的，如果让她自行其道的话，必然会盛行于世。真理是谬误的强劲克星，她无所畏惧，所向无敌，惟有害怕人们解除她的天然武器——自由地论争和思辨；当批判被允许自由进行的时候，谬误也就没什么可怕了。”人是社会的主体，需要参与社会、参与历史、自由地接受信息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他的生活将缺少尊严；他的人性就得不到充分发展。信仰自由要真正实现，就必需表达自由存在，这已经是现代人文精神的一部份。

现在的奥姆教，由原来1万多人锐减到900余人，改教名“奥姆”为“阿莱夫”（Aref）。主张暴力，几十条人命在身的奥姆教，日本立法及司法部门尚无权认定其为邪教；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却被作为邪教来取缔和镇压，实在没有道理。

第二部份：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理解

从宪法层面看，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已经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立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和承认在人权问题上的责任。信仰自

由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是中国法律体系中对宗教信仰自由所作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保护，基本上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标准相同。当其它各种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规定的具体措施企图威胁信仰自由时，宪法 36 条也成了信仰自由的最好的庇护所。

中国《宪法》第 36 条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每个公民都享有自由自在地信仰或者不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权利，甚至是信仰魔鬼的权利或者崇拜任何偶像的权利。只要该公民没有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执法机关就不能以任何形式对拥有上述信仰的公民采取限制或干涉他的自由信仰。即使公民有违法犯罪行为实施，法律惩罚的对象也不是该公民的信仰内容，而是该公民的具体犯罪本身。

第二，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都无权对任何一个公民的信仰内容进行法律上评价并以此评价作为限制或干涉公民信仰自由的依据，这是文明社会所通行的信仰自由理念。

第三，宗教徒设立聚会场所不需要经政府机关批准。因为宗教信仰纯粹是社会公民的精神情感活动，法律只能管束人的外在行为而不能去窥视人的内在精神和情感。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介入并对公民的信仰内容进行评价，对其活动行使世俗法律的“许可权”。

第四，公民有传播宗教信仰的自由，信仰者（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从事传播宗教信仰内容的权利无须获得来自政府机关的“许可”就可以自由行使，除非信仰者的行为触犯了法律的规定，而被触犯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符合宪法的规范和原则精神才是合法有效的。

第五，宗教教徒有权出版有关他们的信仰内容的材料而不受审查、批准和禁止。这同时也是中国《宪法》第 35 条宣布的出版自由。

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国家机关执法人员缺乏宪法意识，在实践中并没有尊重宪法的这一规定；公民信仰者遭受来自执法机关经常性的侵权行为比比皆是。尤其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严重背离了宪法确立的信仰自由的原则。把仅仅是传播信仰、印制宗教书籍、说明真相、游行抗议、悬挂标语等传教行为或表达思想的行为当作违法犯罪行为来处理，造成了相当普遍的冤案错案。以本案被告为例，第一被告王博仅仅因为在天安门帮助他人打横幅就被劳动教养三年。（见《劳动教养决定书》，案卷 159 页）王博的妈妈刘淑芹仅仅因为散发法轮功传单、喊一句法轮大法好就被劳动教养三年。（见《劳动教养决定书》，案卷 160 页）本案中，王博和她的父母，仅仅因为录制了讲述自己受不公正对待经历的光盘、写了几篇文章、下载了一些法轮功资料、印制了一些传单就被指控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犯罪”并在一审中判处长达 5 年、4 年、4 年的有期徒刑！（见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据案卷材料显示，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家里藏有法轮功书籍或光盘、仅仅因为电脑里存有法轮功资料就被关押、强制洗脑、劳教或判刑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些做法明显与中国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严重抵触。

第三部份：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高压手段违宪，效果适得其反。

三 被告人均系法轮功信仰者，中国有关方面称“法轮功”为邪教，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法轮功的本质是宗教（我们暂且不考虑他对这个宗教正邪的定性）。我们认为，宗教是一种思想意识，它一旦产生，便如同人出生之后就有生命的存在一样，它的存在是一种事实，并不以法律的承认为前提。信仰自由，包括法轮功宗教本身的生存、发展的自由及公民选择信仰已经存在的法轮功宗教的自由。由于实施宗教自由的宪政国家没有认定邪教的权力，实施宪政的中国，从法律上讲已是不可能出现邪教这个称谓的（如果有，这个称谓也是违宪的，非法的）。

从世界范围看，法轮功在全世界传播，除中国大陆外，没有任何国家宣布它为邪教，禁止它的传播，对比鲜明，民众难免疑问：难道中国大陆的信仰自由原则与其它宪政国家不同吗？到底谁的标准有问题呢？如果中国有关方面仍然不改正说法，恐怕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宜的理由。

我们认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高压政策不但违反了普世原则和中国宪法，而且从实用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法轮功原来在国内允许自由存在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影响有限的宗教；但是，自1999年对法轮功采取高压手段以来，不但没有制止它的传播，反而使其影响力扩大到世界范围，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从历史上来看，政治朦胧时期，对宗教、思想进行镇压和不公正对待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尽管过去的一千年历对各种“异端”的迫害不遗余力，但没有一种“异端”思想、哲学或教派被消灭。烈火、枷锁和刑具从来不能迫使人们放弃或改变信仰。无论是宗教裁判所的鞭打和火刑，还是法西斯和极权政权的强制洗脑，都无法摧毁人们内心和灵魂的选择。政治压制只能把宗教运动变成现实的社会运动，激烈的镇压除了制造政治恐怖气氛和人道主义灾难以外，也会制造激烈的社会政治运动。

强迫法轮功信仰者改变或放弃信仰，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带来的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人人自保、谈法轮功而色变，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清洗人们内心信仰的企图，既超出了政府的合法权限，也超出了任何世俗政权的能力。辩护人认为，我国政府应该检讨一下前期政策，适时做出调整，尊重普世原则，尊重宪法，践行宪法，在中国早日落实信仰自由原则。

第四部份：中国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惩治依据本身与宪法及法治精神相悖。

中国公开颁布的关于法轮功的一系列文件包括：

《刑法》第300条；

1999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

功组织为非法组织。

1999 年 7 月 20 日，公安部决定取缔法轮功的通告。

1999 年 10 月 26 日报载，江泽民主席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正式公布“法轮功是邪教”。

1999 年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

1999 年 10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1999 年 10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一”）。

2001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二”）。

2005 年 4 月 9 日，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述文件可分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如江泽民主席的谈话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第二种情况：因违宪无效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5 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和宪法相抵触。如《刑法》第 300 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因违宪设立了对所谓的邪教进行定罪处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与宪法第 36 条相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

第三种情况：司法解释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立法法》第 8 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即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来设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1 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司法解释只能针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的问题进行。可见，解释是对某一种法律进行说明，而绝不能脱离法律文本创制法律。同时，这种说明也不能侵入立法解释的领域，根据《立法法》第 42 条的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而“两高”对所谓邪教问题的解释，扩大了刑法的范围，涉及到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越权；同时“两高”有关法轮功是邪教组织的司法解释也违反了我国宪法的信仰自由条款。

第四种情况：部门规章违反《宪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民政部有什么权力宣布一个宗教组织为非法组织？公安部对宗教的传播实行禁止措施，它的权力从哪来的？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安部更宣布了十四种宗教为邪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 7 种：分别是 1) 呼喊派；2) 门徒会；3) 全范围会；4) 灵灵教；5) 新约教会；6) 观音法门；7) 主神教。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有 1) 被立王；2) 统一教；3) 三班仆人派；4) 灵仙真佛宗；5)

天父的女儿；6) 达米宣教会；7) 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我们要问，公安部颁发这两份文件的权力依据何在？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认定？是否向被认定对象进行了告知？是否允许被认定对象申辩？如果允许申辩，具体程序是什么？由哪个机构受理？因此民政部一份文件、公安部的两份通知，属于越权，同时违反宪法第 36 条。

在这里还需指出：

（一）把《刑法》第 300 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两高司法解释一”第 1 条（“刑法第 300 条中的‘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它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同《宪法》第 36 条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公民的宗教信仰内容进行了“法律评价”。“邪教”是个信仰领域的宗教词语，不应被应用到立法和司法领域而成为“法律词语”，同时，中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邪教”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相抵触。按照上述邪教的定义，包括共产主义信仰在内的任何一种信仰，都可以对号入座，难逃“法网”。

（二）在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对“邪教组织”的定义中，“冒用宗教…名义”和“迷信邪说”这两个概念是比较模糊抽象的非法律语言，特别是“迷信邪说”更是一个无法从法律上进行明确性的词语，这样的非法律词语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必将宗教信仰自由置于执法人员随心所欲的自由裁量权所编制的侵权罗网之中。

由上可知，目前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的一系列惩治行动没有合宪的法律依据，应当予以停止。

第五部份：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过激、违反，有些行为构成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在自己的法定职责范围里履行职务，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如果超越了职权，或者所作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则视为越权行为，属个人行为，与职务无关。中国《刑法》第 251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案卷材料，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包括：监视、跟踪、窃听、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法轮功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对一个遵纪守法的信仰宗教的公民采取上述措施，无疑都是违法的，情节严重的应负刑事责任。同时，由于“转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此种方式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也是非法的，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劳教制度本身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制度本身没有合法性，依据无效的法规限制公民的自由，也是非法的，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对法轮功案件的实际侦查和审判过程往往存在着大量瑕疵，比如对律师介入法律案件的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未受尊重、未做到审判公开、各地 610 机构对司法机关的不当干涉（本案就是省防保办、市公安局的批示而立的案）、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等。辩护人认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了运动式的、过于激烈的惩治行动，违背起码的程序正义，有些行为构成违法甚至犯罪。辩护人认为，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刑讯逼供可能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这明显违背了中央倡导的依法治国原则，违背了和谐社会理念，也与国际人权准则和历史

潮流背道而驰。我们亦认为，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刑讯逼供违反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构成犯罪。辩护人再次提请法庭注意，本案三个被告都曾经受到刑讯逼供，并因他们不放弃信仰受到过严重不公正对待。

第六部份：对王博、王新忠、刘淑芹案的具体辩护意见

一、所谓的犯罪事实如下：

1、被告人王博自述自录的《被恶党欺骗、洗脑、及利用的经过》视频文件，并上传“明慧网”，被编辑录制成明慧焦点《焦点访谈背后的残忍和欺骗》，在明慧网播放。

2、被告人王博、王新忠、刘淑芹从网上下载法轮功传单 360 份和书籍 80 本、制作光盘 26 张，刘淑芹向高藏双家散发法轮功传单一份；

3、被告人王新忠、刘淑芹拍摄、存储悬挂于大连市虹岗路 557 号华春堂药房的“天灭中共快退党”的现场照片。辩护人认为，认定上述行为是犯罪事实，实在荒唐：王博自述自录自己的生活遭遇，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她上传到“明慧网”，也是公民应有的表达权利，作为法轮功信仰者，谈论法轮功信仰是她的权利；作为《焦点访谈》节目采访的当事人，王博认为报导不实，并认为有责任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个澄清真相的行为竟也处以刑罚，这是极不公正的。对于第二个所谓的犯罪事实，也实在有违常理，当今社会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全球信息共享，每一个上网的人，在不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况下，都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文章、图片进行上传、下载、保存及互相交流。作为法轮功信仰者，王博一家同样具有这些平等权利！第三条罪状更是超乎想像，用照相机照相，是公民的正常生活的一部份，没有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处理，有违法理！这些将公民的正常的信仰形位或日常生活的琐事认定为犯罪的判决是荒唐可笑的。

（限于篇幅，本部份的展开详见各辩护人分别提交的辩护词）。

第七部份：结论

地球上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知识的渴求、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对正义的求索，对意义的追问，这些问题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同的进路，人们得出的答案也各有不同；立足于说明全体、解释普遍真理的宗教不仅成为人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也是人类人人迟早要面对的永恒主题。由于宗教间的差异，加上一些宗教对信众的排它性要求，宗教与政府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宗教信众之间，宗教内部各支派之间极易产生冲突和纠纷；历史上，这些冲突和纠纷引发的暴力流血比比皆是，政府和教会曾经对各种“异端”采用高压政策，结果是没有一种异端思想、异端哲学、异端观念被消灭，甚至还多次出现开始的“异端”成了后来的正统，而开始的正统，后来被指为异端的翻转；经验表明，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处理宗教问题必须遵循普世的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宗教自由原则、信仰自由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它是一切实行信仰自由原则的法治国家必须遵守得铁律，这一原则也为我国宪法所确认。诚然，我国要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落实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政府落实宪法的诚意和广大公民的努力。

本案中，王博一家是中国普通的公民，他们只是在践行自己的宪法权利而已，是受法律保护的，不够成任何犯罪。本案看起来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实际上也是一起不寻常的宪法案件，一个关涉公民信仰自由的大案。如果抛开宪法，只在法律法规层面考虑问题，就会出现合宪的行为受到违宪道德法律法过的惩治，形成“政府放火不是罪，百姓点灯要判刑的”的不公正局面。——请各位尊重公民们的宪法权利，也正确地面对自己的历史责任，敢于直面真相和自己的良知，做出本案被告无罪的公正判决。

我们重申，王博、王新忠、刘淑芹践行宪法权利无罪，坚持信仰无罪，传播信仰无罪，宣讲自己的苦难遭遇及澄清事实无罪！我们相信，所有关心自己宪法权利的中国公民都在期待本案的公正判决！

此致！

北京市高博隆华事务所李和平、黎雄兵律师
北京市国纲律师事务所张立辉、李顺章律师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腾彪律师
北京市海铭律师事务所邬宏威律师

2007年3月31日

李和平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的无罪辩护书

【大纪元 2012 年 03 月 04 日讯】（编者按：2007 年 11 月 3 日至 8 日，刘锡铜先生在青岛市出版艺术馆成功举办了为期六天的书法艺术展。有上千人参观了这一展览，青岛电视台，青岛早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作了报导，并得到一致好评。由于《青岛早报》在开展的前一天即做了报导，青岛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610 办公室（注：1999 年，江泽民为了镇压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凌驾于中国宪法、法律、司法系统之上的特别党务机构。）和政法委得知消息后，指使青岛市公安局、文化局等部门在刘先生布置会展时就对刘先生及主办单位加以威胁，要求撤销书展。开展当天，许多特务、便衣在展馆内活动，门口甚至还有便衣对来参展的市民说：“里面都是法轮功，别进去了。”2007 年 11 月 12 日早晨 8 点钟左右，刘锡铜先生及夫人被绑架，同时遭非法抄家。）

下面是大陆著名人权律师李和平、郭少飞为刘锡铜一案一审时做的无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刘锡铜家属委托，北京市 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们担任刘锡铜的辩护律师，鉴于被告人刘锡铜是中国著名书法家和法轮功信仰者，有思想创作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同时鉴于中国“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本身违宪但仍普遍适用的现实，本辩护人将从实务与法理两个层面对刘锡铜作无罪辩护。

一、本辩护人假定违反宪法，违反立法，违反人类良知和理性的下位恶法可以被执法者选择性适用，公民也必须无条件遵守，在此假定前提下，我们就刘锡铜行为做无罪辩护。

就李沧区检察院的指控，我们认为刘锡铜行为并不符合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构成要件。

（一）刘锡铜不具有该罪的主体特征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规定对待法轮功修炼者应以教育为主，只惩办极少数构成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人员。

刘锡铜作为法轮功信仰者虽然笃信法轮功，坚持修炼。但刘锡铜只是一个信仰者而已，只是以自己的行为去践行自己的内心确信，他既没有积极地在社会上摇旗呐喊，也没有对外主动地影响他人，而是在私人空间修炼、学习。刘锡铜不是法轮功组织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骨干成员。

在 1999 年，社会有资料显示法轮功信仰者达 9000 万以上。法轮功信仰者的动机都很单纯，完全是为了祛病健身修身养性，主观上没有反对现行体制的政治目的。其中许多法轮功学员，正是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不愿唯利是图，能坚守住做人良知的离退休或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

刘锡铜 与其他众多中国公民一样学习、修炼法轮功，被法轮功教义吸引，通过自己的修炼感受到法轮功的益处，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境界，与刘锡铜内心固有的对“真善美”的追求产生了共鸣，而刘锡铜深深认同法轮功信仰。刘锡铜没有因修炼法轮功教唆别人犯罪，没有组织、策划行为，也没有利用法轮功组织，只是基于自己对法轮功的认识和理解在家中修炼，只在自己的内心与思想深处以法轮功教义为指导修身养性，追求“真、善、忍”。刘锡铜修炼之根本目的是追求善与美。

刘锡铜作为法轮功信仰者的个人属性非常明显，他没有组织特点，没有与组织的联络，尤其在 2003 年后，因身体原因、事业需要，刘锡铜把主要精力投入书法创作。虽然刘锡铜没有间断法轮功的修炼，但其法轮功信仰活动完全局限在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和社会公众没有任何消极影响，更没有破坏国家法律，没有参与任何组织，更没有利用任何组织，根本与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人员无关，若认定刘锡铜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成立，则完全违背了全国人大决定的精神实质。

（二）刘锡铜不具有该罪的主观要件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利用邪教组织进行破坏法律、行政法规的活动而有意识地去做。该罪“行为的目的一般是煽动他人抗拒法律实施，不具备此目的，不构成此罪。”刘锡铜主观上不具有这一目的。

首先，刘锡铜认为法轮功指导信众从善行善，修身养性，不可能是邪教。刘锡铜把对善的追求作为其修炼的根本和唯一目的，不认可关于法轮功是邪教的论断。

其次，刘锡铜修炼法轮功没有抗拒法律实施的目的。刘锡铜修炼法轮功的行为无论从方式、空间、社会影响等角度看，都局限在私人领域，这种私人领域局限在其身体、头脑及其赖以生存的住宅等范围。他只是在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正确的事情，从来没有影响他人，也不准备影响他人。

刘锡铜的行为是思想自由的表现。思想自由的含义不单是纯粹的大脑活动，思想在私人领域的表达自由也是其应有之意。法律应规制行为，而非思想。思想者在私人领域把自己的思想外化为日记、手稿、文字标记、电子数据或其他可视形态，若法律仍对其定罪量刑，则是对思想自由的严重侵犯。刘锡铜是一个思想者、信仰者，他把思想活动局限在个人家庭范围，为了精神生活修炼、学习，没有把思想表达的范围扩大到私人之外，没有对他人造成消极影响，更没有煽动他人破坏法律实施。必须保护刘锡铜作为人应享有的思想自由，因为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要求，是基本人权，不容公权力肆意介入和侵犯。

公诉人指控，刘锡铜送给他人的书法作品包含了法轮功内容。那么，什么是法轮功内容呢？难道法轮功书籍提到的任何语句、词语都属于法轮功内容吗？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佛恩浩荡”都不能出现在其他地方吗？出现了就是宣传法轮功吗？中国许多寺院写有“法轮常转”，这几个字法轮功信仰者也讲，难道讲这些就是犯罪？

刘锡铜作为书法家，其书法作品内容取材广泛，只要是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他完全有权利依据个人的偏好进行取舍，作品内容部份取材于他本人的信仰，这也是其本人的创作自由，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禁止书法家书写某些文字；同时，刘锡铜的创作也是其本人信仰的表达。刘锡铜创作书法作品送人往往是别人求其写字，写字的内容也往往已经确定，其行为具有明显地被动性、消极性特征。刘锡铜作为书法家，他与部份书法爱好者拥有共同的以善为宗旨的信仰，他们书写与接受书法的目的仅仅是更好的修炼，达到真善忍，没有任何破坏法律实施之目的，刘锡铜因其在家中修炼的私人性、封闭性就更谈不上煽动他人破坏法律实施了。人的精神活动及外在表现在私人空间中的行为，如书写法轮功内容的作品、练字、为修炼保存有关资料等，没有煽动破坏、抗拒法律实施的目的，就没有应受刑罚惩罚的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主观故意，依法不能构成指控罪名。

最后，刘锡铜没有主观恶性。刘锡铜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积极实践“真、善、忍”的教义，与人为善，待人宽容，没有任何违法犯罪活动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对有关法轮功性质的不同认识应通过其他手段而非刑事处罚的途径解决。刘锡铜没有仇视社会，仇视人民的行为，没有令刑法得以适用的主观恶性。

总之，刘锡铜主观上没有利用法轮功组织，煽动他人抗拒法律实施的故意，其修炼的唯一目的在于自我的完善。

（二）刘锡铜行为不具备该罪的客观特征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在客观特征上表现为行为人特定的行为及行为对象。而刘锡铜的行为并不符合该罪的行为特征。

1、刘锡铜没有利用邪教组织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首要之意在于，利用一种组织从事或试图从事某种行为。那么，什么是组织呢？根据文义解释的原则，组织必须是集体，是系统，是复数个体的组合。

刘锡铜虽然信仰法轮功，和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认识，但没有形成任何系统性、常规性的组织关系，也不受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权威的领导。这就犹如，一个人信仰一种主义，但不能就此认定该人隶属于同样以该主义为主臬的某组织。二者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主体，不必然存在组织关系。法轮功的信仰者不必然是法轮功组织的成员。前者侧重个体的认知，是后者的主体要素，后者因前者的结构化联结为拥有共同信念的集体。仅仅具备与组织理念相同的思想并不当然成为组织成员。作为法轮功的信仰者，刘锡铜修炼的私人性、封闭性以及与他人联络的非紧密性足以说明其不存在利用组织的行为。

因此，刘锡铜这样一个在私人空间仅仅从事思想活动、信仰活动的人士，不可能利用组织或邪教组织，也没有什么组织或邪教组织让其利用。

2、刘锡铜没有传播法轮功宣传品的行为

根据《关于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的解释》（二）第13条规定，传播，是指散发、张贴、邮寄、上载、播放以及发送电子信息等行为。刘锡铜经常练习书法，并把练习稿堆放在地板上，通常只有觉得非常满意的极少的作品才可能保留。2007年11月12日公安人员在刘锡铜家中地板上搜集的有关法轮功书法作品是刘锡铜练习书法的草稿，是要销毁的。这从作品存放的状态、位置可以证明。如果只是因为练字而被审查定罪，因字获罪，就太过离谱，比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更为荒唐，其严苛程度更甚于一般的舆情控制、作品审查。此外，所谓刘锡铜传播五幅法轮功作品，实际上是刘锡铜在别人求字并选定内容的情况下书写的。案卷第36页辛兆臣称，刘锡铜一般不给人写字，到现在也没有给过他字。而孙虹的两幅字也是孙虹本人向刘锡铜要的，这可由案卷59—62页孙虹的供述证实。

刘锡铜基于他人请求，书写一些佛教、道教及法轮功教义中的警句的书法作品，没有传播的目的。刘锡铜没有向非法轮功信仰者主动送出任何有关法轮功内容的书法作品。在熟人的相求下，书写作品送与他人，这种消极行为难以定性为传播行为。因为传播必须以使公众知悉为目的，以散发、张贴等方式使社会不特定对象获得相关信息的行为。刘锡铜的行为只应他人之请被动做出的，没有使公

众知悉的目的，并且接受者也只是在私宅内使用书法作品。刘锡铜行为的消极性、对象的特定性以及求字者使用书法作品的私人性表明了送字的非传播性；刘锡铜的书法作品也非宣传品，不是为了宣传法轮功而做，只是纯粹的表达信仰的手段，是明志，不是宣传，求字者同样是法轮功信仰者，无需刘锡铜的宣传、感化、指导与教诲。刘锡铜应人之请书写了五幅作品，在数量上也不符合定罪要求。

3、关于从刘锡铜家中搜到的物品的性质与数量

起诉书指称，从刘锡铜家中搜查出法轮功书籍《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转法轮》等共 27 本，法轮功小册子《明慧周刊》等共 110 本，法轮功光盘 160 张，法轮功宣传单 265 张，“法轮常转”等内容像框 2 个，写有法轮功内容的字画 40 幅，法轮功炼功磁带 19 盘，录像带 4 盘，法轮功日历 4 本，贺年卡 2 张，“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漏版 1 个，手抄法轮功材料 28 页，及音频文件 32 个。

针对这些物品，案卷中唯一由刘锡铜妻子刘爱芳签字认可的询问笔录（案卷第 23 页）证实，大部份资料是 1999 年之前购买所得；含有法轮功内容的光盘并没有 160 张，只有四张用来刻录法轮功内容的资料，根据扣押物品清单记录，许多光盘只是程序、mp3、游戏等。在 160 张光盘中数量极少的含有法轮功内容的光盘大部份是 1999 年前购买的，有一小部份是 2007 年 7 月份刘锡铜家可以上网后把下载的音像资料刻入的。通常一个盘可以刻录 700m 的文件，试想把 160 张光盘全部刻录完，需要多少资料？相关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此外，提供鉴定结论的青岛市公安局具有与李沧公安分局相同的所谓反邪教任务。青岛市公安局与李沧区公安分局具有领导关系，并且刘锡铜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是青岛市公安局指定李沧区公安分局主办，青岛市公安局的鉴定结论是非中立第三方鉴定；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非法出版物的鉴定部门是新闻出版主管机关，青岛市公安局没有鉴定的权力。因此，其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证据采用。

上述大部份物品，如书籍、宣传单、画像、像框、磁带等均为购得或获赠所得，不是刘锡铜制作的，也不是用于宣扬法轮功的宣传品。刘锡铜既没有制作足够数量的法轮功宣传品，也没有就上述物品进行传播，不符合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制作、传播行为方式和宣传品数量要求，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刘锡铜的行为不符合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此罪。

二、本辩护人从普世价值、人类良知与理性、宪政精神等层面，论述对宗教信仰进行惩治的规范体系因违宪而无效，对信仰群体进行违宪惩治涉嫌触犯反人类罪，刘锡铜的行为属于宗教信仰，受宪法保障，刘锡铜无罪。

由上文对刘锡铜行为的分析，可以确信刘锡铜行为的信仰性质，若对刘锡铜定罪，即是思想入罪、信仰入罪，将与普世价值、法治精神及我国宪法背道而驰。

（一）对法轮功信仰者定罪违反的普世原则

1、定罪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人类有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人类需要心理、情感、精神的慰藉和灵魂生活，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际遇、文化滋养和生命体验，致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信仰与思想情感。

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保持人性发展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信仰自由，就像生命的权利一样，不证自明。人类经过极为艰苦的奋斗、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终于在近代把信仰自由确立为一条普世规则。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8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规定：

“任何人不得受到压制，而有损其选择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人人有表明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所规定以及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也明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

信仰自由涵盖了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三个维度：第一，宗教自由原则，即作为公民信仰的对象，宗教本身有生存、发展的自由；第二，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即信与不信，信何种宗教，以何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第三，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团体、党派、组织、个人、包括宗教团体都不得采用暴力或其它手段干涉宗教的生存、发展自由，也不得采用暴力或其它手段干涉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

信仰自由意味着允许个人自主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形式，既可以选择信众众多的宗教，也可以选择信众较少的宗教或新兴的宗教；既可以选择已有的教派，也可以创立一个新的信仰体系；既可以是无神论，也可以是有神论、多神论或一神论。无论信仰真主、信仰上帝或者信仰法轮功，都属于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同时，公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各种宗教活动，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公民一旦没有参与宗教实践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一纸空文。

2、定罪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

在世界历史上政治朦胧时期，宗教与政权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宗教被立为正教，另一些则被贬为邪教、异端；有的被立为国教，另一些则惨遭打压、取缔；有些宗教干脆与政权合二为一，对其它宗教斩尽杀绝。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信仰自由最终被确立。由杰弗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宣称：“信仰什么宗教，是上帝赋予人的天然的权利，不受他人的强迫，如果允许政府把权力伸张到信仰领域，由官吏做主，那就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分离原则建立了一道政教“柏林墙”，它体现的人神分野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相互没有统领和依附的关系，它从理论上斩断了两只“手”：一只是教会伸向政权的手，任何教会休想通过设立国教攫取世俗权力；另一只手是世俗政权伸向宗教的手，统治者休想利用教会干涉人民信仰自由，用信仰增加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信仰是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宣教者无罪，信教者自愿，任何势力无权干涉。说到底就是人民有信“邪教”的自由，至少是信了“邪教”也不会失去人身自由。可以说，“邪教”在这个世界占了多数，这可以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导出：每一个教派都宣称自己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那么其他教派的教义就是荒谬的，当然这些教派就是“邪教”了。在无神论者眼里，所有的有神论都应归为邪教了。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再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有权宣布它喜欢的宗教为国教；同时，它也丧失了宣称它不喜欢的宗教是邪教的权力。因为一旦政权有认定正、邪教的权力，一神论信仰者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多神论宗教是邪教；反之，多神论信仰者掌握的政权就有可能宣称一神论宗教是邪教，而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所有的有神论信仰是邪教，信仰自由根本没有丝毫保障。可见，法律如果不能保护“邪教”，也必然不能保护“正常”的宗教。

信仰包括主观、个人属性的价值和无法验证的超验主张，是公权力不应涉足的思想领域，是政府绝无理由介入的灵魂事务。政府既无权力确立一种全民的信仰体系，也无权力评判或取缔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当下中国关于制裁邪教和取缔法轮功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完全偏离了思想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

3、对法轮功惩治违反了“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刑法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

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信仰属于思想层面，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信仰而遭受不公正对待；信仰本身或者信仰者这一身份不构成犯罪，不应受刑罚惩治。

有人会问，日本政府不是取缔了奥姆真理教这个邪教吗？事实是，日本官方并没有定性奥姆真理教为邪教，并且这个宗教团体仍然合法存在。1993年3月，东京地铁遭受沙林毒气攻击，12人死亡，5000人受到不同程度伤害。教宗麻原彰晃是杀人主谋，他还涉及其他几起毒杀谋害案，共计27条人命。案件共经历了7年10个月，开庭257次，2003年2月结束一审，宣判以麻原为首的12名凶犯被处死刑……。1997年1月，日本最高司法部门否决了取缔奥姆教的动议，隶属于日本法务省的公安审查委员会在2000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中称奥姆教为“实行过无区别的大量杀人行为的团体”应予以“观察处分”，日本实际上维护了奥姆教的继续存在的合法性。1999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打击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两个法案，即《关于对实施大规模滥杀行为的团体进行限制的法案》和《破产特例措施法案》。前者要对“曾肆意进行大规模滥杀的”团体加强监控，后者则用经济手段对其进行惩罚。

日本政府没有做出取缔邪教，或者 禁止教徒维持信仰的法案。难道日本不清楚奥姆真理教的危害吗？是立法机构想遗留祸根让东京再来一次混乱吗？显然都不是，而是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公权力的界限。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之罪；信仰这一精神层面的事务，已非政府和法律的管制领域。很显然，有些信仰会扭曲或背离了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以恶为善，杀 人有理，蔑视人权。但是，只要它没有进入犯罪或预谋犯罪的刑法调整领域；或者虽然犯过罪，但已经治罪，目前也已经停止犯罪；在这些情况下只能加强监督，不 得以其存在犯罪记录而强制清除大脑中的信仰和思想，这是现代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

对于某些离经叛道的教义，也只能由社会的舆论和公德去制约，通过批评和思辨，凭藉信徒的自由意志，自愿给予纠正。杰佛逊针对一些人唯恐正道不行、邪教惑世的忧虑，有一段名言：“真理是伟大的，如果让她自行其道 的话，必然会盛行于世。真理是谬误的强劲克星，她无所畏惧，所向无敌，惟有害怕人们解除她的天然武器——自由地论争和思辨；当批判被允许自由进行的时候， 谬误也就没什么可怕了。”人是社会的主体，需要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自由地接受信息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人如果被阻隔了外界的信息、剥夺了表达的空间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他的生活将缺少尊严；他的人性就得不到充份发展。信仰自由真正实现，就必需表达自由存在，这已经是现代人文精神的一部份。

（二）定罪违背了宪政精神

从 宪法层面看，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已经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立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3 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和承认自己在人权问题上的责任。信仰自由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 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是中国法律体系中对宗教信仰自由所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保护，基本上与国际社会通行的 宗教信仰自由的标准相同。当其他各种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规定的具体措施企图威胁信仰自由时，宪法 36 条也成了信仰自由的最可靠的避难所。

极 为遗憾的是，由于国家机关执法人员缺乏宪法意识，在实践中并没有尊重宪法的这一规定；公民信仰者遭受来自执法机关经常性侵害的实例比比皆是。尤其是处理法 轮功严重背离了宪法确立的信仰自由的原则。把仅仅是传播信仰、印制宗教书籍、说明真相、游行抗议、悬挂标语等传教行为或表达思想的行为当作违法犯罪行为来 处理，造成了相当普遍的冤案错案。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家里藏有法轮功书籍或光盘、仅仅因为电脑里存有法轮功资料就被关押、强制洗脑、劳教或判刑的现象，极 为普遍。这些做法与中国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严重抵触。

每一宗教都是一种思想意识，包含一套价值体系和超验主张，它一旦产生，便如同人之 生命一样，是一种事实，并不以法律承认为前提。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了法轮功生存、发展的自由及公民信仰法轮功的自由。从世界范围看，除中国大

陆外，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禁止它的传播。民众难免产生疑问：难道中国大陆的信仰自由原则与其它宪政国家不同吗？到底谁的标准有问题呢？为什么众多国家的认识与中国有如此明显的差异呢？

对刘锡铜这样的法轮功信仰者采取高压政策不但违反了普世原则和中国宪法，而且从实用及历史的角度来看，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法轮功原来在国内允许自由存在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影响有限的宗教；但是，自1999年对法轮功采取高压手段以来，不但没有制止它的传播，反而使其影响力扩大到世界范围，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从历史上来看，对宗教、思想进行镇压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尽管过去的一千年里对各种“异端”的迫害不遗余力，但恰恰是当初被诬蔑为异端的宗教成为当下的主流宗教。无论是宗教裁判所的鞭打和火刑，还是法西斯和极权政府的强制洗脑，都无法摧毁人们内心和灵魂的选择。政治压制只能把宗教运动变成现实的社会运动，残酷的镇压除了制造政治恐怖气氛和人道主义灾难以外，也会制造激烈的社会政治运动。

强迫法轮功信仰者改变或放弃信仰，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带来的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人自危、谈法轮功色变，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清洗人们内心信仰，既超出了政府的合法权限，也超出了任何世俗政权的能力。我国政府应当检讨前期政策，适时做出调整，尊重普世原则，践行宪法，在中国早日落实信仰自由原则。

就实证法层面，中国公布的关于法轮功的一系列文件包括：

1、《刑法》第300条；2、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3、1999年7月22日，公安部决定取缔法轮功的通告。4、1999年10月26日报载，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正式公布法轮功是邪教；5、199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6、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7、1999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一”）；8、2001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二”）；9、2000年5月10日，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述文件可分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如江泽民的谈话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第二种情况：因违宪无效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刑法》第300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因违宪设立了对所谓的邪教进行定

罪处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与宪法第 36 条相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

第三种情况：司法解释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立法法》第 8 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即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来设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1 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司法解释只能针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可见，解释是对某一法律进行说明，而绝不能脱离法律文本创制法律。同时，这种说明也不能侵入立法解释的领域，根据《立法法》第 42 条的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而“两高”对所谓邪教问题的解释，扩大了刑法的适用范围，涉及到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越权；同时“两高”有关法轮功是邪教组织的司法解释也违反了中国宪法的信仰自由条款。

第四种情况：部门规章违反《宪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民政部有什么权力宣布一个宗教组织为非法组织？公安部对宗教的传播实行禁止措施，他的权力从哪儿来的？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安部文件更宣布了十四种宗教为邪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 7 个。我们要问，公安部颁发这两份文件的权力依据何在？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认定？是否向被认定对象进行了告知？是否允许被认定对象申辩？如果允许申辩，具体程序是什么？由哪个机构受理？因此，民政部一份文件、公安部的两份通知，违反宪法第 36 条，应属无效。

（三）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过激、违法，有些已构成犯罪。

1998 年 7 月 17 日在罗马举行的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该规约于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现有 90 个缔约国。该规约第七条关于危害人类罪（一）8 规定：“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第三款界定的性别，或根据公认为国际法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而且与任何一种本款提及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本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结合发生即构成危害人类罪。”该款提到的行为包括：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监禁或以其它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酷刑、强迫人员失踪、种族隔离罪、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等。可见，基于信仰对特定宗教团体迫害构成危害人类罪。

宗教最核心的特征在于超验性，宗教信仰是价值观念上的认可，有一套独特的价值与知识体系，只要相信就行。就如上帝、真主或佛祖，他们面目如何，现在何处，难以回答，可能只在人们心中。宗教属精神领域，处于世俗的政权不宜进入。中国确定邪教没有明确的标准，也没有激辩质疑，只是单方的强势话语。中国虽然没有加入上述规约，但这种没有正当程序、事实依据，一方缺位的判断与认定，已然违背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

国家工作人员负有在法定范围内履行职责的义务，超越职权将受到法律的 惩罚。中国《刑法》第 251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当前，惩治法轮功信仰者的行动包括：监视、跟踪、窃听、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法轮功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对一个遵纪守法的信仰者采取上述措施，无疑都是违法的，情节严重的应负刑事责任。同时，由于“转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此种方式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也是非法的，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劳教制度本身违反宪法和立法法，本身没有合法性，依据违宪无效的法律限制公民的自由，是一种公然违法犯罪行为。对法轮功案件的实际侦查和审判过程往往存在着大量 瑕疵，比如对律师介入法轮功案件的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未受尊重、未做到审判公开、各地 610 机构对司法机关的不当干涉、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等。

辩护人认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过于激烈的运动式惩治行动，缺少对人权的基本尊重，违背起码的程序正义，有些行为构成违法 犯罪；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刑讯逼供 明显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依法治国原则，违背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理念，也与国际人权准则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四）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本身的非法性

1、“邪教”不是一个法律范畴术语，世界各国刑法条文中，鲜见“邪教”一词。

不管是 2500 年前释迦牟尼传讲佛法，还是 2000 年前耶稣宣讲主的道，他们都遭受过当时其它宗教的指责和排斥。正教与邪教之争始终与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相伴，而宗教信仰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决定每一门宗教自称正教的同时很容易贬低或排斥其它信仰，乃至将其归为“异端邪说”。也就是说，信仰之间的孰正孰邪以及如何区分是超出世俗之外的话题，不是世俗的评判标准能够衡量和干预的。

正如耶稣所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一个世俗的政府显然不 适合作为某种信仰属正教还是邪教的区分与评判者。更何况，一个将无神论思想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什么样的信仰是邪教，这显然是有悖常识 且难以让人接受的。从这一点看，中国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使用“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采用各种手段……”这样的描述来定义邪教除了表明该立法因负有反 法轮功这一政治任务而显示出的直接针对性外，无疑也表现出立法者对信仰这一属于神学领域的话题相关知识的贫乏。

刑法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于基本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体现了对人权、人性、公平、正义等人类普世价值的保护。各国刑法条文内容大同小异，这也是由于刑法所要保护的客体的共性决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条文中含有“邪教”、“不好的宗教”或者是“不好的信仰”等类似用语。在众多刑法条文中含有“宗教”、“礼拜场所”、“信仰”等词汇倒是很多，但几乎都是在法条中作为被保护的客体内容（类似于中国刑法第 251 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显示出现代文明国家对信仰自由这一天赋人权的保护。

除刑法之外，从各国立法看，实际上也没有法律意义上通行的国际或者国家标准。法律规范的对象只能是行为，而不能涉及信仰和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单纯针对某种信仰的正和邪进行价值判断并决定是否予以取缔的做法无疑是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行径，早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荒谬的且极具危害性。

2、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名义对法轮功进行打压的非法性

行为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四要件，缺一不可。一则确定犯罪结构的刑法条文，如果没有需要保护的客体，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可做定罪量刑依据的独立法条；一个行为，如果没有侵犯某则刑法条文确定的需要保护的客体，那么这个行为即与该法条确立的罪名无关。我们看一下刑法第300条分别要保护的客体：第二款客体是“自然人的生命权”；第三款客体是“妇女的人身权、自然人的财产权”。我们着重看第一款，即“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从该款内容完全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本意，即为了避免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在施行中遭到基于信仰原因的阻挠而设定。亦即，本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破坏了特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致使达不到立法目的，且情节特别严重。法轮功信仰者的修炼行为没有违反哪部具体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更没有破坏法律实施。

三、结语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知识的渴求、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对正义的求索，对意义的追问。由于不同的进路与回应，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这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差异化的宗教信仰方面。这种差异、加上一些宗教对信众的排它性要求，宗教与政府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宗教内部各派别之间极易产生纠纷和流血冲突。经验表明，没有人能垄断真理，解决宗教问题必须遵循普世的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宗教自由原则、信仰自由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它们是一切实行信仰自由原则的法治国家必须承认与遵守的原则。

本案看似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实际上是一起不寻常的宪法案件，一个关涉公民信仰自由的大案。如果抛开宪法，只在法律法规层面考虑问题，就会出现合宪的行为受到违宪的法律法规的惩治，形成“政府放火不是罪，公民点灯要判刑”的不公正局面。

请各位法官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敢于直面现实和自己的良知，实践法治精神，做出本案被告无罪的公正判决。

此致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和平、郭少飞

2008年05月12日

李和平律师：迫害法轮功是滥用公权力的犯罪行为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明慧记者吴思静采访报道）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李和平律师在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法院为[法轮功](#)学员王三英做无罪辩护的过程中，指出了让旁听的人都感到震撼的事实：即使按中国现行法律来看，修炼法轮功也是合法的。在近日接受明慧记者电话采访时，李和平律师进一步指出，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是对全人类良知的挑战，是滥用公权力的犯罪行为。

李和平律师明确表明，他认为法轮功属于宗教信仰，是合法的：“既然中国的宪法上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就是说，凡是和信仰有关的，比如传播信仰，做一些和宗教信仰有关的活动，我认为都是不违法的。”

根据[明慧网](#)的大量来自大陆的报道，中共法庭在审判法轮功学员时，经常把刑法第 300 条当作法律依据，而李和平认为，这个刑法第 300 条本身就违反法律：“刑法第 300 条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从纯法律角度来讲，‘邪教’这个词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语言，法律没法判断‘邪教’，就是说，你判断一个宗教是邪教，这本身就是违反法律的，就是违反了宪法，刑法第 300 条本身就是违宪的。我认为这条本身就不应该存在。”

中共在[迫害](#)初期曾经出台命令，禁止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李和平律师认为，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已经有一些律师能够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政府干涉的相对也少一些，但是总体上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比如说，给法轮功辩护的律师，有时候年检不能注册，还有受到各式各样的不好的待遇。但是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以前我们辩护的时候，警察就跟着你，经常来找你，包括国保也找你，现在缓和一些了。”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李和平律师被不明身份的人劫持六个小时，其间饱受凌辱毒打，劫匪威胁李和平要么“滚出北京”，要么“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律师，不要掺和一些事情”，并抢走电脑的移动硬盘和办公室钥匙，电脑硬盘也被完全格式化，丢失了大量的资料。作案手段与目的都强烈的暗示此次劫持是中共一手操纵。李和平律师自己估计应该是和他关注高智晟律师有关，而高智晟律师曾经三次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公开上书，曾多次被中共非法逮捕，关押，软禁，至今他全家人仍然在被监禁中。

虽然遭到当局的打压，但是李和平律师并没有改变他身为律师的原则，他说：“现在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不公正确实是怵目惊心，怵目惊心！如果再没有律师起来为他们辩护的话，我觉得从良心上来讲，从做人上来讲，根本就是说不过去的。”

李和平律师认为如果不用法律手段解决法轮功问题，那么中国不可能实现法治：“中国现在说要依法治国，或者说要建设什么和谐社会，如果法轮功的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而是用目前这种非法律的手段，用这种法外的不公正、[酷刑](#)来对待，那么我认为中国也不可能实现法治，也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

他认为法轮功受迫害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的事情，而是对所有有良知的人的伤害：“这[对法轮功的迫害]严重的刺伤了人类的尊严。它的这种不公正是对所有的有良知的人的一种伤害。我觉得，如果一个律师还有一定的良心，还有一点做人的想法，或者说，还觉得人活着应该有一定的尊严，那么他们心里面都会有刺痛的感觉，都希望尽快结束对法轮功的这种不公正对待，尽快结束这种大规模的违法行为。”

李和平律师认为迫害法轮功是“滥用公权力的犯罪行为”。在学术文献中“公权力”被解释为：“国家或国家授权的公共团体对公民的命令强制权力。”

最后他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法轮功群体，他们所面临的不公正是大面积的，是一种非常残酷非常野蛮的不公正，不公平，这个对中国人，对世界人来讲，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对人性的一种挑战。我觉得中国人，不管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阶层的人，都应该关注法轮功问题。因为你只有关心那些最弱勢的群体，你才能够关心自己的利益；保障那些最痛苦最弱勢的人的权益，才能够保障强者的权益，这是相辅相成的。大家不要认为这仅仅是法轮功自己的苦难，我认为它是一种中国人的苦难，也是一种世界的苦难，应该尽快结束，不能够再持续下去了。”

本身是商业贸易律师的李和平近年来参与了不少维权法律活动。他曾经帮助北京律师高智晟为其被取消律师资格的问题申请行政复议，也曾为北京音乐学院学生、法轮功学员王博作无罪辩护。

在反迫害中更好的运用法律知识揭露邪恶讲清真象

文/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4 年 8 月 26 日】近日，许多同修著文建议在反[迫害](#)中增强法律意识，多运用法律知识，揭露邪恶，讲清真象。为了更好的协助大陆大法弟子运用法律知识，揭露邪恶，讲清真象，特撰文如下。

本文目录：

1. 江氏集团利用哪些法律条文镇压、迫害[法轮功](#)
2. 江氏集团镇压、迫害法轮功，违反了哪些中国法律？

- 2.1 违反中国《宪法》的有关条款
- 2.2 违反中国的实体法——刑法
- 2.3 违反了中国的程序法——刑事诉讼法
- 2.4 违反了行政法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 2.5 违反了另一行政法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 3. 大陆同修如何在没有律师的帮助下，自己撰写申诉书？
 - 3.1 向哪一家司法机构投递申诉书？
 - 3.2 刑事申诉书应有哪些部分？
 - 3.3 撰写申诉书时应注意的事项
- 4. 举例说明如何撰写刑事控（申）诉书

1. 江氏集团利用哪些法律条文镇压、迫害法轮功

1.1 江氏于 1999 年 10 月 25 日。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公开宣称“法轮功是危害社会和人民的×教”。作为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氏在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情况下，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法轮功是×教，是一种严重违背宪法的行为。中国大陆 1982 年 12 月 4 日颁布的《宪法》（以下简称《82 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该条第三款还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82 宪法》第八十条 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作为国家主席，应熟知法律，应做遵守法律的表率，而不是破坏法治的始作俑者。

1.2 江氏镇压，迫害法轮功首先利用的法律是于 1999 年 10 月 30 日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但在这个《决定》当中没有一句文字规定法轮功是邪教。而且在该《决定》中列举的邪教组织犯罪行为表现的文字中，如“采用各种手段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以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或者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活动，依法予以严惩。”上述行为中没有一项是法轮功真修弟子所为。而且这些行为也与师尊在[《转法轮》](#)以及其他讲法的宗旨相违背。法轮功倡导的是“真，善，忍”，教人做好人，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做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人。

1.3 江氏集团镇压，迫害法轮功利用的第二个法律是于 1999 年 10 月 30 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属于高法、高检的有权解释，是司法解释。但是从这个《解释》中，明显存在着违法违宪的解释文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 年 7 月 5 日颁布）中，对于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法律的权限进行了明确规定：“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即只限于“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而不能超出此限，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无权对法律，法令本身进行解释。进一步说，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无权对法律、法令的含义和内容进行解释。而对法律有权解释的机构，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82

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四）：解释法律；”但是，在高法、高检的《解释》中的第一条，就对刑法第三百条中的“邪教组织”进行解释为“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这一条文，完全是对法律本身的解释，从而严重超越“具体运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构成违法解释。所以说，高法、高检这一条文是严重违法，违宪解释。不仅如此，在这一条内容中，也有严重违宪的内容，如“神化首要分子”，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信仰主要分两大类：有神论，无神论。对无神论不须多论，对有神论，不同的信仰就有不同的信仰对象。如信仰基督，圣玛丽娅，释迦牟尼，多神信仰的也有，还有信关羽（关帝庙）等等。只不过多数被信仰的对象是不在世了，也有些是在世的。但不论在世或不在世，任何公民均有选择的权利。中国《82宪法》第三十六条及《新宪法》（2004年3月14日）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而且，凡是持有神论者，对自己所选择的信仰对象，大多奉若神明，遵守教义，身体力行。所以说，所谓“神化首要分子”，完全是公民的信仰自由，也是《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高法、高检怎能将此规定为犯罪行为呢？此举真要贻笑后人了。而且当代也有典型的例子可供借鉴。如毛泽东先生。他生前被无数人顶礼膜拜，奉若神明，虽然毛泽东先生本人声称是唯物主义者；去世后，依然被众人供奉，他的照片、像章被挂在室内、车内和衣上，以示虔诚。毛先生的肉身现依然被停放在北京纪念堂中，供人瞻仰。难道高法、高检还要毛泽东先生和千万平民百姓承担“神化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和罪名吗？让我们再进一步分析，“神化首要分子”是人们一种精神心理活动——信仰。但是《刑法》惩罚的是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如果高法、高检能把人们的精神心理活动作为犯罪行为，就不禁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明清两朝的“腹诽罪”，现时，现代的“神化首要分子”可以称为“腹赞罪”了。

高法、高检在《解释》第二条、第三款中规定：“抗拒有关部门取缔或者已经被有关部门取缔，又恢复或者另行建立邪教组织，或者继续进行邪教活动的；”大家知道，“邪教组织”首先出现在中国大陆法律条文中，是在自1997年10月1日实行的《刑法》第三百条中“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此后，就没有见到任何对“邪教组织”的有权解释，即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10月30日颁布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也没有对“邪教组织”进行法律解释，只有高法、高检也于1999年10月30日同日颁布的《解释》第一条中对“邪教组织”进行了违法违宪解释。从这第三款中，我们在逻辑上、时间上推定，所谓“邪教组织”，在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高法、高检的《解释》颁布之前，就有被“有关部门取缔或者已经被有关部门取缔”的事实存在，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有关部门”在《决定》和《解释》颁布之前，又是依照什么法律、哪一条法去取缔“邪教组织”的？这简直就是不打自招的承认“有关部门”确实在执法犯法，而他们法外施威的行为在大陆的确是实际，普遍的存在。而更可悲的是，这种“有关部门”执法犯法的行为，居然被高法、高检当做立法或解释法律的社会现实的依据。

高法、高检在《解释》第二条第四款中规定“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情节严重的；”这一款又是高法、高检违法 违宪解释，而且对刑法三百条又增加了新的内容。略有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刑法第三百条中规定的：“组织和利用”行为，均属于故意的，以作为的方式实施的，而不履行法定义务，是指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具有特别义务的人，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犯罪行为。所以，以不履行法定义务解释“组织和利用”的法律条文，与刑法立法原意相违背，又是一条违法违宪解释。

高法、高检《解释》第三条中规定：“刑法第三百条第二款规定的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是指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蒙骗其成员或者其他成员实施绝食，自残，自虐等行为，或者阻止病人进行正常治疗，致人死亡的情形。”无疑 这又是一条超越权限的违法，违宪解释。如果对“解释法律”理解的权限有疑义。在 2000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对法律的解释权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第四十二条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第四十三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很明显，高法、高检《解释》第三条，是对法条具体含义的说明解释。对造成“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结果的行为，分三组文字进行了解释：1、制造，散布迷信邪说；2、实施绝食，自残，自虐等行为；3、阻止病人进行正常治疗。所以说，高法、高检这第三条又是一条违法违宪的法律条文。既然是违法违宪的，也就是无法律效力的文字，属于应当立即废止，取消的条文。而高法、高检仅仅具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 法律解释要求”的权利。

1.4 江氏集团镇压，迫害法轮功利用的第三个法律文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1999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9 年 11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以下简称高检、高法《通知》）。从两个《通知》的表面看是高检、高法各自系统的行政文件，但在实质上这两个通知具有很重要的 实际司法指导作用。江氏集团为了实现个人私欲，将镇压，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披上合法的外衣，绕过立法程序上的层层限制，以两院行政《通知》的方式，采用似是而非的方法，非法将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使之迫害法轮功的行为合法化。高检在《通知》一，中写到：“《决定》和《解释》的颁布和执行，对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特别是当前打击组织，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进行犯罪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高法在《通知》的总述中写到：“《决定》对邪教组织的性质和危害，对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犯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解释》根据刑法规定，对办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提

供了具体的司法依据。这一重要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依法严厉打击邪教组织，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两院的《通知》中不难看出，高法、高检为了迎合江氏集团的私欲，配合江氏集团镇压、迫害法轮功需要，对《决定》和《解释》进行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改造，均以“特别是”三个字，将“法轮功”非法定为“邪教组织”。貌似仅仅指出重点，实则是处心积虑。因为他们也知道，如果将“法轮功”直接写入《决定》和《解释》定为邪教组织，那将严重违反立法原则，违反事实，会遭到众多人的反对。所以他们先以防范、惩治邪教组织为借口，立法设规，并将一些“莫须有”的行为特点作为犯罪行为写入法条，然后再绕开立法的必要程序和限制，而以司法行政文件的方式，将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蒙骗司法人员，蒙骗全国人民，蒙骗全世界人民。但这也恰恰暴露出他们执法犯法、违法违宪的行为实质。按照他们的《通知》，人们不禁要问，高法、高检依据哪条法律，经过什么样的法律程序，在哪一级法院，由哪个法官哪些陪审员，依据什么样的证据进行审理的，从而认定，判决“法轮功”是邪教组织。结论是简单而明确的，高法、高检的《通知》，是在江氏集团直接授意、指使、压力下，依据江氏集团的意志，利用合法形式，违反法律程序泡制而成的。所以，高法、高检各自的《通知》均属于违法违宪的司法行政文件。

1.5 江氏集团镇压、迫害法轮功利用的第四个法律是刑法。主要是刑法第三百条，该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形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本身没有对“什么是‘邪教组织’进行说明”。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邪教组织’也没有立法解释，只是在《决定》中列举了‘邪教组织’的犯罪行为，如“采用各种手段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

“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以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或者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活动，依法予以严惩。”众所周知，上述诸多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一种是法轮功真修弟子所为。所以，江氏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宁可违法违宪，也要将镇压迫害法轮功的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否则，无法动用公、检、法、司各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江氏绕过立法程序的限制，利用两院，以《解释》的方式，进一步说明解释“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欺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江氏用这一条违法违宪的司法解释，加上两院的各自的行政《通知》，将法轮功非法定为“邪教组织”，然后适用刑法第三百条的规定。

1.6 江氏集团镇压、迫害法轮功利用的第五个法规是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法规由于制定年代较早，其中许多条文均已严重违背《宪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但却依然有效，被江氏集团利用。例如，各地区的“劳动教养管理所”，“劳动教养学校”，“法制学校”，“洗脑班”，均依照此办法设置。其实质是变相的监狱。该《办法》第三章收容审批，严重违背了《82宪法》及《新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

法非法剥夺或者 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而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第十三条规定：“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 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第二十六条规定：“劳动教养管理所的护卫武装由人民武装警察担任。护卫武装的任务 是：（一）负责维护劳动教养场所的秩序和安全，防御外部坏人捣乱，袭击和破坏；（二）协助劳动教养场所制止劳动教养人员闹事和逃跑；（三）配合劳动教养场 所做好护送成批劳动教养人员的工作……”由此可见，该《办法》是一个严重违宪的行政法规。它用“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代替了检察院和法院；用收容代替逮捕，拘留；用劳动教养管理所，教养学校，法制学校代替看守所，监狱，所以说，其劳动教养场所，包括管理所，教养学校，法制学校，洗脑班均是违宪设置的非法 监狱。而且该《办法》对人进行先行收容的非法拘禁或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依据的 1982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 办法》，已于 2003 年 8 月 1 日废止，被《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所代替。该救助管理办法明令“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江氏集团镇压、迫害法轮功，驱动公、检、法、司各机构在各地大规模的对法轮功弟子进行迫害、摧残，而依据的所谓法律、法条，大多 是违法违规制定的。这些违法违规的法律法条，均应立即废止。对依照这些法律法条而遭到逮捕，拘留，拘禁或受到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均应予以立即释放， 而他们因此而受到的迫害及一切损失均应得到合理赔偿。

2. 江氏集团镇压、迫害法轮功，违反了哪些中国法律？

2.1 违反中国《宪法》的有关条款：

从中国大陆颁布《宪法》的时间，可分为于 1982 年 12 月 4 日颁布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 2004 年 3 月 14 日颁布生效的《新宪法》。

2.1.1 《82 宪法》第五条：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级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新宪法》中第五条中又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江氏违反宪法，私自违法并对外宣称“法轮功是危害社会和人民的邪教”，超越国家主席的权限，违宪组建和授权“610 办公室”实际具有司法权，执法权，凌驾，操控公，检，法机构。

2.1.2 《82 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新 宪法》在第十三条中对此作了进一步严格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在中国大陆，警察、地方政府不法官员以及街道办事处人员，可以随意没收、搜缴法轮功学员个人的合法私有财产，包括现金、实物、储蓄，甚至房地产的所有权、居住权，给法轮功学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2.1.3 《82 宪法》和《新宪法》在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法轮功学员与其他人一样，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应受到任何歧视和虐待。

2.1.4 《82 宪法》和《新宪法》均在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法轮功学员依法应享有的权利，均被非法剥夺了。法轮功学员无论在天安门广场还是在街头巷尾，只要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警察，便衣听到，都会遭到抓捕；张贴标语或发份传单，都会遭到非法拘禁，甚至引来杀身之祸，更不要说公开出版书籍了；在公园，空地上炼功都被扣上“扰乱社会秩序罪”予以劳教或判刑，更不用说结社，游行、示威了。

2.1.5 《82 宪法》和《新宪法》在第三十六条中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而被关进各类监狱，受到各种酷刑折磨，洗脑，强制改变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2.1.6 《82 宪法》和《新宪法》在第三十七条中均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法轮功学员人身自由没有保障，警察、企事业单位的保安人员、领导及地方基层政府和工作人员均可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证明的情况下，抓捕、非法拘禁、关押及搜查法轮功学员的人身。

2.1.7 《82 宪法》和《新宪法》在第三十九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在中国大陆，非法侵犯公民住宅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的住宅。公安人员及企事

业单位的领导、保安人员、街道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搜查、非法侵入法轮功学员住宅的事情大量存在。

2.1.8 《82 宪法》和《新宪法》在第四十一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一法条有三层含义：

（一）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二）对于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不得诬告陷害；对此，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三）公民权利受到损失的人，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但中国大陆的现实情况却是完全两样：公民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就连冠冕堂皇挂着“信访局”专门接受、处理公民投诉的国务院机构都完全变成了“警察局”、“抓人局”。公民的合法投诉行为，成了自投罗网的行为。法轮功学员依法提出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材料成了公检法机关抓捕，法办的口实和证据。位于北京国务院信访局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各地区的“信访办”，对于法轮功学员的依法投诉，各地区政府及“610”办公室何止是“压制和打击报复”，而完全是“酷刑和虐杀”。法轮功学员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可依照实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具体规定索赔。

2.1.9 《82 宪法》和《新宪法》在第四十四条中均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已退休的法轮功学员依然依法享有上述权利，不得歧视或剥夺。

2.1.10 《82 宪法》和《新宪法》在第四十六条中均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法轮功小学员也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得歧视或剥夺。

2.1.11 《82 宪法》和《新宪法》在第六十七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四）解释法律”。江氏集团教唆，指使高法、高检超越职权、违宪解释有关法律，并以此违宪解释的法律为依据，不经法定程序审判，私自订立法轮功为“邪教组织”，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镇压、迫害。

2.2 违反中国的实体法——刑法

2.2.1 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条是“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法无

明文规定者 不处罚”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实施。只要刑法条文没有明确规定某一行为为犯罪行为时，就不能对此行为定罪和处以刑罚。

2.2.2 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条是指行为人故意实施的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要是用于个人的原因而实施的杀人行为。司法人员因实施刑讯逼供等暴力行为造成死亡的，或者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致人 伤残死亡的，依照该条的规定定罪，并从重处罚。

2.2.3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里讲的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可参见《人体重伤鉴定标准》（1990年3月29日颁布）。

2.2.4 第二百三十六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强奸妇女，奸淫妇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 （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 （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 （四）二人以上轮奸的；
- （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强 奸是指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法轮功女学员在被抓捕、转送过程中及在监管场所（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等）被司法人员、监管人员强奸的，均属情节恶劣的；女学员被关进男牢房，从而被男犯人强奸、轮奸的，均属于情节恶劣的；有关将女学员关进男牢房的司法、监管人员按强奸罪共犯论处。

2.2.5 第二百三十七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在中国大陆，公安警察、司法、监管人员，以搜身为借口，男司法人员强制剥光法轮功女学员的衣服进行猥亵，或者侮辱的，或强行把法轮功女学员关进男牢房的，均属于此类行为。

2.2.6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

规定从重处罚。”这条指的“非法”是指（一）违反法律规定；（二）不按法定程序拘禁他人的。“其他方法”是指以不同名目，如“学习班”、“洗脑班”等形式，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

2.2.7 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这条指的“非法”是指（一）违反法律规定；（二）不按法定程序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的，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大陆普遍存在，尤其对法轮功学员。许多司法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在无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搜身、搜屋、查收法轮功书籍资料等。

2.2.8 第二百四十七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这一条主要是指受害人被司法人员抓捕以后，法院依法判决收监以前，而遭到司法工作人员施以肉刑，使用 刑讯逼供或者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情形。证人证言是指证明某人有犯罪行为，或无罪行为，或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保证书”，“悔过书”等。

2.2.9 第二百四十八条：“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 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里指的“殴打”是指使用暴力、刑具对被害人进行旨在造成痛苦的打击，施以种种肉刑。体罚虐待，主要是指让被害人 长时间站、跪、蹲、不让睡觉、长时间冻饿等等，从而造成生理上的痛苦。

在中国大陆，监管人员对被非法关押在监管场所的法轮功学员，采取极其残酷野蛮的手段进行暴力殴打、迫害。尤其对女学员进行性侵犯、性虐待的手段令人发指。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法轮功学员的，无论有关监管人员或是参与的其他犯人，均违反了该条规定。

2.2.10 第二百五十一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现时大陆进行的一切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均是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上述行为，均应负担刑事责任。

2.2.11 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 大陆，有些警察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镇压，迫害法轮功学员之机，大肆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钱财。敲诈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恫吓，诈骗等手段，强行索要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是指数额在一千元至三千元；“数额巨大”是指一万元至三万元。

2.3 违反了中国的程序法——刑事诉讼法

2.3.1 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 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 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这一条明确规定，除以上三家——公、检、法分别依法执行各自的职责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包括“610 办公室”，均无权进行刑事诉讼，无权行使任何刑事诉讼权力。

2.3.2 第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这一条，明确了两条法治社会的最基本原则：（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论你是国家主席，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规定。一切超越或违反法律的言行都是违法行为，应受到法律制裁。

2.3.3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这是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法条。而法条还明确规定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是人民法院的法定义务。所以，无论被告人是否为“法轮功学员”，均有辩护权利。

2.3.4 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条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体现。其含义是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均是无罪的，不得因推定其有罪而施加以任何刑罚和虐待。

2.3.5 第三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被告人的辩护权除自己行使外，还可以委托律师及特定的单位及亲友帮助行使，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护。这是一项重要权利，任何人或组织不得阻碍或剥夺。

2.3.6 第五十八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行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在刑事侦查期间使用的强制措施，是有条件和期限的，不能无期限的使用和无条件的乱用。

2.3.7 第五十九条：“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这一条是对逮捕人犯法律程序的严格规定，即能够对人犯作出逮捕决定的机构只有两个：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除此之外，任何机构和个人均无权做出此决定。而执行逮捕的机构只有一个：公安机关。所以任何“610 办公室”、街道居委会、单位保卫科、保部门均无权行使此权力。

2.3.8 第六十四条：“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之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第六十五条：“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这两条对公安机关实施拘留措施做了明确规定：（一）必须出示拘留证，而不是可有可无。如没有拘留证件，就是非法拘留；（二）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三）在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四）释放时，发给释放证明。在大陆，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随时、随意拘留，而不出示任何证件、证明，长时间不通知家属或单位，释放时也不给释放证明。这些均是严重违法行为。

2.3.9 第六十九条：“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对于刑事拘留措施，一般是三天，特殊情况下是七天。加上人民检察院批准的时限七天，共十四天。最长不能超过三十天。超过三十天的刑事拘留构成违法拘留。在大陆，很多公安机关，以刑事拘留作为一种刑罚，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超期关押，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

2.3.10 第七十一条：“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这条要求，公安逮捕人时，必须出示逮捕证，并应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通知家属或工作单位。如在审讯中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在二个月时间，可以延长一个月，共三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二个月。

2.3.11 第七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朋友均可依照此条，对于公、检、法机关超期关押的行为提出诉求，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2.3.12 第九十一条：“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审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第九十二条：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在大陆，很多公安机关，“610办公室”人员，以传唤、拘传的形式，在没有任何证明文件情况下，将法轮功学员诱骗、劫持到公安、劳教、洗脑班，进行摧残迫害。

2.3.13 第九十六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这一条明确规定了任何犯罪嫌疑人均有权聘请律师。法轮功学员同样具有这一权利，在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这一权利。

2.3.14 第一百一十一条：“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第一百一十二条：在搜查的时候，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

第一百一十三条：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上注明。”这三条具体规定了搜查行为的法律规定：（一）必须出示搜查证；（二）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不用搜查证；（三）搜查时应有见证人在场；（四）对妇女的身体，应由女工作人员进行；（五）应写成笔录。在大陆，对法轮功学员大量存在无证搜查的情况，还有很多是偷偷进行，没有任何笔录。这均是违法行为。

2.3.15 第一百一十五条：“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在大陆，对法轮功学员住所进行抄家式的搜查已司空见惯，对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很多均没有清单和记录。这均是违法行为。

2.3.16 第一百二十条：“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在大陆，许多公安人员、司法医务人员，丧尽天良，故意将法轮功学员当作精神病人，强制注射摧残中枢神经的药物，或将该类药物投放到食物、饮品当中，诱骗法轮功学员食用，或强制将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医院，进行所谓的“精神治疗”。所有参与此类经历的人，均应承担法律责任。

2.4 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违反了行政法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于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发布实施的。它是适用于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公私财产四方面行为，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该条例。

2.4.1 第六条：“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分为下列三种：

（一）警告

（二）罚款：一元以上，二百元以下。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三）拘留：一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这里讲的拘留，不同于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强制措施——刑事拘留。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可称为行政拘留，最长十五天。而刑事拘留是一种强制措施，而不是处罚，时间最长三十天。这里规定的行政罚款，最高是二百元（人民币）。而在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罚款往往高达数千元。

2.4.2 第三十三条：“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在农村，没有公安派出所的地方，可以由公安机关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裁决。”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裁决应当填写裁决书，并应立即向本人宣布。裁决书一式三份。一份交给被裁决人，一份交给被裁决人所在单位，一份交给被裁决人的常住地公安派出所。单位和常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协助执行裁决。”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或者公安人员收到罚款后，应当给被罚款人开具罚款收据。”

以上条款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做了明确规定。但在大陆很多公安人员对法轮功学员执行或适用处罚不填写裁决书，罚款无收据。有时还经常发生超额罚款现象，高达三千至五千元。

2.4.3 第四十一条：“公安人员在执行本条例时，应当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不得徇私舞弊。禁止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打骂，虐待或者侮辱。违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条是对公安人员执行本条例提出了法律要求，否则，任何人都可依法控诉有关公安人员，将其绳之以法。

2.5 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违反了另一行政法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于1982年1月21日由国务院发布实施的。该办法第二条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

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但是，由于该办法制定较早，已同大陆现有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发生明显冲突。（一）它不仅已违反了宪法的有关规定，也与其他有关法律相违背。如：1996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可见国务院的这一办法，由于与宪法和法律作出的明确规定相违背，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未被明令废止和撤销，仍在与法律相冲突的状态下继续存在并被广泛使用。（二）该办法同现代文明社会公正，公平，公开的司法理念格格不入。在剥夺和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方面，劳动教养实际上与一部分刑罚重叠，但是，被劳教人员却对劳教裁决完全没有辩护和胜诉的机会。而且，也缺乏必要的约束监督机制。（三）劳动教养裁决不符合法律程序公正原则。这一裁决仅仅是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的行政程序，缺乏严明和公正。（四）劳动教养的期限过长，达一年至三年，还可延长一年。

实际上与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异，比刑法规定的管制，拘役刑罚实际上还要重。

江氏集在镇压法轮功之时，不仅广泛使用了这个按理，依法应当被废止和撤销的行政法规，而且还违反该办法，残酷镇压，迫害法轮功的学员。

2.5.1 第十条：“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

- （一）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 （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 （三）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 （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 （五）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 （六）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从上述六项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江氏集团利用劳动教养镇压，迫害法轮功学员，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莫须有”罪名，强行裁决，是明显违反该办法的。

2.5.2 第十九条：“……允许他们对管理，教育，生产，生活等提出改进意见，允许他们给国家机关和领导人写信反映情况，申诉自己的问题；允许他们公告他人的违法乱纪行为。劳动教养管理所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申诉，控告等信件，不得拆检和扣压。”

在大陆，管教人员知法违法，严厉控制法轮功学员，严禁他们与外界联系，肆意拆检，扣压法轮功学员的任何信件，不允许他们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打压他们的申诉，控告的合法行为。

2.5.3 第三十二条：“教育时间，一般情况每天不少于三小时，劳动不超过六小时。“大陆管教人员，拼命逼迫法轮功学员超时劳动，有时每日长达十五至十六个小时，使他们成为管教场所的免费生产力。

2.5.4 第四十五条：“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根据劳动教养人员从事的生产类型，技术高低和生产的数量，质量，发给适当工资……。”

在大陆，这一条对法轮功学员，形同虚设。

2.5.5 第四十七条：“……在规定范围内，尽量调剂改善，保证他们吃够标准，吃熟，吃热，吃得卫生。”

第四十八条：“劳动教养人员的宿舍，应当光线明亮，空气流通。住房面积每人不得少于三平方米。

建立卫生制度，定期检查评比。劳动教养人员应当定期理发、洗澡、洗晒衣被，每天打扫卫生，定期打扫除、消灭臭虫、虱子，经常保持室内外整洁。并注意做好劳动教养场所的整修和绿化。注意劳逸结合，保证劳教人员每天睡眠八小时。”

在大陆，管教人员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吃的是猪狗食，干的牛马活，有的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且长时间剥夺法轮功学员睡眠的基本人权，将强制剥夺睡眠作为一种残酷的肉刑。

2.5.6 第五十二条：“劳动教养人员的通信，不检查。会见家属时，不旁听。家属当天不能返回的应当安排食宿。有居住条件的，允许夫妇同居。

第五十三条：“劳动教养人员与国外亲属会见和通电话，经劳动教养管理所批准。”

第五十四条：“劳动教养人员家属送来的衣物和食品，一般不应限制。”上述诸多法轮功学员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基本人权都被管教人员非法剥夺。信件被扣押，会见家属的谈话被监听，而且还不准许法轮功学员将劳教场所内发生的实施酷刑的情况向外界透露。家属送来的衣物和食品大多被管教人员私扣私分。

3. 大陆同修如何在没有律师的帮助下，自己撰写申诉书？

江氏集团镇压，迫害法轮功，为了达到欺骗公众，掩人耳目的目的，秘密规定大陆律师不准为法轮功学员的案件进行法律帮助和辩护。为了揭露邪恶，讲清真象，救度世人，更好地利用法律知识，反镇压，反迫害，现将如何撰写刑事申诉书介绍如下：

3.1 向哪一家司法机构投递申诉书？

对于司法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如：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暴力取证，以及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等和对人民法院的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控诉等，均应向当地人民检察院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投递申诉书。根据大陆人民检察院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分工的不同，与法轮功学员申诉内容有关的职能部门主要有以下：

3.1.1 法纪检察部门：承办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暴力取证，破坏选举等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等工作。这里指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限于公安，国安，法院等司法部门的人员，也包括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如“610办公室”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等。

3.1.2 监所检察部门：承办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直接立案侦查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对监管场所的管理，活动进行监督。劳动教养所也由人民检察院监督。

3.1.3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举报中心：承办受理，接待报案，控告和举报，接受犯罪人的自首；受理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撤销案件及其他处理决定的申诉；受理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受理人民检察院负有赔偿义务的刑事赔偿案件等工作。

3.2 刑事申诉书应有哪些部分？

刑事申诉书主要有五部分组成：

3.2.1 被告人情况：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名称地址），职务，住址，民族被告人可以一人，也可多人。姓名，性别，工作单位或住址是重要内容。但如确实不知真实姓名的，可注明被告人面目特征或绰号等，由检察机关人员侦查。

3.2.2 原告人情况：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务，住址，民族。

3.2.3 案由：提出申诉案的理由

3.2.4 犯罪事实和证据

3.2.5 诉讼请求和法律依据

3.2.6 附带民事赔偿诉讼。（根据情况，可有可无）

此致×××××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签字盖章

年月日

申诉书应打印一式多份，主送检察院二份。

3.3 撰写申诉书时应注意的事项

在大陆现实环境下，撰写申诉书，主要部分在犯罪事实和提供证据。其中尤以提供证据最为困难。因为江氏集团镇压，迫害法轮功学员，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利用国家机器，使用权力机构，在编织谎言，罗列罪名，以“莫须有”方式进行的。法轮功学员处于被镇压，被迫害，被监管，失去自由或无权无力的情况下

控告有关恶警， 监管人员的。所以，在收集提供，保存证据方面面临着很大困难。

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物证，书证；（注：物证是指能够证明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物品痕迹。书证是指能够以文字，图形，符号等所表示的内容，真实情况的文件，凭证。）

（二）证人，证言；（注：证人是指除该案当事人，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是知道案件事实情况并向司法机关陈述有关案情的自然人。而证人证言则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三）被害人陈述；（注：被害人陈述，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就其遭受侵害的事实及案件的真实情况向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辩解和供述。）

（五）鉴定结论；（注：鉴定结论是指由有关专家对诉讼中某些有争议的并具有专门性的问题，运用专门知识和现代科学手段进行检测，分析，鉴别以后，所提供的结论性书面意见。）

（六）勘检，检查笔录；（注：勘检，检查笔录是指司法机关对与案件有关的现场进行勘检，检验时所制作的实况记录，以及对与犯罪案有关的物品，人身体进行检查时，所制作的客观笔录。）

（七）视听资料；（注：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带，录像带，光盘和电脑及其他科学技术设备储存的电子音像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根据上述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法轮功学员可以收集、提供、保存的主要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部分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

（1）注意收集一切有关的物证，书证，并加以妥善保存，不轻易出示给其他人，注意安全；

（2）注意收集一切有关的证人证言，如有法轮功学员当时在现场，可请他们作证。最好先将证人证言做成书面文字形式，以利保存；

（3）当被害人获得自由时，尽快将身体伤残部位照相留存，并做医检，由医务人员出具正式的检验报告。造成精神伤害的，尽快做精神科鉴定。

（4）尽量详细，真实地做好被害人陈述，写出法律规定的犯罪特征；有关犯罪事实必须写清时间，地点，手段，使用的犯罪工具，犯罪行为人的言行，犯罪经过，后果等要素。要注意前后事实，时间的一致性。叙述犯罪事实，要针对案件特点，详细得当，主次分明，真实可靠。

4. 举例说明如何撰写刑事控（申）诉书

（为维护法律公正，人名，地点等均为化名或虚构）

刑事控（申）诉书

一. 被告人：姓名：吴仁兴，男，36岁（1968年4月5日出生）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警察。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5号

被告人：姓名：江士皋，男，24岁（1980年1月17日出生）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警察，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5号

被告人：姓名：谭小莉，女，30岁（1974年6月8日出生）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管教

被告人：姓名：麦银铝，女，20岁（1984年X月X日出生）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被劳教人员（因卖淫行为关押）

被告人：姓名：杜平凡，女，23岁（1981年X月X日出生）
北京市女子劳教所被劳教人员（因吸毒，贩毒关押）

原告人：姓名：蒋真贤，女，32岁（1972年5月18日出生）
北京市海淀区中学教师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27号

二. 案由（控告案理由）：

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分别违反了刑法有关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猥亵侮辱妇女，强奸妇女，刑讯逼供，体罚虐待，故意伤害和敲诈勒索罪等规定，原告人为此特依法提出控告。

三. 犯罪事实和证据：

1.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八日晚，大约10：25分左右，有街道居委会的人敲门，声称查户口，我不知有诈，为他们开了门。门一开就拥进五、六个人。为首的男子自报是海淀公安分局的，叫我去分局走一趟。我当时就问：“你们不是说要查户口吗？为什么又要去分局？你有证件吗？请出示。”这时街道居委会的人介绍说：“这是咱们分局的吴仁兴科长。这时吴仁兴就命令其他警察搜查我的房间。有三名警察就在我的房间里搜找有关法轮功书籍、材料及录音录像。我就质问吴仁兴：“你有搜查证吗？你这样无理搜查是违法行为。”吴仁兴就阴笑着走到我的面前，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着我，他的脸几乎贴到我的脸说：“看来人民教师就是不一般，还懂些法律知识。我告诉你，拘传证，搜查证我都有，你找江泽民要去。”吴仁兴说着就架着我的右臂，另一个年轻些的警察架着我的左臂，连拖带拉的把我拽到门外的警车边（吉普车）。他们打开车后门，让我上车，我就质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权力拘传我，请出示拘留，逮捕证件，没有证件，你们就是违法拘禁。”这时那个年轻些的警察就说：“咱们人民教师还真厉害，

说的头头是道。”我注意到他的警号是×××××。他和吴仁兴使了个眼色，然后说了声“抬”，他们俩人就一边一个架胳膊抬腿的，往车里塞我，我就用脚蹬着车厢边不进车，边叫喊：“警察执法犯法，违法抓人，法轮大法是正法！”并挣扎着。但突然我感到吴仁兴有只手在抠摸我的阴部。当时我穿的是裙子。我臀部本能的一紧，就被他们推进了车。那年轻的警察顺势抓我的左乳房一下。我低声说了句“可耻”。当我坐到车里时，就看到两个警察抬着，抱着从我家里搜出的HP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有关法轮功书籍五本，CD盘，录音，录像带数十盘，放在车里。但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搜查证，也没有给我没收财物的清单。

他们将我押到海淀公安分局，当时大约晚上十二点钟。他们把我从车上生硬的拽下来，并将我单独关进一个小黑屋，戴上手铐。我站在屋里呆了几分钟，等眼睛适应了黑暗，逐渐看清了里面的情况。屋里只有一个木板床，靠在左墙角。墙上贴着天花板有一个二十公大小的方形通风口，还装着井字铁条，从这里透出一丝光线。可能由于通风不良，小屋里有一股霉臭味，而且非常潮湿。我只好坐在木板床边静思着这晚发生的一切，也思考着将要发生的事。大约又过了二个多小时，小屋外传来了脚步声。随后“啪”的一声，屋里电灯被打开了，当时晃得我睁不开眼。我听到门开了，恍惚看到有两个人走进来，还夹着一股酒和饭菜味。我定睛一看，还是吴仁兴和那个年轻的警察。我本能地，防卫性地从木板床上站起来，问到：“你们又来干什么？”吴仁兴说到：“没什么，只是例行公事，检查检查。”说着就从腰间拿出手铐的钥匙，走到我身边。我抗议到：“检查妇女要由女工作人员进行。”吴仁兴就说：“女的不上夜班，只好由我们男的代行公事了。”那个年轻警察一边淫笑着一边帮腔：“就是，就是”。他们说着，就打开我的手铐，跟着，年轻警察就把我的左手扭到背后，吴仁兴把我的右手从我的头部右侧扭向后方，然后，将我左右手成对角线方式铐在一起，使我的双手不能动。这时，我马上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严正地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你们难道要执法犯法吗？”吴仁兴说：“你说的不完全对。江泽民说：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更不用说玩几个女人了。”说着他们两人就把我扑倒在木板床上，吴仁兴撩开我的裙子，使劲往下扯我的内裤。我的双手被他们用手铐铐在背后，一点也动不了。因我横躺在木板床上，臀部在床边，双腿着地。我只好夹紧双腿，以抵抗他们强奸。他们两人一人掰我一条腿，还用手掐我大腿内侧的肉，使我的双腿分开了。吴仁兴首先站着奸污了我，在他退下内裤时，我看到在他左小腹近腹股沟处有一大小如五分硬币（约十毫米直径）的黑痣，他口中的呼吸都带着酒气。之后，那个年轻的警察也跟着奸污了我，在他露出生殖器时，我看到，在他龟头右边10—11点位置上，有一块花生米粒大小的皮肤呈粉紫色。他行奸时，还强行索吻，使劲揉搓我的乳房。奸后，他还扯我的裙子，用裙边将他的阴茎擦干净。他二人强奸之后，又把我的手铐打开，重新铐在前边，还威胁我：“不许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否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2. 第二天，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九日，一天时间，除了在我的要求下，去了两三次厕所之外，没有任何食品和饮水。我只好忍饥挨渴地熬着。一直到了大约晚上九点多钟，吴仁兴和那个年轻的警察，我从别人那里知道他的名字：江士皋，将我从小黑屋押到预审室进行讯问，他们强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并说了很多污蔑法

轮功的话，强迫我写“悔过书”，遭到我的抵制后，他们先是体罚虐待我，让我九十度弓身站立，双臂后掠高抬，双腿并直站立。他们还特意把食品和饮料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在我面前又吃又喝。然后，吴仁兴拿杯饮料到我面前，说：“你看看，写个”悔过书”，就会有吃又有喝，何必太认真了。”我不理睬他，他就使劲抓着手铐，向上提我的双臂，顿时痛的我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滴到地上。就这样，我以这种姿势站立了大约四个小时，其间，稍有变态走形，就会遭到吴仁兴，江士皋或用燃烧的香烟头或电棍，烧灼或电击。我的汗水将面前的地面都滴湿了一片，当时手臂和腿部都留下六至七处他们烧灼或电击的痕迹。

到了大约夜里一点多钟，吴仁兴和江士皋看到还是不能将我转化，就不耐烦了。吴仁兴说：“你个臭娘们还挺硬，我就不信斗不过你，转化不了你。”说着，他和江士皋就把我架到预审室的里屋。我看到里屋有很多刑具，像皮鞭，木棍，铁条，电棍，老虎凳，房梁上还挂着三，四根拇指粗的绳子。

吴仁兴，江士皋把我铐在背后的双手，用绳子捆住手铐，往上吊我，我的双手，双臂被提了起来，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双臂，双手上。窄窄的手铐子，勒得我的双手疼痛难忍。吴仁兴，江士皋每人手里提着根电棍，他们故意用电棍往铁椅子上放电，弄得电弧光乱闪，以此恐吓我，强制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江士皋还很不规矩地对我摸腿捏屁股，假装怜悯地说：“瞧长的细皮嫩肉的，还真舍不得收拾你。”我听着，觉得他们真是不知羞耻。我只好正义、严肃地说：“请你放规矩点。人民警察应该依法办事，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的权利，也有不信仰的权利，其他任何人不能干涉。”吴仁兴就反驳说：“什么宪法呀。在中国宪法不如现官，现官不如现管。江泽民是现官，他说消灭法轮功，我就是现管，我管你，就是我说说了算。”说着，他就用电棍电我的胸部乳房，顿时我感到像万箭穿心，万针同刺。随着电棍放电的频率和次数，我的心跳也随着呈不规则跳动，呼吸也不自主了。江士皋的电棍也开始在我背后放电，主要在臀部，腿部。他们一边电，一边问：“还炼不炼了？”我就回答：“炼，炼，炼。”他们放电的时间，随着我说：“炼”的次数，逐渐加长，我的声音也愈来愈小，直到我失去了知觉。

这样的酷刑几乎每一、二天就重复一次。还有一次是让我坐“老虎凳”。在六月二十九日晚十点，吴仁兴，江士皋将我拖到预审室里屋的行刑室，放在“老虎凳”上，双手五花大绑在老虎凳背上，口里勒个宽布条。双腿从大腿根开始，每二十公分绑上一条皮带并煞紧，共三根。然后在脚脖处加垫砖块或硬物。他们边加边问，由于大腿不能高抬，随着脚脖处加垫物的增高，反关节压力造成的疼痛是剧烈而持久的，疼得钻心，汗水顺着面颊淌下来。他们每问一下，我就摇摇头，直到疼的昏过去。

就这样我被他们关押了三十天，到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才将我释放。街道居委会，海淀区教育局“610办公室”，派出所还要将我直接送往北京女子劳教所，由于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劳教所怕我死在那里，担负责任，就拒绝接收我。所以我只好暂时被送回家。他们还派二个人昼夜在屋外监视我的行动，我一出门就有人尾随跟踪。

回到家后，我将留有精斑的内裤及裙子换下后，原样不动地收藏好。用照相机将手，脚，腿及身体所有受伤留下的伤痕做了拍照。然后，又去医院做了医学检验及鉴定，对外伤进行了处理，医生开具了有关鉴定诊断证明。我从母亲口中得知，在我被关押期间，吴仁兴，江士皋还到我家 非法搜查了二次，均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而且还向我母亲敲诈了人民币五千元。当时有目击者在场。

3. 二周后，二零零零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大约十点钟，在街道居委会人员的带领下，派出所，海淀区教育局 610 办公室，等四，五个人坐着警车来到我家，以到派出所讯问为名，将我从家中强行架上警车，直接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

大约在一点左右，我被送到北京市女子劳动教养所。这时，居委会，派出所及 610 办公室的人才向我出示北京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上面写着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第十三条的规定，现决定对我劳动教养二年。在对我进行例行的身体检查后，就将我押送到囚室。北京女子劳教所 负责我的管教是谭小莉，女。两个包夹是麦银铝，女，20 岁，因卖淫被劳教。另一个是杜平凡，女，23 岁是因吸毒，贩毒被劳教的。这两个包夹人员，均是女子 劳教所中的被劳教人员，管教人员用她们监视，看管法轮功学员。当我被关押到女子劳教所后，我的每一言一行都受到她们的监视，还写记录，随时向管教人员汇报。由于我坚持不写《悔过书》，不骂法轮大法，坚持打坐炼功，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管教谭小莉，被劳教人员麦银铝，杜平凡，罚我面墙而跪，而且是 跪在三角铁上，当我拒绝时，她们三人就向后搬我的双臂，使我头朝下，然后抓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的头。顿时，撞得我眼冒金星，头颅剧痛，撞到六、七下 时，我感到有一股热血从头上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但我还是拒绝写《悔过书》。她们三人气急败坏，谭小莉就让麦银铝，杜平凡去抬“死人床”。

这“死人床”又名“燕儿飞”，是一张带铁床头床尾的木板床。有的木板床板上还掏个洞，方便床上人大小便。我在此之前就有所耳闻。当麦银铝，杜平凡抬来那“死 人床”时，我看到那床上血迹斑斑，连黑色铁床头，床尾也是血迹斑斑。谭小莉命麦银铝，杜平凡将我抬上床。麦，杜两人将我抬起来往床上一扔。然后她们三人拽 手的拽手，拉腿的拉腿，将我右手臂，左脚对角线使劲用绳拴住后向两头拉紧，我感到象要拉裂我的右手和左腿似的。她们在觉得实在拉不动时，就将绳子固定在铁 床头，床尾上。然后又把我的右手，左脚栓在床头，床尾上。我就这样被呈“大”字一样被栓在床上，左低右高。我躺在光床板上，整个身体疼痛难忍，象撕心裂肺 一样。谭小莉还叫着：“抬她到外边，喂苍蝇，蚊子，晒太阳。”麦，杜二人就将我抬到屋外，故意将我放在太阳光下。七月的太阳是骄阳似火，照在身上火辣辣 的。加上蚊虫的叮咬，疼痒难忍。由于我的四肢均被拴住，不能动，不能驱赶蚊虫，不能活动筋骨，全身先是疼痛，继而麻木，最后失去知觉。

4. 七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女子劳教所管教谭小莉为了惩罚我，对我禁水，加上每天在太阳下暴晒，每天只小便一、二次，没有大便，嘴唇干得裂口子。为抗议她们 对我进行的非法酷刑，体罚虐待的行为，我宣布进行绝食。到了七月三十一日，谭小莉见我已绝食四天，身体出现严重脱水现象，整天处于昏迷或半昏迷状态，就给 我进行灌食。

在劳教所里进行的所谓“灌食”，已完全不同于医疗卫生机构为了挽救或延长患者的生命，而进行的人道主义灌食。他们的灌食，已经 成为一种新式的，披着“人道主义”外衣，野蛮，残忍的酷刑。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大约三点多钟，她们用一种透明较硬的塑料管，有小拇指粗，也不消毒。谭小莉 就让杜平凡使劲按着我的头，不动。因我的四肢被绑在“死人床”上不能动，麦银铝用手掐我的两腮，并掐着我的鼻子，让我不能呼吸，只能张开嘴进行换气。这 时，谭小莉就快速的将塑料管插进我的口腔中，当我试图用牙齿咬住塑料管时，麦银铝就使劲掐我的两腮，谭小莉就往我食道中插塑料管，根本不顾因插管引起我的 生理反应。当时我感到象有一条毒蛇从我的口腔中顺着食管往下行，我的喉头因有大而长的异物进入，就不由自主的产生吞咽动作。而食道及胃部因有异物快速进入，造成巨大的不适，而产生痉挛和排斥。而管教谭小莉见到因插塑料管给我造成的痛苦状态，不但不放缓往我口中插管的速度，反而残忍的插插拔拔塑料管，以此 为乐。这时我喉头，食道，胃部象被毒蛇噬咬了一样，疼痛，痉挛，排斥，吞咽，都凑在一起，但却欲吞不行，欲吐不能，咽不下，吐不出。血液，唾液，胃液都堆 集在喉头，堵住气管，而我的鼻子依然被麦银铝掐着，不能通气。一时间，因不能呼吸了，我憋得胸部起伏，脸发烧，胃里，肺里象憋了一团火一样，要喷发出来。 谭小莉她们三人见状也一时停了手脚。这时我身体一震，一股带有血腥味的一团东西从我的胃底，强烈地喷发出来，连同插进的食管，也一同喷出来，落在我的身 上，地上。之后，我才缓了一口气。谭小莉见状，很不高兴。三个人骂骂咧咧地收拾东西走了。

如此灌食，在八月二日，八月四日又进行了两次。

5. 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她们每天都强迫法轮大法弟子超强度劳动，而且经常，随意缩减或剥夺法轮大法弟子的睡眠时间。例如：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十 七日连续三天，谭小莉为了强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指使麦银铝，杜平凡轮流看管我，不让我睡觉，让我面壁而站。十二月十五日我整整站了二十个小时。从早上四 点站到晚十二点。因站的时间太长，腿脚发肿，实在站不住了，而跌倒在墙边。又被麦银铝，杜平凡拖到木板床边“坐板”，还是不让我合眼睡觉，有时感到实在太 困时，只要我一闭眼，麦杜二人就大声叫喊，用木棍敲我的头，或往我头上浇冷水，或用鞋底打我脸。一直到十二月十七日晚我困得睁不开眼而昏倒在地上。

6.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关押一年时，因长期的迫害，造成我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女子劳教所只好让我保外就医。

四. 证据：

我现保留的证据如下：

1. 物证：留有精斑的内裤及裙子；
2. 书证：医生鉴定诊断证明；伤情照片
3. 证人证言

五. 法律依据和要求：

1. 根据上述犯罪事实和有关证据显示：被告人吴仁兴，江士皋的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第四项，强奸（轮奸）罪；第二百三十七条猥亵，侮辱妇女罪；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第二百四十五条，非法搜查罪；第二百四十七条，刑讯逼供罪；第二百四十八条，体罚虐待罪；第二百五十一条，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和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

2. 谭小莉的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第二百四十七条，刑讯逼供罪；第二百四十八条，体罚虐待罪；第二百五十一条，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罪。

3. 被告人麦银铝，杜平凡的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第二百四十八条，体罚虐待罪（和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与谭小莉）

4. 附带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第三章第十五条第四项，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提出赔偿要求如下：

（1）被告人吴仁兴，江士皋必须返还敲诈的人民币五千元于我母亲；

（2）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为赔偿义务机关（A），北京市女子劳动教养所为赔偿义务机关（B）。具体赔偿要求细节情况请见赔偿申请书。

此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或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控（申）诉人蒋真贤年月日

（完）

一篇辩护词

文 / 大陆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一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其家人请了律师，下面是一篇为律师准备的《辩护词》，供有相同需要的人士参考。

请注意，辩护词在中共法庭的特定环境中，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能起到一定的讲真相和反迫害的作用。这和法轮功学员对中国大陆和海外民众讲真相的语境是不同的。

中共邪党根本没有任何合法性，中共的法庭根本没有司法独立，完全是中共迫害民众的工具。中共炮制的宪法和法律尽管盗用了文明社会的一些法律条文充当门面，但中共邪党原本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黑社会组织，从来没有遵守过法律。

关于邪教的问题，中共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组织，是一个最大的、最凶残的邪教。中共这个邪教组织以及被其操纵的所谓“公安”（实为公害）和“人大”（所谓的人大代表根本不是民众选举的，根本没资格代表人民）没有任何资格给任何宗教信仰定性。

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给社会带来福益。法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和中共邪党的贪污残暴形成强烈的对比，更让人看到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

辩护词

尊敬的法庭、尊敬的合议庭诸位：

我受本案被告人及其家人亲属之委托，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查阅了公安局、检察院移送法院的《起诉书》。在尊重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本人将以一名执业律师的法律良知和操守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特别声明：以下辩护意见只是根据本案事实，提出法律上的评价，不涉及信仰、宗教及政治上的评价，不代表辩护律师的宗教信仰、政治主张。辩护律师的发言，无任何危害国家社会之目的、动机、故意，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依法享有司法豁免权。）

辩护人认为：以山东省沂水县公安局、检察院[××××××]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罪名完全不能成立。辩护人完全不能同意对×××的罪名指控，该指控无法律依据，无犯罪构成要件，辩护人认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人、证言能证明×××加入过哪个邪教组织？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造成哪个人身伤害？有哪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指控一个以所谓发短信（言论）就能破坏了法律的实施，或者说用和平的方式传《九评》就能推翻了共产党，显然是匪夷所思的。×××是无罪的，应该立即解除强制措施，宣告无罪。

第一部份：【法律辩】修炼法轮大法无罪，迫害者有罪。

第一、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不认为法轮功是“邪教”。

2000年，中共公安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

通知中关于“现已认定的邪教组织情况”表明，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最新的一个正式文件。公安部在认定邪教组织时，明确是根据《刑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神

神，参考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然后重新定义。下发了这个通知，没有把法轮功作为邪教组织认定在其中。

这就明确表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并不认为法轮功是“邪教”。所以《刑法》第三百条根本不适用于法轮功，中国至今没有任何一份法律文件认定法轮功是“邪教”，而且宗教信仰本身的正与邪不是犯罪行为，不论正教还是邪教，其中的犯罪行为才是法律制裁的范围。

至此，本案已无需再辩，×××一切行为与持有的一切物品都与邪教无关，《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因此传发短信、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是合法行为。公安局检察院对某某某的起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下发镇压法轮功文件的相关组织和个人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

一、迫害法轮功的文件、依据抵触或违背《宪法》和《立法法》。

- 1、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给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一个新的信号》。
- 2、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没有提到邪教问题，只是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
- 3、1999年7月22日，公安部发布针对法轮功的“六禁止”通告（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
- 4、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个人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书面采访时第一次提到“法轮功就是×教”。中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以“法轮功就是×教”为题发表了江泽民的个人讲话。
- 5、2014年中国反邪教协会列举了二十种邪教。（违反事实，违反《刑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神，违反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值得注意的是：反邪教组织是根据哪一个命令参考的那些法律定的二十种邪教？为什么不公开出来？就像公安部在认定邪教组织时，明确是根据《刑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神，参考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然后重新定义。下发了这个通知）

迄今为止这些所谓的“法律文件”，或者是违反宪法，或者只是政策或行政法规文件，或者是个人信件及谈话，根本不是法律。这些文件或《宪法》相抵触，或违背《立法法》超越立法权限。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了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立法法》八十七条第（一）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一）超越权限的；”

请问：以上这些所谓“法律文件”哪个能与《宪法》、《立法法》相提并论？哪个应该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的文件对着干？以上发布这些文件的组织和个人客观上严重的破坏了法律，使全国人大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关于认定邪教的法律文件无法实施。犯罪主观、客观、主体、客体四要素俱全，这不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吗？

二、政法委 610 破坏法律实施；同时又犯有绑架、关押等多种罪行

公安部二次发同一个文件：

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00）39 号文件；和 2005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2014 年 6 月 2 日，各大媒体登出《中国已明确认定呼喊派等 14 种邪教组织》，文中列举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 7 个邪教组织，以及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 7 个邪教组织。这三次公布的文件中都没提到法轮功。

而××县政法委、610 却凌驾于法律之上，绑架公、检、法系统，利用公、检、法等法律机关诬陷迫害某某，是真正的破坏法律实施。

第三、以执行命令为借口是执法犯法

当法轮功学员问到公安局办案人员：为什么没有法律依据？没有犯罪事实就抓人？办案人员回答：执行上级的命令。执行谁的命令？既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不认为法轮功是“邪教”，那么谁在暗地里下这样的命令？为什么不敢公开出来？如果执行的是政法委头子周永康之流的命令，那就太危险了！现在周永康已成阶下囚，610 头子李东生落网，请各位法官明察：周永康背后还有没有更大的后台？是应该按照 2005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判案？还是执行政法委及其后台的命令继续制造冤假错案，冤判法轮功学员？一旦这样做了，后果是什么？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谁也无法推脱罪责逃避惩罚。我相信各位，面对周永康、李东生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欠下的累累血债，一定会分清善恶，不再将错就错，更不会一错再错。相信各位有良知有素质的法官，一定会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第二部份【事实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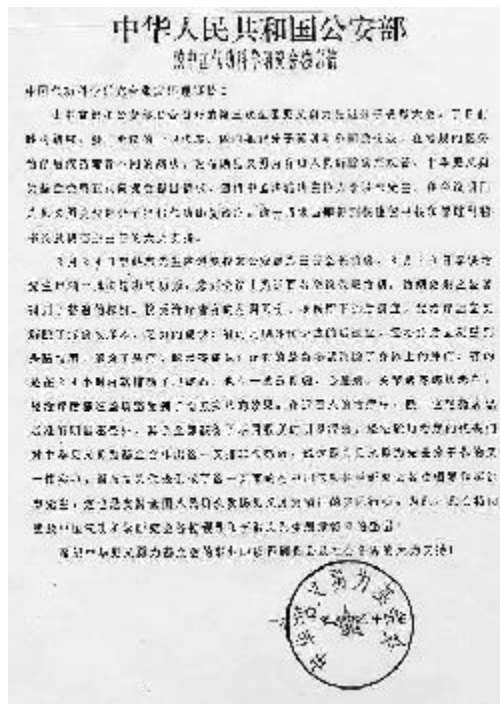
事实一、前人大老干部调查报告的结论。

为什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不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常委都看过法轮功的书，1998 年年底，前人大老干部依中共中央组织程序向中共政治局提交调查报告，认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9.1%、得到了家庭的和睦、每年可节省上千亿的医疗费。”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事实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信

为什么公安部颁布的法律文件不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因为公安部了解法轮功，而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和法轮功弟子，曾经是公安部的座上宾。李大师曾经带领众弟子义务为警察中的英模人物去除顽症，并受到公安部的高度赞誉。同时也说明：法轮功是真正的科学，是更高的科学。附：

中共公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信



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张震寰理事长：

由 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于日前胜利结束。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因同犯罪分子英勇斗争而致伤残，在常规医务治疗后依然带着不同的病状。为帮助见义勇为有功人员解除病痛疾苦，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曾正式向贵会提出请求，邀请中国法轮功主持人李洪志先生，在会议期间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进行气功康复治疗。这一请求当即得到张建秘书长和管谦副秘书长及费德泉主任的大力支持。

8月24日李洪志先生应邀专程来公安部为 王芳会长治病，8月30日，李洪志先生带领一些法轮功气功师（法轮功老学员），来到会议上为近百名会议代表治病，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是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和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炎等症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症状的效果。在近百人的治疗中，除一位轻微病患者没有明显感受外，其余全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明显疗效。经法轮功治疗的代表们对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作出这一安排非常感

激，说这是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作的又一实事，而直接为代表们做了这一实事的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这也是支持全国人民群众发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实际行动。为此，我会特向您及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各位领导和李洪志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希望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事业继续得到贵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章）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事实三：法轮功获得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的三千多项褒奖：

1992年9月，法轮功被确定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功派，传功范围为中国全国。1993年7月30日，经中国气功科研会批准，中国法轮功研究会成立。1993年8月31日，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1993年12月27日，李洪志先生获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荣誉证书。1994年5月14、15日，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办两场带功报告会，主办单位为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1996年3月，经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同意，中国法轮功研究会正式退出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中国法轮功研究会不再存在。

中国法轮功研究会在存续期间是依法登记成立的合法组织，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依法传功，获得各政府机关尤其是公安部的好评。退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后，中国法轮功研究会解散，各地的辅导站和炼功点，是学员们自愿免费义务教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名册，不存钱存物，没有组织，也不以组织的名义活动。

法轮功学员修“真、善、忍”，讲救度众生，教人重德行善做好人得福报，没有政治诉求。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法轮功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和尊敬。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作出的杰出贡献，法轮大法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三千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出版发行。

辩护人请求法庭依法定程序鉴定：在本案中没有证人证言证据存在，或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受害人？没有造成危害社会，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应立即解除对某某某的非法关押。

第四部份【结辩】

岂有信仰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千古伤心大法徒，罗织何曾铭法治。

其实，你们也知道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是道德高尚的好人，你们不妨扪心自问，如果社会上人人都能按“真善忍”去做，这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法轮大法提倡

的“真善忍”，其强大的正的力量能使人道德回升，社会稳定，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希望。

有人说你们要推翻共产党？不是。共产党说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不存在是人民的选择。与法轮功无关，请合议庭注意，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九评》讲述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行为，其针对的是党派的行为。我国宪法在 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 4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批评共产党犯罪不是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吗？控告江泽民不对吗？

法轮功学员到底为什么要得罪共产党？为什么会舍生忘死讲真相？这完全是为了救度众生。因为法轮功讲善恶有报是天理，一个人杀了人，法律要制裁他，杀人偿命。一个党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就可以不还了吗？党在历次运动中冤枉整死八千多万人。同时也因为迫害法轮佛法，当然要遭报。所以讲退出中共这个组织，人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远离灾难，得到平安。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我们法官检察官及子孙后代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说迫害法轮功就是迫害自己，迫害自己的子孙后代。迫害中华民族的未来。这就是法轮功学员的初衷。

综上所述，×××修炼的法轮大法是佛法，提倡以真、善、忍为标准对待他人，提升国民的道德素质与精神文明，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相信各位法官，一定会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辩护人：YYY

深圳市高源被非法庭审 律师做无罪辩护（附部分辩护词）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深圳市青年[法轮功](#)学员高源于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上午十点被深圳市罗湖区法院非法开庭。

法官李少平及其他一些不知姓名的法院人员和检察院的两名年轻女公诉人到庭。从年龄看这两名公诉人像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而原定的检察院公诉人马雪艳不知何故未到庭。高源的亲属、朋友共四人在法庭就坐。两名辩护律师出庭，为高源做了无罪辩护，让人们看到了在中共强权统治下仍不乏正义之士勇于站出来为真理发声。

法庭上除了高源的亲属之外，还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在场，可能是 610 的人。表面上是法律部门在进行庭审，其实是 610——这个非法组织在暗中操控。

高源是于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晚九点多钟在深圳市罗湖区京基一百商场派发“二零一四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时，被商场保安举报，并于当晚被深圳市罗湖区桂园派出所警察非法带走的。他们强行搜走高源所带的真相材料多份，并将高源非法扣留。第二天桂园派出所警察根据高源背包中证件找到高源家的地址进行非法抄家。并将高源非法拘留在罗湖区看守所。

在庭审过程中，高源相信真理，以极其平和、冷静的态度，陈述了自己一年来[修炼](#)法轮功的过程。她身患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通过修炼法轮功而神奇的痊愈，于是她试图让更多的人像她一样摆脱疾病的困扰，义务弘扬法轮大法、广传真善忍。可是她怎么也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让人学好呢？为什么被抓呢？

正义律师刘正清、罗晓光慷慨激昂的无罪辩护，震慑了在场的所有公诉人、法官、执勤民警等，让法官和公诉人无言以对。

当公诉人提到所谓的“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及所谓的三个证人和所谓的物证时，遭到了辩护律师刘正清的有力驳斥：

一、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七个邪教组织及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七个邪教组织，这十四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因此说高源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证据不足，所以罪名不能成立（编注：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邪教并没有资格评判什么是邪教。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的法律法规，[迫害](#)法轮功也是违法的。）而在本案中高源并无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故意，就侵害对象而言请公诉方指出她究竟破坏了哪一部法律、哪一法律条款的实施？如果连侵害对象都指不出来，何谈该罪名成立？！

二、《起诉书》中所谓“证人”证言纯属任意诬陷：高源并不认识上述三人，也没有派发过一张光碟给男性（证人有男性），由此可见，警方为了找被告人的所谓犯罪证据，就任意找些“证人”进行拼凑，既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也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

三、即使是上述行为是高源所为，也没有给社会造成危害。（一）该内容是一个信仰者信仰其所属的宗教应有的内容，属思想领域的范畴，思想不构成犯罪；（二）该内容没有也不可能给社会造成任何危害。没什么可怕的，更不要夸大了这种宣传的作用，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信不信由你自己判断。

四、我国也立法保障信仰自由，现行《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高源作为一名信仰者，何罪之有？她的行为既没有侵犯他人的人身权，也没有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既不偷，也不抢，更没有损害公共利益，没有丝毫的社会危害性，凭什么抓她、判她？！信仰无罪，宣传宗教信仰的行为同样无罪。一审法院判处她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请问她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何在？她究竟破坏了哪部法律？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何能力破

坏法律实施！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们的国家不能只许党宣扬共产主义，而不准公民宣传自己心中的神佛吧！

五、对法轮功信仰者的处罚依据是违宪的：宣传法轮功的行为与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其侵害的对象是法律的实施，那么请问：高源的这一行为究竟侵害哪一部、哪一条法律的实施？如果说连侵害的对象都指不出来，何谈该罪的成立？！

事实胜于雄辩。法轮功已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得到认可和保护，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蓬勃发展，赢得了全世界亿万人的信仰。铁的事实足以证明，法轮功不是“邪教”。他本该合法，理应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

通过对法轮功的了解，本辩护人感受到了人格和信仰的力量。信仰者的质朴、纯洁和热情让我一次次感动；他们对信仰的坚定和执著，令人震撼。他们是一群平凡的人，但为人处事却不平凡。他们的道德素养远远高于社会上的普通大众，是一群可爱、可敬的人。他们不能无辜受难！

刘正清律师又拿出高源父亲写的辩护词，为其宣读，警告法官及其迫害者：迫害者周永康、李东生都遭报应了，善恶有报是天理。

庭审过程中，当律师问及哪一条法律能证明修炼法轮功有罪时，两名公诉人气急败坏，但无言以对。

法官随即宣布休庭，虽没有宣判结果，但每个在场的人心中都已经明白了真相。连主审法官都说：“作为个人来讲，我对你非常同情，这事国家法律早有定论，没办法。”

从当次庭审可看出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行径是见不得光的，不得人心的，也是不敢公诸于世的，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摸摸的干，从来不敢公开报道。

我们希望更多有正义感的人呼吁营救高源和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无罪辩护后的反应（附辩护词）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甘肃省甘谷县白云小学教师蒲斌鹏，因[修炼法轮大法](#)，曾两次遭中共当局绑架、拘禁。2011年年底，甘谷县检察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指控蒲斌鹏（注：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害人的邪教，是中共邪教组织在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操纵公检法迫害好人），2012年3月19日，甘谷县法院非法庭审蒲斌鹏，辩护律师从我国现行法律，适用法律条文，案件的定性与“违法犯罪”事实是否相符合，从道德，良知的角度做了无罪辩护，要求法庭当庭释放蒲斌鹏。

律师的这一正义之举在甘谷县乃至天水地区司法界引起 了不小的轰动。甘肃省政法委为此在甘谷县紧急召开了天水地区的现场会，批评甘谷县法院办事不周，没有调查旁听人员的身份和控制旁听人数以及事先审查律师的 辩护观点，甘谷县法院院长和庭长在所谓的“绝密”会议上做了检讨，甘肃省政法委制定了律师不允许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和法轮功学员不允许请甘肃省之外的 律师的规定。随后，天水地区要求各单位传达、学习“文件”精神，将所有有宗教信仰的和法轮功人员要重点排查，重点上报。

附：律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蒲斌鹏家属的委托，本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蒲斌鹏的辩护人，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采纳。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起诉书指控蒲斌鹏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不能成立，蒲斌鹏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应该无罪释放。理由如下：

一、蒲斌鹏主观上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故意。

蒲斌鹏修炼法轮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和净化人心，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而不是为了破坏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因此他主观上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故意。

二、蒲斌鹏客观上也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

信仰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思想领域的事。而人的思想是不能构成犯罪的。只有人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要求主客观相统一，不但主观上要有 故意或过失，而且客观上要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不管一个人信仰什么，只要他在客观上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不能对信仰者定罪量刑。而就本案而言，我的当事人客观上并没有实施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实施的行为。

1、本案没有蒲斌鹏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据。蒲斌鹏究竟利用了哪个邪教组织，它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它的机构、成员、职能人员、管理形式等等都是什么？这个组织的住所地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蒲斌鹏是这个组织的什么官职？有什么能力可以利用该组织？谁听他的？他下的什么命令？怎么利用的？他有没有从该组织处接受过指令或资助等等？公诉人在法庭上并没有出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

2、没有蒲斌鹏破坏任何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实施的证据。在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出示我的当事人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及破坏了哪一条法律从而导致该法律或行政法规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得不到贯彻。

3、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4、 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与本案涉嫌的罪名没有关联性。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即使属实，也仅能证明蒲斌鹏有制作法轮功宣传资料的行为，而本案涉嫌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法轮功宣传资料并不等于邪教宣传资料，制作法轮功宣传资料也不等于是“利用邪教组织”，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

5、“思想不能构成犯罪”、“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共识，并作为一项原则被写入《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已经在几年前加入了这两项公约，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的当事人信仰并修炼法轮功是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体现，是宪法赋予被告人的权利，任何个人或国家权力机关都没有权力干涉被告人的信仰自由。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司法机关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构陷我的当事人已经构成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从犯罪构成的客体来看

1、 关于《刑法》第三百条。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成立的要件有两点：第一点，必须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必须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二者缺一不可。

从第一点来看，2000年公安部认定的十四个邪教组织里是没有法轮功的。1999年10月30日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决定》也没有涉及到法轮功。2001年5月1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74次会议，2001年4月29日由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九届第87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以下简称《解释二》）。该《解释二》说的是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不是法轮功宣传品。因此，公诉人明显是偷换了概念。既然，现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么，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人误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

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1999年10月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正式公布法轮功是邪教。199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1999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再次把法轮功和邪教组织联系起来。辩护人认为，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话就是法律。现在，中国早已推翻了帝制，实行了法制。领导人的讲话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内部通知也不能作

为定案的法律依据。因为，法官判案依据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从第二点来看，本罪名侵犯的客体是 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组织和利用”只是犯罪工具、手段和方法。所谓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是指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际实施或实际应用。所谓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它与我们通常说的违反法律或触犯刑律是有本质区别的。违反法律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即违反，触犯刑律是指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即犯罪，但无论是违法也好，犯罪也好，其本身并不能导致某部法律或行政法规不能被应用或被实施，而恰恰是法律的应用或 实施的结果。而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则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立法机构或行政机关制定颁布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整部或部份不能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应用、贯彻或实行，这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能力的，有这种能力的人只能是拥有国家公权力的人。在本案中，我的当事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一个普普通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有什么能力或权力能导致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全部或部份不能在实际中应用或实行呢？而且今天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我的当事人 是如何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际实施或应用、以及破坏了哪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全部或部份的实际实行或应用。

因此，辩护人认为，我的当事人既没有利用邪教组织，也没有破坏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他的行为没有触犯《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

四、从社会危害性来看。

任何违法行为都有社会危害性，而构成犯罪必须有很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辩护人认为，我的当事人的行为即使属实，也没有社会危害，属于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1、从客观后果来看，从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来看，仅仅是制作了法轮功的资料。首先这件事既没有在国际上引起什么轰动，也没有在中国造成什么影响，甚至都没有在甘谷引起什么任何反响，其影响几乎等于零；其次，我的当事人的行为也没有导致任何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损失或伤害，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更没有损坏公共利益等，可以说没有丝毫的社会危害性。

2、从主观恶性来看，我的当事人是没有主观恶性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轮功修炼者，一心想的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我的当事人所做的是为了向别人介绍法轮功，并[讲真相](#)给人们听，其用意和出发点是好的。

3、从手段上看，我的当事人所采用的手段也是和平的方式，是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4、从情节上看，我的当事人也就是制作了他自己信仰的资料，这个证据的真实性本身也值得质疑，因此辩护人认为这符合法律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的描述，符合《刑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希望合议庭明察。

五、关于法律和良知

“制定法律的惟一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一个符合社会正义的法律必然是向善的；建立法庭的惟一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而不是维护法律，所以法庭判案最终必须以正义为依归。法官需要的就是对正义、是非的判断，所以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法庭判案就是凭借人的良知：以人的良知来区分好法与恶法，也以人的良知来判断判案是否正义。从这个意义来说，良知既是法律的最高准则，也是判案的最终方法。”1992年2月，统一后的德国柏林法庭审判了一起枪杀案。被告是统一前的一名名叫英格·亨里奇守墙的卫兵，此前两年，他在守护柏林墙时，枪杀了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名叫克里斯的青年。他的辩护律师称，他当时只是执行命令（东德当局命令守护柏林墙的士兵对企图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格杀勿论），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他是无罪的。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限。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里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赛德尔当庭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是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这“最高的良知”（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依这种“法”去执法，也是犯罪。

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位曾经担任过边境守卫的前东德人，“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公平。……，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辩护人认为，检察官和法官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民众的希望所在。当然，法律是要的，命令也是要的，而且都应该严格遵守，但法律和命令，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人类的良知和正义。目前在我国，某些法律和命令在某种情况下、在某些人那里存在着与人类良知相冲突甚至严重违背人类良知的情形，比如在本案中，司法部门借用《刑法》第三百条来构陷、打压和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就是严重违背人类良知和道德、违背社会正义的。和谐社会应该以良知和道德作为我们每个人最高的行为准则，谁也不能借口自己是服从命令而对自己违背良知和道德的行为开脱，明知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无辜的却对他们处以刑罚就是有罪。司法是人类良知和道德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面临国家法律与人类道德良知的二难选择时，希望法庭能本着自己的良知

和道德，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维护社会正义，做出正确的选择，还我的当事人一个清白，无罪释放。

六、对法轮功问题采取和解立场才是明智的选择，是大势所趋，违背历史潮流将会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

近 年来“法轮功”案件从普遍重判向轻判是个发展趋势，并且在本案审判之前各地出现诸多法轮功案件发回重审、判缓刑、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做出其他处理的范 例……。理论界和很多司法工作人员的良知在觉醒，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最好的选择，这既为自己奠定了未来，也为以后彻底平反和纠正法轮功冤案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对于本案的最终结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司法机关不要把法轮功案件政治化，实事求是，并且我们的法官应当听从内心的召唤、听从良知的召唤对本案做出裁决。

2012 年 3 月 19 日

北京律师金光鸿为大法弟子贾文广所做 辩护词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五月六日】（明 慧通讯员天津报道）2010 年 1 月 14 日，天津市河北区大法弟子贾文广女士，被河北区大江路派出所不明真相的恶警绑架。2010 年 4 月 27 日下午，河北区 法院对大法弟子贾文广进行非法开庭。北京的维权律师金光鸿到场为贾文广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无罪辩护。天津市河北区大法弟子贾文广是于 2010 年 1 月 14 日 被河北区大江路派出所不明真相的恶警所绑架。

金光鸿律师在辩护词中说道：

“我的当事人贾文广及其他法轮功习练者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 她们习练法轮功的行为非但没有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及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反，她们因为习练法轮功而获得了身心健康，提升了自己的道德层次； 其向他人积极推荐介绍法轮功的行为也是间接地为社会作贡献。同时她们因为习练法轮功而变得更有爱心和乐于助人。而且法轮功鼓励和教育人们按照真、善、忍的 标准来做一个好人，说真话、办好事，凡事多为他人着想等等。有助于全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改善和提升。所以贾文广的行为非但没有社会危害性，相反是造福社 会。

法轮功修炼者恰恰是社会最稳定的因素，政府应该鼓励而不是打压人们的宗教信仰，而因为公民的宗教信仰就对公民定罪处罚，更是践踏人权的 行为。现在我们的公诉机关又因为我的当事人仅仅在靖江桥上散发了几份法轮功宣传资料就

把这么一个善良的弱女子推上了被告席，试图对其处以刑罚处罚，试问：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检察官和法官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民众的希望所在。可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对法轮功学员却抛弃法律原则，违背正义和良知，依据某些人的指令进行违法判决，把无数的法轮功学员送上被告席，送进监狱。你们可知道，在你们的公诉书和判决书下，多少人失去人身自由，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多少法轮功学员饱受酷刑折磨，有的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你们于心何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你们可以不相信因果报应，难道你们就不为你们的将来的前途着想吗？

从内容上看，法轮功的宣传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气功修炼和哲学思想的，比如《转法轮》等。一部分是抨击时政的，比如《九评共产党》等。就前者而言，都是一些关于气功修炼方法和中国传统 的佛教哲学、道教哲学及儒家哲学方面的内容，其目地是为了传授气功修炼方法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就后者而言，其内容反省历史，抨击时政，批评执政党。其目地是为了敦促中共当局反省历史，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真正做到依法执政，执政为民，谨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真正为百姓造福，为人民谋利益。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因此，《九评共产党》等宣传品行使的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并没有破坏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是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也没有破坏现行的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而且，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轮功学员这样做也是万不得已，他们是在遭到无端污蔑和迫害，在没有任何言论自由渠道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收入制作成资料，向世人讲清事实真相，揭露媒体的谎言。你除了看到中央电视台里的自焚和杀人，在日常生活中，你看到哪个法轮功学员采取过暴力行动或者其他过激行为，危害社会危害他人了？”

金律师辩护之后，当事人贾文广女士当庭一再表示，她散发法轮功宣传品的目地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善、忍”，都做好人，不做坏人。她并表示：当初不配合审讯、零口供，目地的初衷是不想看着你们（法院人员）犯罪。贾文广平静祥和的陈述，使法庭宁静得没有一点声响，仿佛时间已经停止。

一位法轮功家属的辩护词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某某某的辩护人，本人依法参与本案的诉讼，现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某某某的一点介绍

某某某炼[法轮功](#)，我们全家人都曾经强烈地反对过，为此我还打过她。后来在她身上没有看到社会上渲染的不良现象和不好的问题，相反的是她身体状况好了很多，脾气也有很大的改善，她更加孝敬父母，凡事都先考虑别人。我深知她的这种变化历程。

二、我作辩护所必要的背景知识

第 1. 国家法律是匡正祛邪的，是惩恶扬善的。法庭悬挂的是国徽，不是某个小集团的标志，我相信各位法官能真正从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秉公办案。我同各位法官素不相识，没有任何恩怨情节。

第 2. 说真话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政党应当提倡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诚信，人人自危，就只能奢谈“和谐”空谈“和谐”。

第 3. 据说温家宝过去访问美国和最近访问欧洲，法轮功打出的标语有“欢迎温家宝，（第二句是针对某些人的，各位可到国外网站上去证实一下）”，温家宝总理理所当然代表中国政府，由此看来，法轮功并没有反对中国政府。

第 4. 我找过很多律师，可是他们一听说为法轮功辩护就躲得远远的，生怕惹上是非，说什么上面有关规定，不能为法轮功作无罪辩护，各位想想，炼法轮功的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为什么不能拥有这些基本的权利。我是某某某的亲人，于情于理得为她辩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相关法律，为某某某进行正当辩护 是我无法推卸的责任。

第 5. 一个补充：基于目前政府对法轮功的特定政策和某某某的情况，我经常关注与法轮功有关的问题，林林总总算是对法轮功有了不少了解。

三、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不成立

宪法第 35 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是第一位的。讲真话应当提倡，言论自由应当保证。从法律角度来说，发资料本身只不过是一种言论表达的方式而已，既然有言论自由，那么发资料是一种跟随的必然的自由。在针对上访无门和法轮功各种言论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某某某发材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一种表达方式，法官先生，恳请考虑这个特殊背景。

我们经常混淆“党和国家”的概念、“爱国”跟“爱党”的关系，有时候甚至是故意混淆这种关系。其实党和国家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国家是永久的，是你我的家园，所以某某某爱国是必然的。共产党只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爱党应当出于自愿。根据判决书提供的情况，某某某所发材料包括法轮功的内容和《九评共产党》，发法轮功内容是为了讲真话，《九评共产党》

针对的对象不是国家，也不是民众，而针对共产党处理法轮功的情况，也只是对共产党一种评论，这是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一个公民的权利。因此不能因为 某某在爱国与爱党上的这种差异而剥夺宪法赋予她的言论自由。

第 1. 首先要承认的是，某某发材料是因为她从[修炼](#)法轮功中获得了好处，具有亲身经历和良好的身体感受，人之常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她觉得需要表达正义和真实。说真话鸣不平何罪之有？

第 2. 某某只同个别修炼法轮功的人有过接触，同他们没有结构性的关系，如缴纳费用、经常性的集体交流、填过什么资讯表格、发过什么誓，何谈组织？因此没有参加什么组织也更谈不上利用什么组织。

第 3. 某某所发材料均是资讯方面的，对接受人没有任何强制性或强迫性，接受人具有对事物基本的判别能力，而且完全具有选择性，因此该行为不具有任何破坏的性质。

某某发材料是个人行为，按照公诉人的推断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某某所发材料的内容没有反社会的言论及政治纲领，也没有恐吓的言论、也没骗人钱财，更无诱导别人自杀、杀人。其次，某某主观上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意图。而且某某的行为完全是和平的，理性的和非暴力的。在主观和客观上均属于表达的范畴。

退一步讲，就算某某所发的资料是有害的，前面已经表明针对的不是国家和民众，而是共产党对法轮功的特定政策，危害程度司法需要给出鉴定；如果没有这种鉴定，就不存在危害的客体，有害的行为就不存在。

再退一步讲，即使所发资料“危害”到共产党，那也只是对共产党的严厉批评，那么只能用“党纪”来处理，某某不是中共党员，用“党纪”来处理显然不合适。以党纪代国法是法制建设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问题。

起诉方指控某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请公诉人说明法轮功的组织结构如何、各级组织如何、管理形式如何，活动场所如何，真善忍哪里不对。某某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理利用这个组织的，如果公诉人不能说明这些，则指控某某的罪名不成立。

江 泽民 1999 年 4 月 25 日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即“一个新的信号”，法轮功“人不知、鬼不觉，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 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究竟（法轮功）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 重视。”这纯粹是臆测，也是向法轮功发难的起因。

后来，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均就所谓的邪教组织问题发过“通知”。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重要指

示精神”，并“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很显然这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律文件，当然也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人民法院审判的依据应当是法律，而不是某些人的臆测和两高的某些解释，否则既不能称之为“人民法院”。

在今年3月4日中央举行的“西山会议”上，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指出，2005年政府共收到3000万份要求纠正冤案的申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各位法官比我更加清楚。同时我们不妨联想一下刘少奇由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后来又成为了伟大的领袖；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三起三落。针对法轮功民间早有个说法：“法轮功迟早得平反”，是不是也有这层含义。

四、结论

1. 某某某发材料是事实，但仅仅是个人行为，没有利用任何组织；
2. 某某某发材料的行为是善意的、和平的，也是言论表达的一种方式；
3. 某某某所发材料的内容针对的不是社会和民众，主观上和客观上并没有破坏任何法律实施的意图。
4. 关于公诉人提供的关于某某某的光盘数量不具有真实性。
5. 起诉书最大的不足在于没有指证某某某所发资料危害的对象到底是谁，危害的程度如何，危害过程的机理如何。

由此得出：公诉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量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综合上述事实与推论，某某某是无辜的，她的权利应当得到保障，以彰显中国法制建设的成就，并告知世人中国人的人权能得到保障。

如果因为某某某发6张光盘就判她3年，远远超出了对其它犯罪的处罚，如行政官员的贪污腐化、工程建设的行贿受贿、甚至某些恶性事件责任者，则所体现的法律意义不是在于维护社会的安定。

今天，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对法律、法庭和法官的信任与尊重，在这威严的国徽下，我希望法庭对某某某进行客观、公正的裁决！

辩护人：家属名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七旬夫妇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词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向世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告诉人们三退能保平安，诚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能得福报，能走过劫难，这就是在救人。现在我们也是在向你讲真相啊，如果你作了三退，你也诚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善待法轮功同样能得福报，也一样能躲过灾难，这也就是在救你啊！”李福（男，六十九岁）和孙显馨夫妇在法庭上这样回答审判长。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昆明市中级法院非法庭审近七十岁的云南昆明法轮功学员李福和孙显馨夫妇。法庭上李福和孙显馨夫妇不畏强权，既正义凛然，又祥和慈悲，他们有理、有据、富有感染力的自我“辩护词”和“最后陈述”赢得了当庭所有人的钦佩和赞许的目光，打动了人们的心灵。

非法庭审完全都是在走过场，所谓的公诉人和法官无精打采，说话也小声小气，几次都要在场人提醒：“请大声点，我们听不清”。当公诉人小声、快速的念完所谓的起诉书，其中指控孙显馨多次被绑架劳教，审判长问：这是不是事实？孙显馨老人辩驳说：“我[修炼](#)法轮功没有犯罪，被劳教那是强加的，是非法的，我是坚决不承认的”。

当审判长问从家里抄出来的法轮功资料是不是事实时，孙显馨老人回答说：“这些法轮功资料的确是我的，但这不是什么犯罪证据，这全是用来救人的东西”。审判长又问：“你们怎么救人？”孙显馨用祥和的语气说：“我们救人就是向世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劝三退，告诉人们三退能保平安，诚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能得福报，能走过劫难，这就是在救人。现在我们也是在向你讲真相啊，如果你作了三退，你也诚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善待法轮功同样能得福报，也一样能躲过灾难，这就是在救你啊！”审判长无言。

随后孙显馨老人在自我辩护中连连提出许多问题要公诉人回答，公诉人却支吾不答。孙显馨老人坦荡、平和的念完了“辩护词”和“最后陈述”。最后审判长收拾收拾桌子上的东西一言不发的走了，其他的人也默默的离开了。相信大家心里都明白了真相。

孙显馨女士十二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身体非常差，疾病缠身，不但双耳失聪，听不到声音，而血压奇高，高压达240，低压达190，随时有生命危险，一直是家里的“药罐子”。一九九七年四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耳聋多年的她，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听力，半个月后，血压就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孙显馨女士不仅身体健康了，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严格要求自己，用“真、善、忍”作标准来要求自己，用善心对待他人。同学、同事、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惊讶于孙显馨炼功前后的变化，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善良、宽容的好人。

李福、孙显馨老俩口因到法轮功学员王树兰女士家，被蹲坑的昆明市西山区国保大队恶警跟踪拍照，随后于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被非法抄家，抢走大量私人物品，并被监视居住，限制人身自由。

附李福和孙显馨的“辩护词”和“最后陈述”。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 们夫妻二人现在依法行使辩护权。希望你们依照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义务提供法律援助，而不会以任何理由剥夺或限制我们辩护的权利。同时希望你们能够独立、客观、公正、清醒的审理本案，而不要因政治的影响和压力，动摇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因为政治和国家法律是两个概念，党内政策应受到国家法律的制约和 监督，否则，很难寻求法律的独立与公正。

今天我们被指控所谓的“犯罪”站在这里，其实这是对《宪法》和法律的亵渎，是对中国公民信仰自由人身权利的侵犯，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在这里我们请审判长帮助我们弄清几个问题：

一、公诉人应用《刑法》第 300 条指控我们犯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我们请求审判长让公诉人出示一下：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参加了什么样的邪教组织的证据。

我 们不否认我们修炼法轮功，但是法轮功只是一个修炼的群体，修炼中的一切都是公开的。他没有组织纲领，没有花名册，不交纳任何费用，也不强迫任何人修炼，想 来就来，想走就走，根本就不具有什么组织或宗教的任何特征。法轮功是一种上乘的佛家性命双修功法，他能使修炼者达到祛病健身，要求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标准， 修心为本，自束其心，遇到矛盾向内找，做事首先为别人考虑，不与人争斗，看淡和放下常人中的名、利、情。

大量事实证明，修炼法轮功后只会使 人弃恶从善、道德回归，从一个好人做起。1998 年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了对法轮功的调查后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目前全世界 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政府都允许修炼法轮功，都有修炼法轮功的群体。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各种司法刑事案 件中，没有一例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所为，这一点法院比谁都清楚。这样一个修炼群体只会对社会有益，怎么会危害社会呢？我们都是七十来岁的人了又能对社会构成 什么威胁呢？又怎么会去破坏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呢？

二、我们请审判长让公诉人出示一下是哪一个法律把法轮功定性为×教的？我们破坏的又是具体的哪一部国家法律？

其实，我们可以肯定的告诉审判长，而且你们也都很清楚，公诉人是根本拿不出这样的法律的。因为[迫害](#)法 轮功十一年多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把法轮功定性为

×教的法律，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法轮功。而把法轮功说成是×教的只是江泽民 99 年 11 月 25 日 接见法国《费加罗时报》记者时诬蔑法轮功是×教之后，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应声发表了诬蔑法轮功是×教的文章。一个当权者的一句话和一张报纸把一个有上亿人修炼的群体诬蔑为×教的本身就是对《宪法》的亵渎，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三、公诉人指控我们从事法轮功非法活动。按照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即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如果我们的行为构成了犯罪，那么必然有被伤害的客体。那么，我们请审判长 让公诉人出具一下判定我们的行为是非法活动的证据和法律条文。并且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危害？给谁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在中国大陆需不需要“真、善、忍”？

四、公诉人指控我们的所谓“证据”是公安警察从我们家里非法抄走的法轮功书籍、光碟、护身符及 MP3、MP4、U 盘等，说里面含有法轮功内容。请审判长当庭公布一下这些书籍、材料中的内容，并当庭播放这些光碟、MP3、MP4 看看、听听里面讲的到底是什么？其所讲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叫人向善，这些内容对国家、对社会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

在座的各位应该都 清楚，法轮功有祛病健身，净化心灵的功效，他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这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都是有益的。法轮功真相资料中告诉人们：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身戴“护身符”能保平安，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是经过千百万人实践后证实的，我们可以提供大量的证人。在楚雄州就有这样一个典型例子，在一个建筑工地有三个民工从六层楼的手脚手架跌下，两个当场摔死，另一个却毫发未损，这个人就是因为身上戴着“护身符”，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这一奇迹带动了工地的民工把劳动号子都喊成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惊动了的公安去调查、问民工们为什么要喊，回答说：“喊了就好，好了就 喊！”好不好？亲身经历的人知道，目击者知道。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在座的各位你们也可以自己亲身去实践一下，看看我们说的对不对。

请 问公诉人，你看过警察抄去的《神韵》光碟吗？听过 MP3、MP4 中讲的内容吗？《神韵》是纯善、纯美的真正的中国传统艺术，他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巡回演出，被称为“世界第一秀”，能看到《神韵》是天大的福气，希望你们不要错过了这个天赐的福份。再说你要起诉我们，也应该了解一下《神韵》是怎么回事呀。

我们还要提请审判长注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 我们的所谓“庭审“是非法的、不公的。既然对杀人放火的都能公开审理，那为什么对法轮功的审理却不敢公开呢？因为你们面对的是善良的人，这种对真善忍信仰 者的非法庭审是见不得阳光的。对我们的指控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站不住脚的，是违法的，你们的心里明白。我们知道你们对法轮功的这种审理是违心的、是无 奈的、也是心虚的。

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们不会记恨任何人，因为我们十分清楚，最终我们什么都没有失去，而真正受害的是你们这些自觉不 自觉的被利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历史证明：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历史还会证明：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将给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和不明真相的人带来巨大的灾难。

我们告诉你们这些完全是为了你们好，也是在救度你们。由不得你相信不相信，人不相信的一切都将展现。在性命攸关的问题上，我们希望你们能听一听法轮功修炼者的肺腑之言！

李福、孙显馨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最后陈述

审判长、审判员：

一、首先我们要指出，今天对我们的所谓法庭审理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因为至今中国政府都没有一个法律禁止过法轮功，审理的本身就是错误的，也是非法的。我们根本不承认，也不接受的。因为我们一旦承认了，就是承认了这场迫害——对宇宙特性真善忍，也就是对最高佛法的迫害，那就将你们推向了大法的对立面，对你们来讲就是对大法的犯罪。

二、请审判长注意：在庭审中公诉人并没有按当事人的请求提供将法轮功定性为×教的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提供任何受害人的证言证词；也没有提出那些含有“真善忍”法轮功内容的真相资料、护身符和《神韵》晚会等光碟对社会、对国家、对民众有什么不好的任何证据。所以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被侵犯人受害事实证据的指控是莫须有的，也是违法的，他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信仰自由及人身基本权利，同时也触犯了有关法律法规。

三、我们也请审判长注意：法律是用来维护正义，惩恶扬善，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叫“人民法院”而不是“党法院”。如果把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者当作打击对象，其实是对人类普世道德价值观的摧毁，这对人类来讲是非常可怕的，对你们来讲也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一个维护法律尊严的人的来讲，就应该用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判断善恶，不应该受到外来的任何干扰。因为在世间人一旦自己做了什么，最后都得自己去承受的。

你们知道吗？香港《前哨》杂志最近刊登了题为《江泽民终生后悔的两件大事》的文章，披露了江泽民自认镇压法轮功是他所干的一大蠢事的消息。此文对于你们这些被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炸雷，尽管中共当局对人民和你们全力封锁或搪塞、否定，而且还变本加厉的强压你们对法轮功实施新一轮的迫害，但无论如何现在已经到了你们还有机会自己反省、悔罪的最后时刻！所以我们要善劝你们，你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三思而行，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你们可不要再去为别人背黑锅，葬送了自己的未来。

我们也要告诉所有在座的人，“世界末日”的说法根本不存在。但是人对大法犯下的罪业造成的大劫难是存在的，《圣经》中讲的“宇宙大审判”时对人的审判是一定要出现的，人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得自己去负责，这是宇宙中“善恶有报”的真理。同时我们也善意的告诉在座的各位，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躲过大劫难，当然信不信由你。

最后，祝愿你们的善念能给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带来好的未来！

李福、孙显馨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篇未能到庭演讲的辩护词

文/金正信

【明慧网二零零三年一月八日】法官先生：

我现在依法行使辩护权，做最后陈诉。关于辩护权，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或限制，而且，有关部门有义务提供条件——比如，法院提供法律援助——使其得以充分实现。

首先，我对法院拒绝我的申请表示遗憾。我的申请是，身为共产党员的审判人员尽量回避此案。我认为这一申请是合法的，也具有充分的理由。众所周知，早在1999年7月19日以前，江泽民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严禁共产党员修炼法轮功，并在全国范围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和修炼者。许多党内法轮功修炼者被开除党籍，党内的同情法轮功的声音被强行压制。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我认为，身为共产党员的审判人员很难不受党内政策的影响和压力，对我采取有失公正的判决。但是，身为司法人员，我想你们更应当清楚这点：党内政策和国家法律是两个概念，党内政策应受到国家法律的制约和监督，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受到党内政策的影响，否则，很难寻求法律的独立与公正。我希望涉及此案的司法人员依据宪法和法律，客观公正的审理本案。

其次，我抗议本案在侦察、审判等阶段中，相关人员的程序违法行为。例如：我被逾期刑事拘留；法院从收到起诉书到开庭审理历时一年多，这已大大超过法定期限，已构成程序违法。我非常清楚我国的司法状况，我了解法院和法官在审理法轮功类案件中的尴尬，但我还要抗议。我抗议，并不仅仅为我所遭受的不公，而是为中国百姓面对的苦难而呼吁，希望每个人包括警察，法官，检察官，向自己的良知提出考问。

对于起诉书中所列：散发传单，在《明慧》网站发表和下载文章，聚会，上访等行为，我不予否认。我的上述行为是基于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完全合法的，正当的，正义的。在此，我辩护的中心是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此，我不仅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我还要控诉：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违反宪法和国家法律，它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严重破坏，它对我国公民人权的野蛮践踏，将把中华民族拖入深渊。

起诉书指控我涉嫌触犯了刑法第 300 条“组织和利用 X 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在此，我要指出：刑法第 300 条存在立法问题。我请问大家一句话：在我国，以何种法定程序，依据那些法定事由，可以把一组织定性为“X 教组织”？从国际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宪法和法律问题。中国现行法律对此是一片空白。大家知道，1999 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关于防范和惩治 X 教的决定；但此决定只是表达了国家惩治和防范 X 教的意志，并未具体立法规定定性 X 教的法定程序和法定事由。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两批关于惩治 X 教类犯罪的司法解释，就更不能作为定性某团体是 X 教的法律依据。很简单的道理：只有认定一个组织是 X 教后才存在法律处理问题。两高司法解释只有在解决“X 教”组织定性问题后才具有适用性。而且，两高根本无权立法定性 X 教组织。

那么，对法轮功的栽赃定性，不过是出于江 X X 利用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决定，其实就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而已。原因如此简单！口口声声“依法处理法轮功问题”，依的是什么法？！

我要指出：某个当权者的栽赃定性绝不等于法律依据。固然，宪法中规定，中共是我国的领导者；但宪法又规定中共必须依法行使领导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没有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中共中央的决定原则上只对中共内部有约束力，如要在全国施行，必须通过法定程序由国家权力机关予以审查，采纳之后才行。中共可就某一组织的性质问题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建议，决定权在国家权力机关。至于国家主席，我国宪法规定的是虚位元首制，并无实权。国家主席只能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行使职权。在国家权力机关并未就法轮功问题做出决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某个当权者就任意下定论，这种行为完全违反宪法（当然，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无权力直接定性 X 教，依然是个宪法学问题）。

法轮大法是正法。正是因为当权者错误的发动对法轮功的大规模迫害，我和千百万法轮功修炼者一样，挺身而出，揭露邪恶，讲清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在捍卫中国的法治，推进中国的宪政（大家知道，中国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在法轮功及其修炼者遭到污蔑和迫害时，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我现在对起诉书所列的莫须有的罪名，做以简要法律分析。

1. 上访。我国宪法第 4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述，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是不是仅仅因为我持有某类观点，批评，申述，控告，检举权就可以自动被剥夺？而在任何一个国家，此类权利都是不可剥夺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国际人权法对此有明确规定。中国不是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吗？

2. 在《明慧》网站发表和下载文章。我国宪法第 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行使此类权利当然有法律界限。我请问检察官先生，我的此类行为触犯了哪些法律界限？是捏造谣言了吗？泄露国家机密了？还是侮辱诽谤或者诬告陷害他人了？没有，全都没有。仅仅因为我持有不同于当权者关于法轮功的观点，仅仅因为我反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仅仅因为他们握有权力，我就有罪了。这种所谓的“法律界限”，与法西斯专政制度的恶法有何区别？

3. 聚会。我有一些朋友炼法轮功，我们有时聚一聚。这居然也成为一条罪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有哪部法律规定了持有某类信仰的公民不能自由见面？是不是他们就该从社会上消失而被强制看管呢？

4. 散发传单。在中国当局动用国家机器在全国范围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极力绞杀国内外关于法轮功问题的不同声音，在广大民众的知情权被剥夺，良心自由受挑战之时，我们把自身的经历，理性思考，国际国内真实情况告诉民众，这难道不是正义的吗？这就是“天赋人权”！

综上所述，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

目前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法院不仅不能审查违宪立法，就连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的抽象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是否合法的问题也没有资格做出判断。也不准法院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判决。事实上，法院审理法轮功类案件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中共政策，即使中共政策是违法的。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有良知的法官在审理本案时，都会裁决当局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违反宪法，非法，无效，都会判决我无罪。当然，反过来说，在任何法治国家也不会发生中国现在这种情况。在中国，即使法官本人反对关于法轮功的现行政策，即使法官深知我无罪，他也无能为力。他的良心可能会使他拒绝审理本案，他可能会对法轮功问题保持沉默。即使这样的消极抵抗，他也要付出代价。

法官先生，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处在你的位置上都很艰难，我都能深切的体会。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司法的相对独立权，而非司法独立；即使是相对独立权，又只限于法院，并未赋予法官独立权，理由是法官们素质不高（就是这样的规定，也还只是纸面上的）。重大，敏感，疑难案件，主审法官要服从审判委员会，下级法院要请示上级法院。当庭审理基本上是走形式。

对我的判决我已知道。我之所以自我辩护，不是为我自己，因为我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中的普通一例；我也不是为法轮功辩护，因为真理是无须辩护的，人类只能去追随真理，接近真理，同化真理。抗拒真理只能自取灭亡。如果有人因为眼睛适应不了光明而诅咒太阳，那只能证明这个人的愚蠢。法官先生，我之所以自我辩护，是为了你，是为了在法庭上所有能听见我声音的人，是为了所有会接触到我案子的人。我不要求你们在表面上做什么，只希望你们能在内心深处，抛开身份，冷静地，客观地思考一下法轮功问题，静下心来阅读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你或许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最后，我引用几百年前英国大作家莎士比亚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陈述：“不要污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否则，你的生命将处在重重危险之中。”

谢谢！

金正信

2002 年 9 月 19 日

法轮功信仰者乔华荣的无罪辩护词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在奥运前夕，衡水与冀州不法警察左铁汉等人于 2008 年 7 月 4 日下午，以黑社会的手段非法闯入乔华荣家中，绑架了乔华荣，从家中抢走了现金 800 元、1 万多元的私人存折、计算机等贵重物品。乔华荣被绑架后在冀州市公安局被以赵国胜、左铁汉为首的警察们殴打了三个多小时，对乔华荣身体造成了伤害。

现在乔华荣仍被非法关押，一到看守所就挨了打，恶警用电棍电她。进去后就被迫干奴工，做花圈，让一天做 23 个，有一次她没干完，晚上被迫加班，一直干到 12 点多钟。身体极度虚弱，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乔华荣曾在看守所昏倒时，当值警察不但不予救治，反而用电棍电击乔华荣，而且还不许别人帮她，仍逼着她干活，每天做 23 个花圈。

据了解，大法弟子乔华荣可能正面临非法起诉。据我们所知，乔华荣是道德高尚的好人，对乔华荣的抓捕、拘禁、起诉完全是违法的，希望检察院、法院的官员们能调查核实，秉公办案，给予无条件释放。

一、法律制裁的是行为而不是思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 条的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量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

二、《宪法》第五条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的效力在《宪法》第五条第三款体现：“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这里的“任何组织、各政党、各社会团体”，绝对包括共产党组织及其所属机构。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和尊严，是现行宪法的明确规定。

附 注：中国大陆法的渊源、各自地位、立法主体：1、宪法——根本大法，由全国人大制定，最高效力。2、法律——普通实体法、程序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制定，但不得与宪法抵触。3、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及各部委制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抵触。4、地方性法规——略。效力低于上。5、规章——略。效力更低。

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的罪名不成立

乔华荣被指控“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是完全错误的，理由如下。

1、从犯罪构成四要素看，触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应有的一般表现。

（一）本罪主体：一般主体，略去不谈。

（二）本罪主观方面：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破坏特定的、而非笼统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故意。此处，“法律”既然与“行政法规”并提，当然是指狭义的法律。

（三）本罪客体：国家某部具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正常实施。

（四）本罪客观方面：由于行为人的破坏，导致某部具体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能够正常实施，而且情节严重。

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观体现的立法本意是：行为人出于阻止、干扰、抵制某部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实施的目的，从而通过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的形式进行破坏。举个例子：如果行为人以某邪教组织遵从“一夫多妻”为由组织成员对抗《婚姻法》（推行一夫一妻制）的实施，情节严重，则当以本罪论处。

2、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指控乔华荣，犯罪构成的四个必备要素缺三个，如何定案！

（一）犯罪主观方面：乔华荣具有“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目的和动机么？没有！因为我们看不到她基于何种心理状态对哪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存在抵触情绪。

（二）犯罪客体：乔华荣究竟破坏了哪部或哪些“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是破坏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全部还是其中的某些条款？找不到！

（三）犯罪客观方面：乔华荣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破坏到什么程度？影响多大？是既遂还是未遂？有什么样的社会危害性？无从谈起！

可以给出以下结论：

其一，涉及到“正教”、“邪教”的定义、区分，根本不属于法律问题，而是信仰领域的话题。自从人类有宗教开始，就存在着正教与邪教的争议。当今世界不会再有人认为基督教是邪教，但基督教在创立之初的三百年是被当作邪教迫害的。既然正教与邪教的区分不属于法律问题，把“邪教”二字写进法律条文是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因此，对于本案指控罪名的前半部份，即“利用邪教组织”部份，本辩护人认为不成立。但这并不是本案指控罪名的主体和关键，毕

竟它仅仅是一个利用什么什么形式，况且一个信仰是不是邪教，不是我们在这里能够讨论清楚的。同时如果利用邪教组织就等同破坏法律实施，刑法第三百条何必还要有第二款、第三款？

其二，本案指控罪名的主体和关键是“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法轮功](#)信仰者乔华荣根本就不知道国家的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将对她的利益产生损害，更不知道如何才能“破坏”一部法律的“实施”。实际上，公诉人也无法找到国家的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遭到乔华荣“破坏”。

2.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的成立，在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才构成犯罪。而法轮功信仰者乔华荣连国家的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对自己利益会构成威胁都不知道，就无从谈起主观上故意还是过失。

3. 破坏法律实施不同于违反法律，一般人也根本不知道如何做才能够破坏一部法律的“实施”。

综上，本人认为：本案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无论是否属实，无论数量多少，只要这些证据不能证明乔华荣故意阻挠和破坏某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并造成严重后果，就不得以本条罪名对她进行拘留、逮捕、起诉、审判，否则就是错案。

四、[讲清真相](#)无罪

宪法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是第一位的。讲真话应当提倡，言论自由应当保证。从法律角度来说，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本身只不过是一种言论表达的方式而已，既然有言论自由，那么制作和发真相资料是一种跟随的必然的自由。在针对上访无门和法轮功各种言论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制作和发材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一种表达方式，请各位考虑这个特殊背景。

在不公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这是做人的基本权利。法轮功学员只是用自己的血汗钱讲述自己炼功受益的真实情况和无端遭受迫害的事实，与此相反那些诽谤、打压、诬陷法轮功的所谓条例、法规等等强加法轮功学员罪名的依据，有谁敢把它们拿来一一与宪法对照？

综合上述事实与推论，现在看来，乔华荣是无辜的，当初对乔华荣的拘留、逮捕、起诉就是错误的。因此，请法庭立即当庭宣判乔华荣无罪并予以释放。而绑架、抄家、拘禁好人的执法犯法的警察，才是真正利用职权践踏法律的罪犯。

根据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按照这样的规定，未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的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就构成了对公民的非法绑架和非法拘禁。另外左铁汉等人的行为本身也构成了渎职与入室抢劫罪，应依照相关法律予以量刑制裁。

辩护人： 乔华荣家属及衡水法轮功学员
2008 年 10 月

法庭辩护词：真正的罪犯是发动迫害的江泽民

【明慧网 2003 年 7 月 20 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

我 现在依法行使辩护权，做最后的陈诉。我希望法官先生依照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义务提供法律援助，而不会以任何理由剥夺或限制我辩护的权利。同时我希望法官先生独立、客观、公正、清醒的审理本案，而不因政治的影响和压力，动摇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因为政治和国家法律是两个概念，党内政策应受到国家法律的 制约和监督，否则，很难寻求法律的独立与公正。

今天，我辩护的中心是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此，我不仅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我还要控诉当权者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违反宪法和国家法律，这场迫害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严重破坏，对我国公民人权的野蛮践踏，它将把中华民族拖入深渊。

一、对法轮功的法律适用存在立法问题

起诉书指控我涉嫌触犯了刑法第 300 条『组织和利用 x 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这里就存在前提问题，即在认定一个组织是×教后，才存在法律处理问题，两高司法解释只有在解决『x 教』组织定性问题后，才具有适用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法轮功被独裁者诬蔑为『x 教』的由来，就不难得出对法轮功的法律适用是非法定性问题。

◎ 当权者以党代法，确定镇压的错误决策。

确定镇压法轮功的开端，是 1999 年 4 月。4 月 23 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 300 多名防暴民警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流血事件，并抓捕 45 人。为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4 月 25 日万余名法轮功学员上访 国务院信访办（秩序井然，没有口号标语，没有妨碍交通。朱总理接见并要求派代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会谈后，释放了天津学员，晚八时上访学员静静散去）。

4 月 25 日当夜，江泽民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指控上访事件有『幕后』高手在『策划指挥』（绝密，中办发电（1999）14 号）。6 月 7 日，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该档于 6 月 13 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绝密，中办发电[1999]30 号）。在拿不出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以欲加之罪确定了镇压的错误决策。

◎镇压在先，立法在后，以立法代司法，是违宪行为。

1999年6月10日，为了镇压法轮功，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国家法律机构认定，由江××授权，中央设立了『610办公室』。这个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权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随意对法轮功学员拘留、劳教、判刑、加期。

1999年7月23日，各大报纸报导了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讲话，要求贯彻中央关于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决定，同时报导民政部作出的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公安部依此发布了六条通告，全部以『禁止』开头。按照这样的通告，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信仰法轮功，即使什么也没干，你的自由权利统统被剥夺。至此，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炼功的权利，甚至没有了辩白、申诉的机会。

1999年7到10月，三个月时间，没有合法法律，不经任何合法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铺天盖地的镇压。使用了全国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刊物，各级政府全部卷入。

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才作出了取缔×教组织、防范和惩治×教活动的决定。同一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决定』对『x教』的定性语言模糊，没有法律定义，不具备成为法律的质量。

『决定』的推出以镇压在先，立法在后，法律追溯以往行为的做法违背了立法的起码忌讳，有任意定义之嫌。

一是对『x教』这个概念，缺乏语言学上的定义，更不要说法律上的严格定义。任何《词典》均查不到『x教』这个词，它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用词。

二是对『×教』没有作出法律定义的前提下就宣布取缔×教、宣布非法，实质是一个指哪打哪，想取缔谁就指谁是『x教』的法律。

三是与宪法规定相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四是刑法第三百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是针对违法犯罪行为，而不是对具备某种宗教或信仰特征的组织，或者参与这样的组织和个人。判断行为的罪与非罪，必须经过法庭的合法程序，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来作出司法判断。

二、法轮功事实上不存在问题

我国法律有一条原则叫：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法律依据而言，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镇压法轮功的适用法律一开始就是非法的，直接就是一场政治打压运动。那么事实真相又是什么呢？

◎法轮功及其洪传历程浅介

法轮大法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1992年5月开始在中国社会公开传授；1995年起开始走向世界。修炼法轮功对个人来说，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对社会来说，修炼法轮功能增加社会稳定、包容与祥和，提高人们的整体精神生活质量。因此，自传出以来仅凭人传人、心传心便修者日众。1992年至今十余年内已传遍中国和世界60多个国家及地区，受到各国政府、团体八百多项褒奖与支持，目前全球修炼者人数超过一亿。

◎多方调查证实，大法百利而无一害

1997年初，经公安部指示，全国各地公安局对法轮功进行调查。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

1998年5月底，北京有线电视台播放了何祚庥提供的诋毁法轮功的节目。节目播出后，学员立即向何氏和北京电视台指出节目违背事实，并以亲身经历澄清了事实真相，电视台领导说这是建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认定李洪志传播谣言邪说及一些骨干利用法轮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但通知中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利用法轮功违法犯罪的证据，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通知》采取先定罪、后调查的程序。经调查最终发现法轮功学员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任何犯罪事实。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同志为首的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认真调查、研究，得出了广大群众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了健康的身体（祛病健身有效率达99.1%、得到了家庭的和睦、每年可节省上千亿的医疗费）；得出了法轮大法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朱总理根据乔石的调查报告对有关联名信作了批示：不反对、不争论、不干涉。

◎对善良的法轮功民众的镇压

从1999年7月20日起，当权者江××出于小人的妒忌，开始了对法轮功民众的镇压。三年多来，上亿的法轮功群众被迫害；几万人被送进监狱与劳教所和精神病院，上千的人被无辜地迫害致死，而且这种迫害还在进行着。更为恶毒的是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胁迫国家宣传机器漫天造谣诬陷法轮功，制造恐怖、隔阂与仇恨。如媒体播放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惨案就是一个欺世谎言（请参见2001年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有关电视录影的鉴定，宣布天安门『自焚事件』为中国江××所策划、对法轮功的镇压系『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法轮功学员的任何和平理智的抗争行为都是维护国家宪法

法轮大法是正法。正是因为当权者错误地发动对法轮功的大规模的迫害，在不公正的对待下，三年多来，千百万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去北京上访还是在天安门打横幅，还是发传单等，都是揭露迫害，讲清真相。他们说的就是一句话『法轮大法好』；他们做的就是一件事，向世人展示好人被无辜迫害的事实。他们在承受巨大的苦难下，始终坚持真善忍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没有发生一例暴力反抗事件，没有一句政治口号和政治诉求，是为真理和信仰自由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正气让他们做到了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在捍卫中国的法治，维护中国的宪法。其法律依据分析：

※关于上访。中国宪法第 4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一任何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述，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那么，是不是仅仅因为法轮功持有某类观点，批评、申述、控告、检举就可以自动被剥夺？而在任何一个国家，此类权利都是不可剥夺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国际人权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而中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关于在《明慧网站》发表和下载文章。中国宪法第 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行使此类权利当然有法律界限。请问检察官先生，此类行为触犯了哪些法律界限？捏造了谣言？泄露了国家机密？还是侮辱诽谤或者诬告陷害他人了？没有，全都没有。仅仅是反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仅仅因为当权者握有权力，就有罪了。

三、世界法庭正义审判之声

在世界走向全球化、法律逐步与国际接轨的今天，任何恐怖主义行为都要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都要遭到历史的正义审判。各国起诉的主要进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美成立

2003 年 1 月 20 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美成立。该组织成立声明：鉴于天理和人权神圣不可侵犯；鉴于人皆有信仰、思想和言论自由；鉴于江××凌驾于宪法之上，操纵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的国家恐怖主义；鉴于数以千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鉴于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亲属、朋友、同事和单位受到株连，全中国人民受到谎言诬陷的『洗脑』；鉴于当权者策划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历时四十二个月；鉴于中国现有的法院、公安、律师系统迄今无力、无法和无道德勇气站在职业公正的立场上对这场迫害实行调查并予以制止。该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调查『天安门自焚事件』的通告

2003 年一月二十一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了通告，从即日起开始追查，并公布了第一批事件当事人和相关者作为取证名单。

◎全球审判已经开始

2003 年 3 月，在联合国第 59 届人权大会召开之际，瑞士『穷追未受惩罚者』主席、瑞士律师格朗特先生发表声明：启动了一项针对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民的法律诉讼程序，他一旦踏上瑞士的土地，就将面临正式的法律诉讼。并提到目前世界多个国家都在准备按照当地法律起诉江××。

全世界范围，不仅仅在欧洲，还包括亚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将形成天罗地网，把对中国无辜百姓犯下罪行的江××送交法庭，面对正义审判。同时，江××的犯罪事实的详尽报告（具体到被迫害人），已被联合国记录在案。全球审判已经在进行中，终有一天将会把一个或更多个对迫害法轮功负有责任的人送入监狱。

◎顺利完成递交司法程序

2003 年 4 月 14 日下午，代表法轮功学员控告江××及『610 办公室』的原告律师泰瑞·马什来到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美国联邦法院伊利诺州北区法院，递交了江××及 610 办公室的罪证材料以及起诉的法律程序证据，顺利完成了这一步司法程序。

◎2002 年的主要国际动态

2002 年 7 月 20 日，加拿大六城市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2002 年 7 月 24 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第 188 号决议案，要求江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2002 年至 2003 年元月期间，中国多名官员出访期间在欧美等国受到起诉，他们是江××、罗干、曾庆红、李岚清、刘淇、夏德仁、周永康、赵志飞。

◎江××违犯国际法、中国宪法和法律的犯罪事实概要

1. 是滥用国家权力罪。违反中国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要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行使权力和发布命令的决定，违反党章关于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独断专行地制造了打压法轮功的民族浩劫。

2. 是构成侮辱罪。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超常的科学。李洪志先生是真理的传播者。他通过传法教功使一亿人身心健康、摆脱病痛；教人向善，促进社会精神文明是 利国利民的天大幸事。而当权者江××颠倒黑白，采取编造谎言、栽赃陷害的卑劣手段，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大搞诽谤宣传，欺骗人民；同时进行资讯封锁，完全剥夺了中国公民的知情权。大搞人人过关。还利用报纸、书籍、电视台、广播、漫画等形式谩骂、攻击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逼迫上火车、汽车、船台的旅客践踏李先生的肖像。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陷害严重地触犯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6 条和第 33 条，根据我国刑法第 243 条，构成了诬陷罪、诽谤罪。

3. 是非法剥夺信仰自由罪。江××违反中国宪法第 36 条关于公民有信仰自由的规定，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用强权和暴力逼迫他们放弃修炼，大搞所谓思想『转化』和囚犯式的暴力洗脑，强奸民意。

4. 是构成非法搜查、非法拘禁、侵害公民通讯自由罪。根据中国刑法第 238、245 条的规定，构成侵害公民通讯自由罪；同时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9、14 条；违反中国宪法第 37、39、40 条的规定，对广大法轮功修炼者肆意进行非法监视、跟踪、窃听、绑架、搜家、拘捕、罚款、劳教、判刑。

5. 是剥夺言论自由和上访权利罪。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19 条、21、22 条的规定，违反中国宪法第 35 条和《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剥夺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和上访的权利。

6. 是根据中国刑法第 232、234、247、248 条的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伤害罪、刑讯逼供罪、施用酷刑罪。同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 5 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7 条、《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第 2、4、6、7、12 条的规定，违反中国宪法、民法通则、劳改劳教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如长时间拷打、背拷、吊铐、固定在『死人床』上、坐老虎凳；三万伏特高压电棍击脸、口腔、乳房、肛门、生殖器；冻饿、冷水浇、曝晒、开水烫、炮烙、烟头烧、针扎指甲、吃大便、野蛮灌食、灌粪便、灌盐水、灌辣椒水、打破坏神经的毒药等四十多种酷刑。公开报导被虐杀的有六百多人。

7. 是按照中国刑法第 397 条的规定，构成渎职罪。把镇压法轮功摆在高于一切的首位，不惜耗费数额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镇压法轮功，给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失。

8. 是构成群体灭绝罪。其镇压的手段是诽谤加屠杀，如「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指令。

四、个人的要求

综上所述，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无论从事实还是法律方面来看，真正违法的是当权者。法轮功是无罪的，他们的一切行为是一首展现社会道德与良知的正气歌。

各位法官先生，我深知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处在您的位置上都很艰难。事实上，法院审理法轮功类案件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当权者政策。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裁决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违反宪法，非法、无效，都会判决我无罪。反过来讲，任何一个法治国家也不会发生中国现在这种情况。在中国，即使法官本人反对关于法轮功的现行政策，即使法官深知我无罪，他也无能为力。

他的良心可能会使他拒绝审理本案，他可能会对法轮功问题保持沉默，即使这样的消极抵抗，也要付出代价。中国宪法只规定了司法的相对独立权，而非司法独立；即使是相对独立权，又只限于法院，并未赋予法官独立权。重大、敏感、

疑难案件，主审法官要服从审判委员会，下级要请示上级。当庭审理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

我之所以自我辩护，不是为我自己，因为我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中的普通一例；我也不是为法轮功辩护，因为真理是无须辩护的，人类只能去追随真理，接近真理，同化真理。我之所以自我辩护，是为了你，为了在法庭上所有能听见我声音的人，为了所有能接触到我案子的人。我只是希望你们能抛开自己的身份和政治因素，冷静地、客观地、理智地思考一下法轮功问题，为自己和中国人民负责；同时无条件释放我和所有大法修炼者。

大陆大法弟子

2003 年 5 月

浙江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德喜在法庭上的辩护词

文 / 刘德喜

【明慧网 2005 年 3 月 27 日】

审判长、合议庭成员及在座的旁听人员：

我叫刘德喜，是台州市椒江区的市民，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女儿及爱妻。家中的亲人都盼望我早日出去照顾他们；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等待我同他们团聚，共同探寻人生的道理。这也是我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友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我以宇宙的特性“真、善、忍”为准则，一心向善，修心养性，练习法轮功五套功法达到了祛病健身、做好人的目的。多年来我修炼大法的实践证明：法轮大法真真实实是正法！我绝没有做违反国家法律的事，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负责。

雨果说：“信仰，是人们所必需的，什么也不信的人是不会有幸福的。”我的愿望就是人们都能够提高道德修养，做有利于社会的人；都能够知道善恶有报，做坏事必将受到天理的惩罚；都能够明白“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心性，约束自己的言行，社会必将安定，人民必会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修炼和弘扬法轮大法对任何社会都有百利而无一害。

2004 年 3 月 2 日晚，我被椒江区国安大队王凌军等人非法绑架，严刑逼供，连续 150 多个小时不让我睡觉，逼迫我在假笔录上签了字。椒江区检察院提审我时，我同经办人说以前的笔录都不是事实，不能作为公诉我的证据。现在本案拖了一年多，区院仍然判我十年徒刑。这是对修炼法轮功的公民滥用法律、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王凌军等人破坏了我幸福美满的家庭，使我亲人离散，迫使我爱妻从住房三楼跳下，右脚、右手骨折，医药费用了多少我也不知道，是否落下残疾我也不清楚。我在看守所与亲友通信和各位领导通信都很困难，正常的家

信都要经过王凌军等人查看，一年以来没有收到过家人寄出的来信。这是对我人权的侵犯。还有许多讲清本案、向各级领导反映情况的信件也寄不出去，我的申诉、辩护、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都被剥夺了。

法轮功的一切资料都是在[明慧网](#)上公开发表的，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查看。为了蒙骗世人，邪恶之徒不仅栽赃陷害，还拼命控制媒体、封锁网络，妄图掩盖事实真相。中院法官，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法， 无论是谁，权力有多大，地位有多高，参与迫害大法 and 修炼人就是毁灭了自己的未来并将祸及亲人。我真心劝你们千万不要反对大法，要善待大法。

法 轮大法在全世界 60 多个国家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修炼者超过一亿，多国给予师尊褒奖多达 1000 多项，各国也允许登记注册法轮功佛学会。修炼大法的人们，不分肤色，不分人种，普遍都达到了祛病健身、提高修养、不图名利、忠于职守，做好人中的好人这些在修炼前很难达到的境界。我认为中国人最有福分，因为 中国人自古以来受孔孟之道和老子道家思想的熏陶，最有思想基础来理解法轮大法这部佛家大法的深刻内涵。千万不要因为那些不值一驳的丑剧谎言而错过这万古不 遇的机缘。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善待大法弟子，就是为自己开创美好的未来。

人生的命运全在于对大法的一念。中国政府中的 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 6 年多来，大法弟子坚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各级领导讲清真相，使很多人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我们台州市修炼大法的人和证实大法 的人很少，你们看到的大法被迫害的资料也不多，很容易偏听偏信，被谎言所欺骗。我们大法弟子无怨无恨，所有的付出只为了人们了解真相。希望你们用自己的头 脑思考，用自己的理智判断，不为一时的权力或利欲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到后悔也来不及了。

去年台州新闻报道，东南亚海啸，死亡达 30 万 人；还有 98 年大洪水，北方干旱，个别地区蝗灾，使庄稼颗粒无收；2003 年的萨斯和 2004 年的禽流感，搞得人心惶惶；2004 年 8 月 12 号下午我的案 子开庭时，台风“云娜”登陆台州，房屋倒塌数万，直接经济损失几十个亿，回顾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天灾人祸何其多。现代科学解释不透的事就说是自然现象。其实，这些都是善恶必报的天理循环。对真修向善的人进行大规模的迫害，老天爷能容吗？信仰“真、善、忍”，人民就会自觉遵守道德，社会安宁，安居乐 业，天灾人祸就会越来越少。相反，如果人无善念，彼此为敌，为了一己私利无恶不作，犯罪就会越来越多，盗、抢、骗、贩毒等等，监狱人满为患。更大的罪恶就 是对好人进行诬陷和残害。这样的社会怎会不遭天谴？正如师尊的经文《法正》所示：“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法 正，乾坤正，生机勃勃，天地固，法长存。”

上诉人：刘德喜
2005 年 3 月 1 日

注：

刘德喜，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明村人，1998年9月得法。1999年7.20江××发动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11月和妻子带着女儿进京上访，被当地政保科带回关押在当地看守所。

2000年元旦前夕，刘德喜一人第二次进京上访，被北京恶警扣留叫当地610、政保科带回本地劳教两年半。他们说其妻小罗没看好丈夫，非法关押了她半年，家被抄了五、六次，连隔壁婆婆住的房也不放过。一万多元现金、录音机、录像机被抄走。抄家时刘德喜的姐夫（未修炼）就说了一句话：你们拿他东西干什么，就被带走关押了一天。婆婆只因说了一句我儿子学好没有错就被关押了两天。逼家属交了两万五千元钱并代写“不练功”的保证才放其妻小罗回家。在劳教所里，为迫使刘德喜写悔过书等，每天24小时有人跟着，不让睡觉。当时他一走路，人就倒下去。关押两年零三个月后放回家。他给劳教所管教写了信，所有在强迫下写的，说的都不是真心话，并告诉他们自己炼功后受益的情况。他们通知了610政保科，一家三口在2003年7月被逼流离失所。

2004年3月2日晚，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国安大队王凌军和苗某指使并非法绑架了刘德喜，其妻小罗从三楼跳下，摔成多处粉碎性骨折，家中两万多元钱及大法书、资料被抄走。2004年8月12日刘德喜被非法判刑十年。当天，刮起了几十年不遇的台风。刘德喜一直在上诉。2005年3月1日法院第二次开庭，刘德喜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递交了上述辩护词（节选）。法院维持原判。刘德喜戴着手铐和脚镣被转到金华的监狱。当地恶警林徐志说：听说他们全家都炼，什么时候去抄他们家。他媳妇跳楼不知好了没有，要是还接触炼法轮功的，不能放过她！

椒江区看守所电话 0576-8223781
恶警林徐志电话：139 0576 9099

法轮功学员王孝民妻子的辩护词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六日】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王孝民八年来坚持“真、善、忍”信仰，遭到邪党警察八次绑架、非法关押，其中两次被非法劳教。王孝民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零点被小岭子派出所不法警察强行绑架、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第一看守所。十二月十一日，邪党太和法院对王孝民进行非法审判，未公布审判结果。二零零八年元月三日，家属询问后得知，太和法院对王孝民非法判刑四年，日前王孝民已提出上诉。

下面是王孝民妻子为他的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你们好！我是王小平，是上诉人王孝民的妻子。受上诉人的委托，作如下论述：一审法院对我丈夫王孝民的审理违背事实及法律程序，定罪不能成立。请审判长、审判员核实。

一、被非法抓捕的经过

二 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半夜零点零五分，我们一家正在睡觉，被惊醒。一伙人破窗而入，闯入我家，说要我丈夫去派出所做个笔录，完事就回来，然后就要抓我丈夫 走。我们一家三口本能的抵制，撕扯中来人撞碎了我家的门玻璃。小岭子派出所的警察葛博拿着枪对着我儿子说：“你别动！”我儿子才十一岁，幼小的心灵受到了 急剧的恐吓，至今不敢回家来睡觉。

那天我家周围先后围了有四、五十的警察，围困了将近六个小时。我婆婆听到了响动，过来看看，见一警察手拿 大棒子把住后门，不让过。婆婆质问来人，为啥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其中一个太和分局的警察，狠狠的给了我婆婆一个耳光，六、七十岁的老人，脸都给打肿 了。周围的村民都说，咋打人呢？孝民可是个好人那，为啥抓人家？这平时抓坏人，没见你们这么多警察，这抓好人咋来这么多人呢？上午六点多钟，警察骗我老 舅，说要和我丈夫唠唠，我丈夫刚出屋，几个警察跳墙过来扑了上去，把他抱住，扭送走了。

我们家属追到太和分局要人，没人管。二十一日，我们 又到市公安局找，信访办的警察先给小岭子派出所的警察通过电话，然后对我们说：“中央有新指示，让严打法轮功，没把你们全家抓起来就不错了。”我们举证警 察打人，那个人拍桌子喊道：“谁打的，有证人吗。”故意抵赖的表现分明是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就这样，我丈夫被关进了锦州市第一看守所，一关就是四个多 月。我们一家投诉无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无辜的遭受迫害。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锦州市太和区法院对我丈夫进行了非法审判，不 许他辩护，我丈夫告诉法庭：法轮功学员是被迫害的，根本就没有罪。在整个过程中，法庭也没能举证我丈夫有罪。当天没宣判结果。二零零八年一月，我们家五次 找到太和区法院的审判长李立辉问讯情况，才被告知，我丈夫被秘密的判了四年刑。一月三日我丈夫已经上诉，我们家人也全然不知。

审判长、审判 员，到目前为止我丈夫被剥夺人身自由已有四个月二十二天了，除了零七年八月二十几号我们追问小岭子派出所为啥抓人时，派出所所长刘旭草草的给补开了一张拘 留证，还拒不签署办案人姓名。之后对我丈夫所谓的“一审”过程中，既没通知家属，又没给判决书之类的任何凭据。请问：

（一）王孝民在家睡觉犯的是啥罪？

（二）警察抓人、判刑要有必要的手续，可是逮捕证、判决书等一概没有，是否合法，合乎法律程序？

（三）警方诬蔑我丈夫是在逃犯，扰乱了社会秩序，事实是我丈夫是村里公认的好人，而且被抓当天是深夜子时，能扰乱到谁呢？

二、我丈夫是好人 为坚持信仰屡遭迫害

一 审对我丈夫的控罪是所谓的“利用邪教组织危害法律实施”。我虽不懂那么多法律条文,据了解,直到目前也没有一条中国法律明确规定“法轮功是×教”。倒是《宪法》三十五、三十六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显见是政府在剥夺了我们的这些自由。这里说明一点,法轮功是正?是邪?不应是哪个人或哪个组织能够判定的,得看他的主旨和社会效应,是否使人心归正,道德高尚等。

我丈夫从前身体不好,患有乙肝、胃病和肾结石。乙肝治了三年,花了近三万元,也未治愈。由于疾病缠身,他不爱干家务。九八年底[修炼](#)后,他处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自觉做好人。所有疾病不翼而飞,邻里谁家有个棘手的活,他都主动帮忙。九九年十二月,下了一场大雪,村上的一段坡路被封住了,他一个人主动去扫雪,后来一个做买卖的过来帮忙,足足干了半天。零六年春,孝民在村里拾到一百元钱,他先将钱送到附近的舅舅家,让舅舅家的人等着看谁来找钱。四十多岁的女失主王某接过钱时,感慨地说:“这真是炼法轮功的,才能给钱,别人不会还我的。”在永昌饲料厂打工时,他以厂为家,见到玉米粒都拾起来,老板对他很满意。在锦州打工时,他工作任劳任怨,经常帮助工友洗衣服。村里人都说,孝民可是个好人哪!

九九年政府开始镇压法轮功,他觉着自己有责任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进京上访被抓回,送到了拘留所。十月再次上访,在北京,他的外衣、兜里的钱全被警察抢去。回来后又被小岭子派出所勒索一千元。十一月,他被太和区政法委绑架进了“转化”班,被罚款二千元。看到媒体整天诬陷法轮功,人们都被欺骗了,他决定还得去上访。那时为了防止法轮功学员上访,火车站限售进京的车票,他只好骑自行车进京,骑了三天三夜。回来后被小岭子派出所拘留,家里又花了六百元。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他被骗到小岭子派出所,后送进市看守所,十八天后被送教养一年。零四年二月十四日,因访友,被女儿河派出所劫持,小岭子、女儿河派出所到家中抄家。送去锦州教养院时,因体检不合格,回到家中。十天后,去一学员家时,被太和派出所绑架,被劳教二年。零七年三月十二日,太和分局及小岭子派出所抄家、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刘立涛,同时也抄了我们家,当时孝民不在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在家中被抓。八年来,王孝民因为坚信“真、善、忍”做好人,被拘留、劳教、抄家、罚款,几进几出,没在家过几天安生日子。

三、我的心里话

1、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从没有讲过法律。

九九年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是因为学法轮功的人多,以“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为借口发动了镇压。中国的法律实际已沦为他打击合法信仰的硬性工具。回顾历史,中共的法律从产生之日起就被铸上了“中共”的私家烙印,为统治阶级服务。几十年来,经常变动,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都多次修改、增删,但根本上,为“维护统治阶级意志服务”的宗旨从来没变。对法轮功的处理过程中也是先内定为“×教”,后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障镇压。从这一点上讲,审

判长、审判员，你们作为中共体制内的党员、官员，如果不能超越“中共法律”这个先天的局限，在执法中，是不可能对法轮功或者我丈夫的冤案作出公正、客观的评判的。

2、如果“真善忍”，是邪的，那么“假恶斗”才是正的吗？

我丈夫按“真善忍”做好人，是村里公认的好人，八年中，“九进九出”遭尽了迫害。我们一家已被拆的支离破碎。现在孩子被吓得不敢回家，家里只剩下我一个女人，为了生活，还要供孩子上学，去打工。没有休息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很晚回到家，还要自己烧炕、做饭。累极了常常是倒头便睡。记得有一年，孝民被抓走了，我一个人在家。我的髌骨寸劲儿闪了，白天还好好的，到了晚上，整个就不能动了，一翻身疼痛无比，那时我多么希望，他能在我的身边，帮我一下。这样挨到了天亮，能动弹了，爬起来去上班，从更衣室到工作间，很短的路走了近半个小时。这样的日子我已经熬过了八年。

审判长、审判员，你也有自己的家庭，父母，子女，相信您能体会到我的苦衷。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反对“真、善、忍”，反对做好人。那么它的价值取向能是什么呢？只有“假、恶、斗”。这样的政党又能给百姓、给社会带来什么呢？是恐怖与灾难。时下人们都在退出中共，选择自救，不能不说是明智之举。常言道，“善恶有报”、“人心向背 关乎社稷”。中共搞独裁专制，从不管百姓的死活，早已失尽了人心。这样不人道的邪党，怎能不被社会规律所淘汰呢！

我丈夫已被迫害八年了，我始终相信他会回来，因为他是好人，他没有罪。这些年，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法轮功，同情我们一家的遭遇，对此我感到很欣慰，不仅仅是为我一家的苦难得到了理解。同时，我也看到了，人们都在逐渐地明白真相，人性在觉醒，这也正是我们民族道德回归的希望。

我乐观的相信，善良的人心都能够冲破红色恐怖的桎梏，自由自在的舒展自己的良知。

辩护人 王小平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

针对非法判决的辩护词样本（参考）

文/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 2004 年 9 月 16 日】下面是一份学员针对非法判决的辩护词样本，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加强同修的正念、讲清真象、抵制[迫害](#)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对遭受迫害的同修及家属起诉邪恶能够有一定帮助。

××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____，性别____，年龄____，于____年__月__日在____地点，因散发[法轮功](#)真象传单被判刑__年，判决书文号。因判决与事实不符，当事人不服，特提出

上诉。判决书称：“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我认为与事实不符，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接受，理由如下：

一、从法律依据或决策层讲，“利用邪教组织”的罪名不成立

1、无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或全国人大没有一个正式文本将法轮功“定性”，也就是说党、政府和国家没有给法轮功“定性”。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9 年 10 月 30 日做出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高”关于“对邪教的司法解释”中也没有提到法轮功三个字，也就是说法律从未认定法轮功是×教。充其量是 1999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教》，这个只代表中央领导个别人意见的评论员文章，不能作为“定性”的法律依据，而且是严重违法的，该文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完全是对法轮功的诬蔑诽谤。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行事做人，不符合任何有关“邪教”的定义。是不是“邪教组织”不是哪个中央领导就能定性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即定性定罪过程必须是符合司法程序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将广大法轮功学员按“邪教组织”罪名处置是严重违法的。

2、那么基层法院又为什么按“利用邪教组织”的罪名给我量刑呢？原来“两高”是明一套，暗一套，各自又另外下了一个“通知”，文不对题的以“移花接木”的手法将邪教的罪名扣到法轮功头上，“暗箱”操作。1999 年 10 月 31 日高检发研字（1999）22 号，最高检察院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通知”。1999 年 11 月 5 日法发（1999）29 号最高法院以同样的标题相同的内容也下发了“通知”。法发 29 号“通知”中说“这一重要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依法严厉打击邪教组织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各级法院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并“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通知”与其说是司法解释，倒不如说是行政文件。所谓“司法解释”就是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对具体问题的解答，也就是说“法律”是“解释”的根本依据和前提，而没有法律依据的“司法解释”是违法的，是无效的。如前所述，“法律”从未给法轮功认定为×教，那么基层法院如果把它当作“司法解释”执行的话就完全是违法的。另外，将法轮功当作是个“组织”，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法轮功只是教人向善达到身心健康的一个功法，根本不是“组织”的概念。如果要算“组织”的话，这个组织太大了，目前已发展为六十多个成员国了。那么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定性”文章不知道是不是包括全世界？

“通知”如果按“中央指示精神”（实质是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在内部传达的，而非中共中央文件）办，不但“通知”内容与“标题”完全不符外，而且还完全颠倒了司法程序。就好像张三没有杀人，中央领导说了“张三是个杀人犯”，那么全国人大（知道这样不对），迫于压力就赶快制定个“惩治杀人犯罪”的法律（作为立法行为也没错），那么公检法部门于是就将张三捉拿归案；按照杀人犯罪条款对张三起诉、判刑。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认定是杀人犯的张三无疑成了冤死鬼。也就是说对法轮功群体是先定罪，

再立法、立案。这一完全违反法律程序的一切处罚 和判决，毫无疑问是违法的，是不公的。公检法部门知法犯法，严重触犯了《宪法》和诸多法律：

（1）触犯了《宪法》第三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六条和《刑法》第四条“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2）触犯了《刑法》第三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的规定。

（3）触犯了《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刑事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检察院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4）触犯了《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那么“通知”按“中央指示精神”办，而不是按法律办，是不是超越了宪法与法律 呢？

3、给群体定罪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是不公的，是不合法的。法轮功是不是“×教”这关系到亿万学员的切身权益，因而非同小可。国际法律 界没有给群体定罪的先例，都是慎之又慎（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头目也是按个人犯罪处罚的，至今仍然合法存在），现在法轮大法已传遍全世界，那你中国能给全世界“定罪”吗？因此给某个群体定罪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话说回来，共产党是个组织，那么一些党员干部自杀、杀人，利用职务犯罪，那么能不能说是“利用×教组织”犯罪呢？恐怕不能吧？自己犯罪不能让党组织负责，因为组织没有教你去犯罪。同样法轮功讲真善忍，不能自杀、杀生，更何况“天安门自焚”事件破绽百出，能让法轮功负责吗？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有关真象资料以证明法轮功是清白的，但是别又荒唐的将我法律上允许的这一辩护行为又说成是“破坏法律实施罪”！那我们就永远理不清孰是孰非了。为什么有人怕我们讲真话，不就是怕人揭丑吗？只许造谣诬陷别人，不许别人澄清事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难道面对打劫的强盗，非但不将强盗绳之以法，反倒追究起受害人的自卫行为，天理何在！

二、“破坏法律实施罪”不成立

1、民政部、公安部属国务院部门，代表不了国家和政府，所发布的“事项”属“规章”性质，不是法律和法规。查阅所有的法律书，针对法轮功处罚的（全国人大制定 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至今没有一条，换句话说，炼法轮功不违法。充其量还是1999年7月22日为无理镇压法轮功，民政部公布的“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和公安部的六禁令“通告”，根据《宪法》第三节“国务院”第九十条“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

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和规章”。民政部和公安部属国务院下属部门，所发“通告”属规章性质，按《宪法》规定，规章应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来制定，那么公安部“通告”对法轮功（学员）的处罚，依据的是哪条法律和法规呢？已明显触犯了《宪法》第九十条规定的规章权限范围。民政部的“通告”虽然依据的是《社会团体 登记条例》，但适用不当，因为法轮大法研究会是个“炼功团体”非“社会团体”。没有章程、固定资产办公地点，不接受捐款，按大法要求不存钱，不存物，根本 不符合社会团体的登记条件，这算个啥“组织”？即便这样，民政部依然违背了《宪法》第三十五条公民有“结社”自由权的规定。至于“4.25”上访歪曲成“围攻”成为“取缔”和“禁止”学员[修炼](#)法轮功的主观理由是没道理的，也是违法的。此外，“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功法是两回事。不是有了研究会，才发展那么多人炼，“研究会”现在已不存在了，可大法却传遍了全世界，这又如何解释呢？我告诉你，因为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福益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炼！

2、公安部的六禁令“通告”是“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的规定，严重触犯了《宪法》和法律，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按照《宪法》第五十八条和《立法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的规定只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公安部作为执法部门超越了自己的权限，竟敢无视《宪法》，私自制定“通告”。说白了，公安部非常清楚炼法轮功不违法，广大学员不违法，与所有法律法规的违法事项根本就沾不上“边儿”。所以公安部受人指使，为了达到根除法轮功的目地，才昧着良心这样的干，先“禁止”学员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然后违者再按有关法律处置。换句话说，我要杀你，你不能反抗喊冤，否则你就是“违法”。

公安部的六禁令“通告”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手段来迫害广大法轮功学员，就严重触犯了《宪法》和诸多法律条款，六禁令“通告”的前三条侵犯了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和炼功的人身自由权；第四条剥夺了公民的上访权和政治申诉发言权；第五条侵犯了言论自由权；第六条剥夺了学员正常社会交往的人身自由权，连学员之间的正常交往也被视为“串联”而问罪。

至今一些法盲干警仍将“通告”当成对付广大学员的尚方宝剑，任意抄家抄书、任意处置、任意抓捕、任意劳教判刑或送精神病院迫害，严重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九条、《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构成“非法搜查罪”和“非法侵入住宅罪”；严重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七条、《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构成“非法拘禁罪”。严重侵犯了公民权益，给亿万家庭带来莫大伤害，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多少年幼孩子无人照管！如果不是法轮功学员讲真善忍做个好人的话，恐怕这个“六禁令”早就造成社会动乱了。

作为人民的法官，你们不替民做主，不追究它的违法暴行，不伸张正义已经是严重的失职了，怎么能反过来将严重违法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公安部“通告”作为对我判刑和量刑的法律依据呢？如果我的行为违反和破坏了公安部这个“通告”“法律实施”的话，正说明我维护了《宪法》和法律的公正与尊严！

三、所散发传单内容与邪教内容事实不符

依据法律对“邪教的解释”和“邪教的司法解释”，我所散发传单的内容都不属于邪教内容，既无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及政治纲领，也没有恐吓的言论、也没骗人钱财，更无诱导别人自杀、杀人，都是如何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揭露有关执法部门或人员如何违反国家法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内容。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在诉说上访无门的情况下，利用传单的形式说说心里话，既没有影响社会治安，也没有伤害任何人，相反是在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帮助建立司法公正，维护法律尊严，伸张正义，何罪之有？再说我国法律法规没有任何一条明文规定，申诉遭受无理迫害是违法的。难道某些国家领导人或某部门及个人，可以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以权代法，以势压人、整人、迫害人？那些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凶手，难道可以若无其事的逍遥法外，而揭穿其罪行的人却都成了罪犯、阶下囚？天理何在！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炼功人，也无人强拉我入任何组织，当然传单是谁印制的也不能说明啥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受害者，不需要谁去“组织”，就只知道怎么做了。我只是看后觉得非常好，以前我十几种病痛苦了十几年，脾气还不好，自学炼法轮功后，不但身体奇迹般的好了，脾气也改了许多，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对人身心理健康，于国于家都有利的好功法，在世界上都公认的好功法为什么对她不公呢？为什么说她是邪的呢？我们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理，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了，也想让别人得，这是人善良一面的不自觉的表现。所以我看到这些传单后，我也想为别人好为国家好，就情不自禁的散了出去。如果让我们还象以前那样自由炼功，谁散真象传单干啥？99年7.20之前为什么没人散传单呢？这不是很好的说明吗？无人迫害我们这个亿万群体，又有谁去愿意上访呢？

从以上理由看，国家和政府没有给法轮功定性，法律上也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教组织，更没有明文规定炼法轮功违法。而又无任何证据证明我参加了任何组织，所散传单内容按法律解释与邪教性质内容完全不符，没有给社会造成任何伤害，而且还不允许我们请律师辩护。因此“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不成立。充其量我的行为与公安部违背《宪法》和法律的“通告”（规章）相抵触，我既没有触犯法规，更没有触犯法律，怎么能适用《刑法》给我量刑呢？因此××法院依据《刑法》第三百条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我年徒刑，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是不能成立的，是违法的，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要求立即无罪释放。

中级法院也是一级法院，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办案的唯一原则。那么按照我国《立法法》，“两高”没有立法权，就算“两高”的各自“通知”属司法解释，但是根本上是不得与《宪法》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相抵触，因此“通知”属无效解释。法院是特殊的执法机关，掌握着生杀大权，不像行政单位那样下级机关执行了上级机关的错误决定后，有些后果的损失还可补回来，但一个人被判刑入狱后，也可能就死在狱中，又给家人带来多大伤害！假如最高法院无任何法律依据就让你判处一个人死刑的话，作为中级法院你会不会执行？那么你的天平会倾向哪方呢？是倾向上级命令呢？还是倾向国家法律呢？如果倾向前者的话，还有法律的公正和尊严吗？现在“两高”在各自的“通知”中对法轮功的处理办法，完全是根据代表中央个别领导人意见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定性”而定性的，而不是按国家法律办，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现在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你们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的面前，是执行上级领导的意思呢？还是选择法律公正、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呢？如果你们非要执行上级机关的“法律”，我仍然保留申诉的权利。但是历史的审判终究是公正的，一旦真相大白，法轮功有个说法的时候，（你们实行的是终身审判制）决不会因为谁执行的是上级的命令就可以逃脱历史的责任。但我希望的是你们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秉公执法。谢谢！

辩护人：

年 月 日

一篇未能出庭宣读的辩护词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3月31日上午，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邪党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张兴武非法开庭。本案是正义律师为济南市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第二个案件，邪党法院如临大敌。伪院长解雅洁丧失理智，亲自上阵，要尽花招阻止辩护律师出庭。

辩护律师李苏滨30日下午在法院送完委托手续后，法官并未立即给律师出庭通知，说什么要审查，要领导研究等等。31日8点30分，李苏滨和刘巍两位律师来到法院要求出庭时，法官以领导未批准为由拒绝李苏滨律师出庭辩护。院长解雅洁亲自出面挡驾，李苏滨律师据理力争，双方曾在传达室交涉了一段时间，解雅洁以无赖嘴脸坚持拒绝李律师出庭辩护，并且叫法警把李苏滨律师推出法院大门。本来应当只是由合议庭审查核对一下律师身份就行，然而，邪党法院却越权行使所谓批准权，伪院长亲自违法操作。两位律师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刘巍律师最后以罢辩的方式进一步抗议。

两位律师在未能宣读的辩护词中写到：宪法至上，信仰法轮功无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无论警察在张兴武家中搜出法轮功宣传品是一份或者是几万份，都不构成犯罪。张兴武践行宪法权利无罪，坚持信仰无罪，传播信仰无罪，宣讲自己的苦难遭遇及澄清事实无罪！

下面是两位律师未在法庭上宣读的辩护词全文：

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

根据法律规定，本人接受被告人张兴武的委托，作为他的一审辩护人。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认为，济市中检刑诉（2009）66 号起诉书指控张兴武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对其提起公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指控罪名不成立，理由是：

第一部份：重申本案涉及的普世原则——人民有信仰法轮功的自由

一、辩护人重申本案涉及到的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6 条明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

辩护人认为，信仰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或者信仰上帝、真主等等，都属于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同时，公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各种宗教活动，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公民一旦没有参与宗教实践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一纸空文。

二、重申本案涉及到的政教分离原则，公权力无权干涉信仰自由

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权力都会休想用设立国教的形式攫取世俗权力；统治者休想利用政权干涉人民信仰自由，用信仰增加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

辩护人认为，公权力不应涉足的社会私域，即政府绝无理由介入灵魂事务。以法院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应该信守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践行普世的政教分离原则，不应对任何宗教扣“×教”帽子，也不应对任何宗教的信众进行不公正对待，停止对信仰自由的粗暴侵犯和干涉。

三、重申本案涉及到的“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刑罚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之罪；到了信仰这一精神层面，政府和法律已经管不到了。很显然，有些信仰会扭曲或背离了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以恶为善，杀人有理，蔑视人权。但是，只要它没有进入犯罪或预谋犯罪的刑事制裁领域，或者虽然犯过罪，但已经治罪，目前也已经停止犯罪，在这些情况下，行为已经越出刑罚领域，只能加强监督，这是现代法治观点。

四、重申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第 3 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此处所指法律，是指经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法院或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及通知、决定等红头文件，更不包括某个报纸的某篇文章及个人讲话。因此，法院、检察院等所有认定法轮功为×教组织，应当予以定罪处罚的说教，均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无论在张兴武家中搜出法轮功宣传品是一份或者是几万份，都不构成犯罪。而且张兴武仅仅因为[修炼](#)而持有法轮功书籍，同时，公诉方出示的书籍和光盘是张兴武替人代管并非其本人所有，为了欲加之罪，为了与两高司

法解释相吻合，硬说张兴武有制作和宣传法轮功材料的行为，就被非法逮捕关押、起诉，这些做法明显与中国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严重抵触。

第二部份：本案中非法轮功信仰者的惩治依据本身与宪法及法治精神相悖

本案起诉的法律依据如下：

1999 年 10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以此产生的刑法 300 条。

1999 年 10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一”）。

2001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二”）。

上述文件可分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因法律违宪无效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5 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行同宪法相抵触。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因违宪设立了对所谓的邪教进行定罪处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300 条，与宪法第 36 条相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因为法律无权定某宗教为邪或正。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邪教”是个信仰领域的宗教词语，不应被应用到立法和司法领域而成为“法律词语”。

第二种情况：司法解释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

《立法法》第 8 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处罚，只能用制定法律，即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来设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1 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司法解释只能针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的问题进行。可见，解释是对某一法律进行说明，而绝不能脱离法律文本创制法律。同时，这种说明也不能侵入立法解释的领域，根据《立法法》第 42 条的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而“两高”所谓邪教问题的解释，扩大了刑法的管辖范围，涉及到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越权，同时“两高”有关法轮功是邪教组织的发源地解释也违反了我国宪法的信仰自由条款。

第三部份：对张兴武采取的惩治行动过激、违法，有些行为构成犯罪

2001 年 3 月 29 日，张兴武被劳动教养三年，理由为：散发、喷涂法轮功宣传材料、宣传标语；

2008 年 7 月 16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区魏家庄派出所的警察伙同其它凶犯，非法闯入山东省济南市中区张兴武教授的住处，绑架了张兴武教授与夫人刘品杰，并抢走张家十几万人民币的现金、电脑，打印机等财物，并非法更换了张家的门锁，强占民宅，让刘品杰老人有家归不得。

中国《刑法》第 251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案卷材料，对张兴武采取的惩治行动包括：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法轮功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对一个遵纪守法的信仰宗教的公民采取上述措施，无疑都是违法的，情节严重的应负刑事责任。同时，由于“转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此种方式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也是非法的，更是一种犯罪行为。

综上，辩护人重申张兴武践行宪法权利无罪，坚持信仰无罪，传播信仰无罪，宣讲自己的苦难遭遇及澄清事实无罪！我们相信，所有关心自己宪法权利的中国公民都在期待本案的公正判决！

此致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 李苏滨

北京市舜和律师事务所 刘巍

2009 年 3 月 31 日

太原大法弟子季国媛的法庭辩护词（图）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28 日】投稿说明：下面的第一篇辩护词是太原大法弟子季国媛写的一篇非同寻常的法庭辩护词。这篇在法庭上[讲真相](#)、证实大法的辩护词和其它两篇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章，是在以江氏为首的中共邪恶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的血腥迫害中，大陆大法弟子在遭受非法拘捕、关押、开庭，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等一切权利的严酷恶劣的环境中，在没有纸张和笔墨、每天 24 小时都处于被严密监控的艰难情况下，冒着被非法判刑、甚至是生命危险，在看守所里用得之不易的油笔芯在卫生纸上书写的。

在邪恶非法开庭当天，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加持下，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冲破搜身等非法检查，成功的带到法庭上当众展示、讲清真相、证实大法，有力的震慑了邪恶，震撼了世人。使在场的许多世人包括公、检、法、司人员和律师明白了真相。

同修当庭堂堂正正、义正辞严的讲清大法真相，揭露邪恶迫害，使这次开庭现场成为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揭露和控诉恶首江泽民及其帮凶罪恶的正念之场。无罪陈述完毕，同修把这篇辩护词亲手递交给审判长。法院在场的所有审判人员、书记员和法警立即展开，集体围看，并说：“这写的还是书法呢，这是审判江泽

民呢！我们敢 看不敢念，……”大法弟子在邪恶的表现最猖獗、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自身遭受迫害与承受被迫害的最痛苦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依然秉承师尊的教诲，还 在讲着真相、救度着众生，所表现出来的慈悲、善良、纯正与大忍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休庭后，法院数名工作人员把同修与其爱人请到他们的办公室里交谈了二个多小时，向同修询问他们想进一步了了解的事实真相及修炼方面的一些问题，同修一一了解答。

到 中午十二时许，几名法警在送同修返回看守所途中，同修一路上背诵师尊所写的《论语》给他们听。他们感慨的说：你也没有见过李老师，而且李老师又不在这儿， 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你对法轮功还这么忠诚和坚定，这法轮功真是太厉害了！李老师真了不起！就凭这，我们一定要找《转法轮》这本书好好看看。

临别时，同修叮嘱他们一定要保持对大法的正念，铭记“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并告诉亲朋好友和周围的人，希望他们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 次开庭后，该法院—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级法院对同修均做出无罪结论。但因省、市 610 从中阻挠，非法扣压，一直 未依法宣告无罪判决。610 还非法要求以写什么所谓的“不炼功”、“不宣传”（即不让讲真相）的保证作为释放条件，否则不让放人。见同修毫不动摇，省 610 又让律师传话说：只要你答应不宣传法轮功了，省委派车、省 610 办主任亲自接你回去上班。

因同修不向邪恶妥协，就这样被在太原市看守 所非法关押了一年零四个月。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 16 个月的时间里，同修及家人并通过律师多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并向人大、政法和信访部门反映绑架和非法 关押大法弟子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法律责任。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因同修坚持真善忍信仰，省市 610 又违反宪法和有关规定，在 2002 年 3 月 26 日迎泽区检察院撤销起诉的情况下，又授意太原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于 2002 年 4 月 28 日对同修非法劳教三年。

这篇写在 卫生纸上的证实大法的辩护词、以及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稿和证据，还有同修在狱中坚持学法背写的师父的经文，来的很不容易。从看守所到劳教所被长期非法关押期 间，同修日夜悉心保护。历经多次突袭大搜监、野蛮搜身、强行翻包、撕拆被褥等非法检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加持和帮助下，才神奇的、完好的保护了下来。并 且从看守所到劳教所、再到面世，几经周折，突破重重封锁，终于辗转传出。（2006 年 3 月）

证实大法的辩护词：无罪陈述（辩护词）

法正乾坤 除尽邪恶 让千古奇冤昭雪天下

法轮大法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的宇宙大法，是指导真正的修炼者往高层次上修炼、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我们至尊至圣伟大的师父以主佛洪大的慈悲，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将这部伟大的宇宙大法无私的奉献给了当今的人类，法正乾坤、救度众生。

大法自 1992 年传出以来，短短几年的时间，已洪传到全世界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现已洪传近 80 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无不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在健康人民的身体、促进人类道德的升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卓越奉献。仅在欧洲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李老师及法轮大法就获得了数百（现已获一千三百多）项褒奖，赢得了举世赞誉。实践证明：法轮大法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其内涵超越于一切常人社会从古到今的学术及伦理，其珍贵程度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

在我国，法轮功也曾被评为“明星功派”。1993 年 12 月，李老师在 1993 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获得博览会唯一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鉴于李老师对促进人类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杰出奉献，1993 年 12 月 27 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老师荣誉证书。1998 年下半年，以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份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这也是中共 200 多名在职及离休高级干部多次致中央联名信中反复申说的话。

当时，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的其他六人都反对镇压法轮功。但是，江泽民出于对个人权力的私欲和极端妒忌的狭隘、晦暗心理，全然不顾中央其他领导的反对，一意孤行的利用手中的权力，盗用国家和政府的名义，采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等卑劣手段，捏造谣言和罪名，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以个人意志和非法手段私自将法轮大法诽谤为“××”，对大法及大法弟子进行残酷迫害和镇压。一时间，中华大地血雨腥风、恶浪翻滚。

自 1999 年 7 月以来，人们从报刊、广播、电视上所看到、听到的都是对法轮大法的肆意栽赃陷害和造谣诬蔑之词以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欺世谎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一年多来，多少坚持对“真、善、忍”真理信仰的善良人被非法投入监狱；多少国家干部、高级知识份子、科技工作者、工、农、兵、学、商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无罪被劳教、判刑；又有多少大法学员只因说了“法轮大法好，我要修炼”这样一句真话而被开除党籍、学籍和公职，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迄今为止，已有百名（至发文时已有 2800 多名）大法弟子被活活迫害致死。更令人发指的是，辽宁马三家劳教所的警察将 18 名女学员的衣服扒光，强行推入男牢房……

面对邪恶之徒对大法及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亿万大法弟子铭记师尊的教诲，始终以修炼者大善大忍的慈悲胸怀和无私无我的高尚境界及浩然正气，本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冒着被抓、被打、被非法关押、被劳教、判刑的危险，义无反顾的走出来，堂堂正正的向广大人民讲清真相、证实大法、揭露邪恶、救度世人，更加坚定的坚持修炼，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捍卫大法的

神圣与尊严。诚如李老师在法中所讲：“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法轮佛法（精進要旨）·修内而安外》）“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精進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这本身正说明了真理的力量，也正是“真、善、忍”大法威德的体现！

寻求真理的道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有正的，必有邪的。当五十九岁的老妇遭受渣滓洞的 24 种刑具时，当年轻健康的生命被酷刑折磨毒打致昏、并在还有呼吸心跳的情况下被直接送入火葬场火化时，当身心健康的正常人被强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残时，您认为到底是谁代表了邪恶？！

当看到大法学员为维护真理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进京上访时，当听到大法弟子在法庭上义正辞严的辩护时，当闻知世界上善良的民族和人民要求“停止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还法轮大法清白”的呼声时，您认为到底是谁代表了正义？！

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根本的宇宙大法，正法大道。没有教堂、没有庙，没有教规，没有宗教仪式。想学就学，想走就走，没有名册，何“教”之有呢？！更谈不上什么“X教”了。是不是没有任何条件和代价、不收钱财、为人祛病健身，教人向善、道德高尚，也属于“邪”的范围呢？如果真是邪教，应该人人得以除之，但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广为洪传，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使无数有缘之士了悟到宇宙的真理，懂得了生命存在的真正目地和意义，看到了新的生命希望，从而踏上返本归真的光明大道，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的珍爱和好评。而唯独中国大陆将其打成“X教”，进行残酷迫害和镇压，这是为什么？（是大陆的标准特殊？还是人家的标准错了？难道所有的国家都正邪不分了吗？！）是不是正的，也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随心所欲攻击为“邪”的；而邪的，如果符合了政府中一些人的观念或某个当权者的思想就可以说成是正的呢？！况且，将法轮大法打成“X教”，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也并未提到“法轮功是××”。只是江泽民在 1999 年出访法国期间口头上说了一句“法轮功是××”，继而，《人民日报》以一篇“法轮功就是××”的评论员文章，就企图给法轮功扣上所谓“X教”的帽子。这不是典型的利用手中窃取到的权力，妄图以言代法，“正邪不分谤天法”，将亿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人为的推向政府的对立面，蓄意制造民族灾难和千古奇冤吗？！如果连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都要被攻击为“邪”的，那么，还有什么正是的呢？！

请问：实事求是讲真话违反了国家哪一条法律，而要被强加“无视 国法”的罪名？“实事求是”不是我们国家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和思想路线吗？如果实事求是 是要被诬指为“破坏法律实施”的话，难道说假话才是维护法律实施吗？！实事求是、维护真理、讲清大法真相，不但不违反国家法律，而恰恰是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体现和我们应尽的神圣天职。实事求是讲真话不但不会破坏法律实施，相反，只能更好的维护法律的实施。

法律本应是扶正祛邪、惩恶扬善，实事求是无罪，不但不应受到打击和迫害，而是应大力提倡和弘扬。所以，起诉书所捏造的所谓“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罪名不成立。为此，恳请法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事实、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保护良善，做出客观、公正的无罪判决。

亲爱的朋友：在您的生命深处，一直苦苦期盼的就是能够得遇宇宙大法，修炼、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地。正如李老师在讲法中所明示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回到你原来的地方，那是你最大心愿、最美好的愿望。”（《法轮佛法—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生逢宇宙大法洪传、至尊至圣的主佛——我们无比慈悲、伟大的师父亲自传法度人、法正乾坤之时，这是多大的福缘、何等的幸运啊！

但谎言终归是谎言，必定不攻自灭；法轮大法是宇宙最伟大的真理，是神圣颠扑不破的。

善良的人们，请擦亮你的眼睛，明辨是非，不要被邪恶的谣言所蒙骗；不要不加思索，人云亦云，助纣为虐；不要无端痛恨给人类带来无限美好的“真、善、忍”；不要因一时的错念断送了自己生命的永远。“主佛的慈悲是洪大的，已经把佛法留给了人，宇宙将再给人一次机会，让伟大的佛法把宇宙的真正现实再现人间，荡尽一切污垢与愚见，用人类的语言再造辉煌。珍惜吧！佛法就在你们面前。”（《再造人类》）“人类啊！清醒过来吧！历史上神的誓约在兑现中，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人生的路自己走。人自己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再论迷信》）“善与恶的表现中都充分体现了各自将要得到的结果。众生，将来的位置是你们自己选择的。”（《走向圆满》）

天理昭昭，善恶有报。自古明君善施德政、广纳贤言、承天意顺民心，则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而违天理逆民心，独断专行、凶残暴戾、苛政于民者，必祸国殃民，招致天怒人怨。只有假恶斗才惧怕“真善忍”，只有假恶斗才憎恨“真善忍”。江泽民逆天叛道、倒行逆施、人神共愤、罪责难逃，已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此，我们奉劝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检法司干警不要做江氏的陪葬品

法轮大法是最为神圣、金刚不破的宇宙的伟大真理，任何人妄图阻挡法正乾坤的历史车轮，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善良的人们终会看到上意对江氏的严正审判。江泽民以捏造邪恶谎言对法轮大法进行迫害这一千古奇冤必将昭雪天下！

乌云遮不住太阳，真理总是要放射光辉。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根本的宇宙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在法正人间之时，每个人都在善与恶的表现中摆放着自己将来的位置。为了对您生命的永远负责，请您客观、公正的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无论您是否修炼法轮大法，但请记住“真、善、忍”，做好人。我真诚的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能铭记“法轮大法好”，保持对大法的正念，当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这一千古奇冤昭雪于天下之时，在真相大白之日，能够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呼吁：
还法轮大法公道
还我师父清白
还被邪恶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生命
还无罪被关押、劳教、判刑的大法弟子的人身自由
将正邪不分谤天法、祸害人类的罪魁祸首江泽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按照国家法律严惩杀人凶手

我坚信：
善恶终有报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真、善、忍”宇宙大法必将在人间再现！

法轮大法弟子 季国媛
2001年3月1日

后附：



1. 在卫生纸上写的辩护词（无罪陈述）原件实物照片。



2. 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书证实物照片

女儿为父陈百合的上诉所作辩护词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河北唐山迁西县大法弟子揣翠军、陈百合自2006年5月14日至今，一直被非法关押在迁西县看守所。迁西[610](#)胁迫邪党法

院伙同公安局、检察院及司法局给大法弟子揣翠军、陈百合非法判刑五年、四年。下面是一份陈百合的还在上学的女儿为其父所做的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你们好！受本案上诉人陈百合的委托，我作为上诉人的女儿为其辩护。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严重违反法律程序。鉴于此，辩护人补充辩护意见，敬请二审人员改判上诉人无罪并立即释放。

我们国家一贯宣称依法治国，当我得知上诉人，也就是我的父亲竟然被非法判刑四年时，我不敢相信，在这样一个法制社会，竟然会上演如此荒谬的一幕，一个善良的百姓，只因为讲了几句真话，就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被强加上这样一个罪名并判了刑。

执法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任何一部法律都从未给[法轮功](#)定性，“利用邪教组织”的罪名明显不成立，况且法轮功不是宗教，没有庙，没有教堂也没有名册，不收财物，愿意学就来学，不愿意学就走，不搞任何形式，有这样的教吗？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使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这样也算邪的话，照此逻辑，杀人放火倒应当是正当的了？

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而我的父亲却由于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被指控“破坏法律实施”，我想请问：我父亲的行为破坏了哪一项法律的实施？又是怎样破坏的？

我父亲没有妨碍或伤害到任何个人和社会，相反对我们的国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国民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对政府和社会不是一件好事吗？我父亲早先患有眼疾，双眼通红、疼痛且看东西模糊不清。去医院看也不能确诊，[修炼](#)法轮功以后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不仅如此，原先全身酸疼的怪病也不治而愈。这样的奇迹不只发生在我父亲的身上，几乎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健康是用什么都换不来的，它对每个人和家庭意味着什么，我不说也谁都清楚。

过去我父母经常吵架，每次吵架我都心惊胆战，我不知道在盛怒和失去理智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我觉的这样活得太累，甚至希望赶紧长大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而大法改变了这一切。我父母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渐渐不再争吵，即使偶尔有些小的摩擦也都很很快以平和的心态找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相互指责。我们家的气氛前所未有的宁静、祥和，一家人其乐融融，与世无争。说是大法挽救了我的家庭，一点都不夸张。当谎言与对大法的诬蔑之辞铺天盖地的袭来时，我们又怎能无动于衷？从中受到这么多的益处却在其受到诽谤时不敢站出来讲句真话，这样的人连做人都是不配的，更别说做一个好人了。因为我的父母选择了良知，所以一次次的被非法拘留、关押、强制转化。我不知道他们要把我父母转化成什么样才满意，难道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父母变成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人吗？

2001 年正月十一的清晨，当家家户户还都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时，我妈妈却被闯入家中的警察强行绑架走了。这一走竟是一年零八个月，期间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和折磨。回来时已经骨瘦如柴，苍老了许多。无数次我在睡梦中喊着妈妈哭醒，无数次我在恍惚中以为妈妈已经回家却在清醒后找不见她。当妈妈终于在经受了无数痛苦之后回到这个家时，我以为我们一家终于又可以象以前那样安静生活了，然而苦难没有结束。2006 年 5 月 14 日，我父母又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大概一个月后，我妈妈由于被迫害，出现昏迷、不能进食等症状，在八天未进食的危险情况下，看守所才因惧怕担当责任而通知亲属将她接出看守所，当时已奄奄一息。回到家中不久迁西公安局又以我父亲为诱饵，在我妈妈意识尚不清醒的情况下诱骗口供。当我妈妈清醒后推翻了原先不实口供，一审法院却置若罔闻，未予采纳，并在后来的审判中将这所谓的“证言”堂而皇之的作为本案中被告的罪证。而且我父亲的口供也是通过诱骗等手段取得的。请二审法院予以重视。

更为滑稽的是，作为上诉人的家属，我们至今仍没有一审判决书，我父亲被非法判刑的消息还是从本案的其他家属那里打听到的。我和我的亲人曾两次去法院刑庭索要判决书，均遭到拒绝。其人声称，法律并未规定要给当事人家属判决书。由于本人当时对相关法律不太清楚，由于对执法者的信任，所以没有坚持索要。令我失望的是，此执法者竟然根本不值得信任。《刑诉解释》第一百八十二条明确规定：“判决宣告后应当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近亲属。”可是一审法院不仅没有立即送达，我们两次前去索要都没给，而且欺骗被告人家属。一个执法者，居然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对百姓撒谎，法律的威严何在！执法者的颜面何在！法律在他这里没能成为维护老百姓权利的武器，却成了他愚弄、吓唬百姓的工具。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故意让我们错过上诉期，因为他们知道一审判决是不公正的，没有法律依据的，迁西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是见不得人的！希望唐山中院对此予以重视并秉公执法！

我的父亲至今已被非法关押八个月了。期间我从未能探视他。听说他的眼疾复发了，如果不是被非法关押，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的父亲没有罪。作为法官，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我不敢去奢求你们能够像当今一些正义之士一样站出来为中国人民呼吁人权，只希望你们能在职权范围内，尽己所能的保护善良、无辜的人。你们也是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你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你们知道一位父亲对他的孩子有多么重要，一位父亲对一个家庭有多么重要。如果我的父亲真的有罪，我什么也不会说，可是他没有，你们的良心一定不会允许你们徇私枉法去破坏一个家庭。

当你们与家人欢聚在一起时，可否会想到有多少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正遭受着妻离子散的痛苦？这次放假回来，当我打开我家紧锁已久的大门，满目的苍凉景象令人心寒。屋内的尘土堆了很厚，昔日的欢声笑语犹在耳边，那温馨的生活却恍若隔世。爸爸被非法关押着，妈妈被逼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一个好好的家，变得支离破碎。别人都说我爸我妈狠心，对我们不管不顾，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好象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错。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是爱我们的，他们不是不惦记我们，只是在捍卫真理时，被剥夺了与家人欢聚的权利。也正因为如

此，我更加敬佩他们，他们的善良和勇敢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我为有这样的父母而骄傲。

我没有想到我有一天竟要为我的父亲辩护，像他这样一个朴实、心胸宽广的人竟会被判有罪，我的心里很难受，不只为我父亲，还为我热爱的祖国。就在我的祖国，在我的家乡，“真善忍”这样神圣的字竟被与“罪”联系在一起，修心向善的人需要长篇大论的为自己辩护无罪！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

法官们，你们应是正义的化身，惩恶扬善是你们的职责，我的父亲无罪，希望你们能够秉公执法，改判上诉人、我的父亲无罪并立即释放，还我一个完整的家庭，也给你们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

辩护人： 陈晴
2007 年 2 月 1 日

一位武汉大法弟子的辩护词

文/武汉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4 年 2 月 14 日】

审判长先生：

本人依法请求辩护。

从三个方面证明我们没有破坏法律实施

1、从事实数据上证明：起诉书用计数器上的记录的 25 万多的数据作为证据，起诉我们利用互联网制作×教组织信息、制作[法轮功](#)宣传品和×教宣传品，在没有列举任何实质性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引用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进行了量刑，并得出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起诉结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条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量刑法则，起诉书中没有任何实生事实根据的量刑，肯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我再列举印刷品的几个主要事实，证明我们没有破坏法律的实施。我们印刷最多的有“给党的十六大代表的一封公开信”、“天安门自焚真相”等等，我们运用法律赋予我们的检举、揭发、控告权，用诚恳的态度，科学的分析和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和被害人的血泪控诉，检举、揭发、控告了他人制造冤假错案、栽赃、陷害违法犯罪问题，特别是“天安门自焚真相”所有的事实根据全部取材于“焦点访谈”、“新闻联播”所播出的录音、录像和文字图片。综上所述，我们依法检举、揭发、控告他人违法犯罪问题，绝没有破坏法律实施。

2、从方式方法上证明：我们没有破坏法律的实施，前面谈到我们依法向党、向政府及各级信访部门、公检法及人民群众检举、揭发、控告他人制造冤假错案、栽赃、陷害的违法犯罪问题，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不向政府、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向谁检举揭发呢？再看制造冤假错案、栽赃陷害的恶人，他们利用“焦点访谈、新闻联播”，面对的也是政府和人民群众，可是他们向政府、向人民群众散布的却是违法犯罪的那些东西，与我们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相比较，在这么明白的是非面前，到底谁破坏了法律的实施，还用得着我们辩护吗？

3、从法律上证明，我们没有破坏法律的实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章证据第四十二条，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才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①物证书证；⑦视听。我们依法检举揭发控告他人制造冤假、栽赃、陷害的大量事实根据，血泪控诉其证据不可辩驳，特别是“天安门自焚”真相，所有事实根据全部取材于“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的录音录像、文字、图片，因此完全是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章第四十二条的法律涵盖之下，自从检举揭发出来后就具有法律效力。而起诉书把这些事实根据说成是互联网的信息，不能诋毁根据的法律效力，也改变不了依法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问题的性质。

除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情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除了对证据的法律规定外，没有任何法律条款说互联网上的信息或被说成是法轮功宣传品的任何证据一律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给处的法律规定”。

因此，面对我们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的事实根据，不问青红皂白的用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即“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迷信破坏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作为准绳去量”，这纯粹是张冠李戴，丝毫无准绳可言。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这问题，经查证属实或提供重要线索促使其他案件得以侦破，为立功的表现。我们不是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等等这么大的案件，有人在天安门自焚现场用器械猛击刘春玲头部使其当场倒地死亡，和猛击头部时器械变型反弹飞起来的重要线索，还有焦点访谈播出的自焚前、自焚现场、自焚后的同一个王进东却长着形状大小完全不同三种耳朵的重大可疑线索；起诉书不但不认定我们的立功表现，不作任何调查，就起诉我们破坏法律实施，这不是剥夺我们检举揭发控告权吗？再看制造冤假错案、栽赃陷害的人，有那么多公开的事实证据检举揭发控告他们，而他们至今还没有被绳之以法、还在逍遥法外，这不就是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吗？与我们遭遇相比，这能说是在实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吗？

综上所述，我们依法检举揭发控告他人违法犯罪问题，不但没有破坏法律的实施，还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才是正常的；要说我们破坏法律实施，起诉书上一件实质性的事实根据都没有；要说我们利用焦点访谈、新闻联播播出的事实根据检举他人制造冤假错案、栽赃陷害，这千真万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必报是天理！

内蒙古大法弟子周金鹏法庭辩护词

文 / 周金鹏

【明慧网 2005 年 11 月 2 日】

检察官、法官大家好：

我叫周金鹏，是一名[法轮功](#)弟子，刚才公诉人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对我进行起诉，我认为这是一桩冤案，而且是一桩天大的冤案。我没有申请律师，所以我有必要为自己辩护。

这个罪名的关键就是“利用×教组织”，然后再去破坏法律。所以我们必须先弄清什么是×教。所谓邪教，其全称就是邪恶的宗教。首先是宗教，而且这个宗教的本质是邪的、恶的，其宗旨就是教人干邪恶之事，干坏事。

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必须得具备一定的宗教形式和组织机构，比如佛教有寺院；道教有道观；基督教有教堂，寺院有住持和尚、大和尚、小和尚等，教堂有神父、主教等一些神职人员。而法轮功没有任何形式，没有办公地点，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不分先后一律平等，想学就学，不学就走，无人组织无人指使，更无人强迫，佛法只看人心。所以说法轮功不是宗教，也不能用任何宗教去涵盖他。硬说法轮功是宗教，纯属无机之谈，别有用心！

退一万步讲，就算法轮功是宗教，那么这个宗教是不是×教呢？

第一，法轮功是一门性命双修的功法，通过五套柔和的动作，达到内心的宁静。从 1992 年 5 月份由[李洪志](#)大师传出后，迅速得到洪传和普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许多疑难杂症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了康复，所以在 93 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大师荣获了中国大陆颁发的“边缘科学进步奖”、“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1993 年 12 月 27 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了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

大家想一想，全国有 1 亿 3 千万人修炼法轮功，如果一个人为国家、社会、家庭节约一元医药费，那就是 1 亿 3 千万，如果每个人省 10 元、百元呢，那就是 10 亿元、百亿元，这是一笔巨大可观数字呀！

在 没有迫害法轮功之前，98 年国家老干部乔石曾组织有关部门对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做了深入调查，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祛病健身很神奇，同时能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请问法官、检察官，帮人祛病健身，教人做好人为国家排忧解难，是不是邪恶的呢？是不是×教？

第二，法轮功倡导真、善、忍，大法弟子要时刻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做人办事。我告诉大家，真诚、善良、忍耐是人类道德大厦的三块基石。试想，人类一旦失去这三个字，人还算人吗？

事实上，真正修炼的人，都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办事的，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宽容、大度，不计人之过，不打击、报复、妒忌别人，在他们中间，

没有贪污腐败之人，更无吃喝嫖赌之事。在跟人发生矛盾时，首先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在困难和不公正的对待下，他们选择忍耐；在暴力镇压下，他们始终选择和平与理智。

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至今，已经整整持续了6年，如果说印度洋大海啸使47万人死亡，70万人无家可归，可是在这6年的镇压中啊，却牵扯到上亿名无辜的人民群众。据不完全统计，有30万人被劳教、判刑，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有家难归，有1千多有名有姓有地点的大法弟子被酷刑折磨致死！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人祸胜于天灾！可是面对一系列无理的迫害与旷古奇冤下，大法弟子没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毅然选择和 平和理性，坚持不懈的用自己的特殊方式——发传单等，向人民、向政府诉说我们的冤情和受迫害的真实情况，这充分体现了大法弟子理解别人、体谅别人的大善 大忍的宽广胸怀。

说到这儿，我要问一问各位，真善忍这三个字，究竟哪个字错了，究竟哪个字是邪的？

第三，法轮功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添光增彩。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一种佛家修炼大法，并通过柔和的动作达到心灵的宁静与安详。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一书已翻译成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二十几种文字，传播到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截止到我被绑架到看守所时间，法轮功已受到1237项来自世界各地的褒奖，仅中国台湾省就有大法弟子30万人。

法轮功创造了世界文化奇迹，开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辉煌，为人类以及人类的子孙后代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与洪大无比的珍贵资源。法轮功弟子面对强暴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坚持真理的精神，也给人类以及后世子孙树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典范，必将为世界人民所称颂！

请问世界上有这样的邪教吗？

综上所述，法轮功不是宗教，更非×教，因此对我起诉的罪名是不成立的，是强加的，捏造的，就象盖一栋大楼，它的基础是虚设的，无论盖大楼的材料怎么充分，最后的结果是不成立的，最多是一堆废料而已。

南宋时期的岳飞就是当朝宰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于风波亭。“莫须有”的意思就是或许有，或许没有，今天给法轮功扣上×教的大帽子，然后大打出手，与“莫须有”的罪名同出一辙，却比“莫须有”的罪名更具杀伤力。

下面我对强加于我的“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做以下法庭辩护。

刚才起诉人宣称我在明慧网、法网恢恢网站发表了通辽市、区公安局对大法弟子迫害的“不实”报导，也就是说我做了虚假报导，冤枉了市及科区公安局的某些警察。姑且不说我是否发表了这些文章，其实我从来都没说过我写过文章，但那些文章我都看过。我想问一问，哪一篇报导不真实呢？是科区公安局邵军敲诈通辽老田一家人的钱财不实吗？是警察包吉日木图、王波给大法弟子田苗、

刘树军上绳，险些造成残废不实吗？是通辽发电总厂的优秀女工大法弟子丁丽艳在看守所绝食 48 天，奄奄一息之后抬出看守所，直到现在仍生死不明的消息不实吗？还是给女大法弟子砸铁镣子、背板、关糊涂号、喝猪食一样的稀粥不实？

这一桩桩、一件件、一起起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谁能赖得掉，谁又能抹杀得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打人的人无罪，而被打的人却反而有罪？公理何在？

其他大法弟子我不说，我就说我自己，你们听一听那一件不实？我于 2004 年 9 月 2 日被绑架，当时一刑警（后来得知叫包不和）用手掌击打我的面部，我被打的面目皆非，致使我的嘴角、眼角、鼻子都在流血，当时没有人阻止他的恶行。警察马英为了掩盖罪行，在给我录象时擦去了我脸上的血迹，马英说：“没人打你吧？我们什么都没看见。”竟公然否认对我的侮辱和殴打。

我被毒打之后又被关在号里竟整整吐了七天血。就这样他们还给我砸上了 28 斤重的死刑犯的铁镣子，一戴就是 6 天，每当我拖着沉重的铁镣子在地上艰难的行走时，铁镣子发出哗哗啦的撞击声，我的内心无比的悲凉！

一次，科区公安来看看守所，那天外面下着雨，老天都在为大法弟子流泪、哭泣……恶警包吉日本图将脚镣子卸下来，当时看守所的管教让他们将镣子留下，可是包却执意不肯，还将大镣子放在我的肩上，让我扛着走，肆意对我施行人格侮辱。

恶警王波一边问一边威胁我说：“我不但能折磨你的肉体，还要强奸你的灵魂。”随即上前猛的抓住我的右手指、手腕，利用反关节，使劲用力前后抓手动，致使我疼痛难忍，失声大叫不止！如此反复四次，直把施暴者王波累得满头大汗，后来邵军、副局长张黎明进来，我质问张黎明：“这是不是酷刑折磨。”张却说“这不是。”他们利用警察的特权，让我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承受的痛苦，这不是酷刑是什么？难道是警察帮我活动关节吗？难道是警察助人为乐不成？到了后半夜，恶警包吉日本图用肮脏下流的语言不停的对我辱骂，还用冷水弹我的脸，目的是不让我睡觉。快天亮的时，邵军将我双手吊铐在档案柜上，然后在扯我的腰带子，双手的铐子深深的勒进我的肉里。

这就是警察迫害我的简单经历，他们每次非法提审时，王波、邵军都打过我耳光子，有次邵军把我的耳朵都打肿了，耳膜轰轰的叫了好多天，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当我说我要告他们时，包、马都觉得可笑，他们都耻笑我说：“你跟××党掰腕子，就是一个折！”

这一切都是铁铮铮的事实，人可以否认，颠倒黑白，但天知道，天理不容！！

刚才公诉人说我破坏了法律，说报导不真实，相反，公安机关某些警察利用卑鄙手段，刑讯逼供，施以暴行、殴打被监管人，这才是触犯法律，是在犯罪！到底是谁在破坏法律？到底哪里不真实？

我确实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内通一流离…胡主席、温总理》的一封信。我是依据宪法的规定，向国家领导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是合法的，怎么能成为判我有罪的依据呢？

起诉书还说我邮寄了 145 封信，并全部扣掉，公安机关截获、扣留并私自开拆私人信件……这本身就是违法的，已经触犯法律，公安机关执法犯法，有什么资格指控我呢？而且应该追究办案人员的渎职之罪，因为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经常告诉全国人民，中国现在是人权最好的时期。一个老百姓给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被迫害的冤情，就给定个罪，关进大牢，这不简直是无法无天吗？古代封建专制时期，臣民还可以给皇帝上书呢。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怎么就不可以呢？人民的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一亿多大法弟子是人民，他们的呼声难道不代表？人民的心声吗？在不公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呀！

那么我就说一说我为什么写此信。

2002 年 7 月 8 日我被迫流离失所，从此有家难回，原单位通辽电厂又开除我的公职，刚才起诉书介绍我的简历时，说我“无业”，这无业二字浸泡着我太多的辛酸和屈辱，我一边躲着警察对我的追捕迫害，一边还要自谋生路。在此期间，我的三位亲人因我而被抓走，一到逢年过节，我的亲人们无不生活在警察搜捕我的恐惧之中。甚至我老家的猪圈都被翻查过多次……。

我坐在家中，恶警邵军、王波、包吉日本图……不用钥匙就能打开我所有的房门；我走在城市的大街上，他们就象警犬一样随时可能扑上来；哪怕我走在乡村的土路上，他们就向蝗虫一样啃食着我的田园。就这样我投诉无门的情况下，本着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才写了此信。让我没想到的是此信在[明慧网](#)上发表后，公安部、公安厅的人都下令抓捕我，不遗余力的要将我投进大狱。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在流离失所期间的一天，我兜里只有几角钱，连一碗抻面都买不起，可意外中我捡到了 153.8 元钱（用方便面袋包着），为了找到失主，我在原地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钱交还给了失主。失主是个菜农，当他知道我的真实情况时，他握着我的手哭了，要把钱都给我，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为了他的安全，我在这里不便说他的名字和住址。我何尝不知这么做的危险，因为后面还有警察在追找我，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说这件事不想表白什么，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只是做好人，可我现在却被当成罪犯，被关押了 6 个月后，又面临被非法审判。

最后我有一段话告诉大家：在历史的过去，一切对修炼人的镇压与迫害，都走向了失败。历史的今天，中国大陆对信仰“真善忍”人群的镇压也决不会例外，同样会走向失败。

从 99 年[7.20](#)至今，镇压已整整持续了六个年头。六个残酷的冬天！大法弟子坚强和平的走过了六个冬天，就足以证明了他们重德行善、一心向佛的纯正之心。他们无心与人为敌，更无心在社会上搞什么。他们坦坦荡荡、清清白白、无愧于心，无愧于社会，更无愧于这个时代！

马上就要过大年了，大家都忙着办年货，可大法弟子却面临着被“审判”，虽然我内心很凄凉，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法轮功无罪！大法弟子无罪！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周金鹏

2004年1月23日写于看守所（2005年2月3日开庭）

遭非法判刑大法弟子正义凛然的辩护词

【明慧网 2002 年 6 月 24 日】以下是某大陆大法弟子在法庭上受非法审讯时的陈述词和辩护词。

陈述词

首先我不是什么罪犯，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所做的都是为了证实大法，纠正政府的错误，去除民众思想中受到的毒害。如果没有对大法的[迫害](#)，我们根本就不会去讲什么真相，是江泽民在利用着政府陷害大法，他置国家宪法于不顾，造成了很多恶果，致使无数大法弟子惨遭毒害，甚至失去生命。我们是得法[修炼](#)受益的大法弟子，深知[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是宇宙的真理。我们被迫失去一切，我们义无反顾，我们在用生命坚持着真理，抵制着邪恶，我们在用生命救度着众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伟大、最神圣的。无论怎么抓，我们的法会照开；无论怎么抓，我们的机器照转；无论怎么抓，我们的传单照贴；无论怎么抓，我们的广播照响。三年了，从未间断！这是佛法威严的再现！邪不压正。正法洪流势不可挡！这不是人力所为，这是法轮大法的法力在大法弟子心中的展现，是法轮大法的法力在世间的力量。抓不败，打不垮。这是人间的任何组织任何力量都达不到的，别看我们被抓，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证实大法的过去；别看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心里还是那么神圣。因为我们在用生命兑现我们的誓约，生命与正法同在。对错不是你们说了算的，时间、历史会证明一切。天理自会在人间再现，我们都会看到未来的印证。

我的辩护词

我今天虽然站到了这里，我不是罪犯，我是以一个大法弟子的身份站在这里。我的内心升起了无比的庄严与神圣。因为无论任何办法都改变不了大法弟子的坚定正念；因为任何力量都压不垮大法弟子的浩然正气。

在人类道德全面崩溃的年代，是觉者再一次慈悲于人，把法轮大法——佛法传至人间，给了人类最后的机会。这本来是人类应该珍惜万分的希望，可是江泽民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利用着国家，利用着政府，利用着宣传机器，利用着专政工具，对法轮大法及我的师父进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恶毒的陷害。对大法弟子进行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的迫害。多少人被抓，被打，被迫害致死；多少人被逼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多少人在这铺天盖地的造谣诬

陷的宣传中迷失了本性，在无知中造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大祸临头还不醒啊！江泽民不顾一切地毒害着人们的心灵，毁灭着众生，他已经成了一个千古的罪人！不信真相的人们权衡着眼前的得失去迎合江氏，谩骂着大法，诽谤着主佛，迫害着大法弟子，所干出的一切罪恶令天地为之震怒！大法弟子是经过修炼觉悟了的人，为了证实大法，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众生，舍弃了自己个人的一切，我们凭着自己对大法坚定的一颗真心，凭着自己对众生的一片慈悲开展了全面的向人们讲清真相，证实大法的壮举。有的被抓、被打、被迫害致死。多少人吃着发霉的馒头，穿着走烂的鞋子，把大法真相送到千家万户，把大法真相的传单贴到大街小巷。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我们生死无畏。这不是参与政治，更不是参与什么常人的组织，而是为了证实大法，为了向世人讲清真相。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慈悲的，都是最伟大的神的表现，真是感天动地啊！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所有的坏人都将被神销毁，那时你们才会看到这一切的伟大，你们会看到法轮大法的威严，你们会看到主佛的慈悲。无知的人们在被邪恶的毒害控制中嘲笑着我们：你们的法怎么还不正过来呢？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人们不是也在嘲笑耶稣吗？你不是能救人吗？那你现在下来呀，你下来，我们就信你。耶稣当年就说了一句话：三日后我会复活。当时有谁会相信呢？三日后耶稣复活了，可是历史上的罪人到现在还在偿还着罪业。看着历史的过去，再看看历史的今天，人们把自己的愚昧说成是大法弟子的痴迷。如果大法现在就再现人间，哪有这些人的未来？我的内心涌动着无限的怜悯与遗憾：对大法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的宣判，这是人类的罪恶，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人干了什么都得去承担，人生的路自己走，人的一念也会定下自己的未来，我希望你们都能想一下自己，我们在难中与你们结缘，我们在难中告诉你法轮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法轮大法在真正的救度众生。为什么正法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大法对人类的慈悲，为什么大法弟子至今还在遭受迫害，这是我们在承受迫害的痛苦中为你们承受着一切。在这迷中，在这雾中，看一看你们的本性还能不能返出来，还能不能对大法升起一丝正念。我们在生死存亡面前走出来，在最大限度失去一切中走出来，在饱受迫害痛苦凌辱的情况下，还在向你们讲清真相，启悟着你们的良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与正义。人啊，清醒过来吧！主佛的慈悲是洪大的，已经把佛法留给了人。人生的目的在于返本归真。大法弟子的生命在于证实大法。我们的生命将与大法同在，希望你们能珍惜这最后的机会，把握好自已的未来。无论你们做了什么，只要你能醒悟，你就有美好的未来。

最后郑重地告诉你们，大法没有罪，大法弟子没有罪，你们再不要助纣为虐。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还所有法轮大法弟子清白！释放所有无罪被抓、被拘、被劳教、被判刑的大法弟子！严惩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让他们停止对大法与学员的迫害。

法轮大法好！

心愿

乌云遮日几时有
真理之光逐恶休
铮铮铁骨金刚志
一句真言万古留

铁窗囚人难囚心
漫天繁星金心绣
重刑重判何所惧
只愿众生得救度

谢燕益律师对法轮功学员邓小明的无罪辩护词

【大纪元 7 月 23 日讯】原成都华阳师范校教师邓小明 7 月 8 日上午在双流法院被非法开庭。当日，法院前整条街（当地一条交通要道）被禁止通行，引来众多民众前来围观。人们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怎么会把整条街戒严？

和许多地方的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一样，双流法院公然违反刑诉法，非法禁止家属旁听。后在邓小明妻子一再的据理力争下，才同意她一个人旁听。旁听席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占据。同时，法院试图阻挠辩护律师谢燕益和李春富出庭辩护，并强行非法安检。后经一个多小时的坚持和争取，两位律师才得以以公民代理身份出庭。

对此案，两位律师对检察院的各项指控进行了逐一分析，认为所述“证据”与“罪名”均不成立。因此两位律师在一审时提出“无罪”判决的要求。

最后，法院在公诉方理屈词穷、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邓小明枉法判六年六个月的重刑！邓小明当庭表示自己无罪，并提出上诉。

以下是谢燕益律师的辩护词，帮助社会各界了解邓小明案的是非曲直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文，关注帮助邓小明。

邓小明无罪辩护词

（——对待法轮功问题采取和解立场才是明智的选择是大势所趋，违背历史潮流将会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

我是贵院受理的邓小明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一案的辩护人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谢燕益律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案审查起诉、一审程序均已严重超期，我的当事人一直处于违法超期羁押的状态备受煎熬，一个如此简单的案件令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如此难办不知承办人的良知是否也曾备受煎熬？

自我介入本案后曾三次前往双流看守所会见我的当事人。三次时间不长的会见让我知道，邓小明先生是一位本分、善良的人，由于家庭的沉重负担，相信他已经没有过多精力再与人争执了，但是对于自己的信仰以及罪与非罪即使在近乎绝望的困境中依旧有着自己的坚持！

由于本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我国当前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为此我们就有必要联系本案先来谈谈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本案被告人邓小明的被抓发生在08年奥运会召开前夕即2008年6月17日，邓小明在家中被抓。众所周知，在奥运会召开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所谓保奥运稳定一说，一些地方的公权机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着手工作的。本案的发生此时就需要联系起来看问题。后面我会谈到本案存在为达到对无罪者追诉之目的有关方面有伪造证据之嫌。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明确规定，意图陷害他人故意作虚假证明，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这种嫌疑最终能够得到证实的话不单单是一个伪证的问题，我认为，本案的性质将会因此而根本改变，就不是所谓的被告人邓小明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性质了。犯罪的主体即被告将会转换成为本案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即其主要领导及办案人员。他们可能要承担重大的刑事责任，这个责任至少包括：一、伪证罪；二、滥用职权罪；三、徇私（情）枉法或枉法追诉罪；四、颠覆国家政权罪。前三条罪名比较好理解，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专门针对第四条即颠覆国家政权罪做一解释。为什么说本案侦查机关的有关人员一旦搞伪证就会涉嫌构成颠覆国家政权这一严重犯罪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权都要以民为本，明知是无辜的百姓却要其受到刑事追究并最终遭到刑事处罚，这无异于破坏了法律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同时也将大大损害执政党和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大家都知道刑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公法部门，是对自由的被迫约束也是维持社会秩序最严厉、最极限的选择，它绝不可以成为少数不法官员完成“假想的政治任务”达到个别目的的工具！无辜的百姓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某些人用来换取利益和权力的人血馒头！

大家也都知道法律是一个政权的基石，如果因为少数不法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破坏了法律的正确实施将使老百姓丧失对法律的基本信任对政权权威的崇敬。法律对于统治者来讲要比对被统治者更加重要一些，因为法律归根到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首先体现并保障着统治者的利益及安危在其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作出平衡。如果作为执法者明知故犯破坏法律的尊严，这一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面对这一规定，我们知道主体上颠覆国家政权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明知破坏法律实施行为会对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政权带来重大且无可挽回的影响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皆应当构成主观方面要件。客观方面采取了破坏法律实施这一足以导致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损害的具体行为。对照上面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犯罪构成来看，本案中侦查机关的行为是否就具备这一情况呢？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更有意义的结论：一个政权往往从其内部进行颠覆破坏要比从其外部进行往往会更有效，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都验证了这一点。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中就曾写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

也！想必他的这句话就可以为我们以上的结论作注解。当前警惕和防止一些不法官僚为达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时常出现权力滥用、贪婪投机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劣行径而使国家法治前途遭受彻底摧毁的这一形势十分紧迫！刚刚过去的 2008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众所周知由于经济危机、我国在转型一个时期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对于 2009 年来说仍将是充满挑战的年份，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公权机关则需要十分清醒、冷静、慎重的对待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的司法工作能够在充满挑战和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守法治原则坚定正确信念，那么一切问题就都有可能在法治的框架下获得解决，这无疑对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是一件幸事，但是如果相反，我们的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受少数不法官僚权贵挟持徇私舞弊不能依法办事秉公执法而是继续不断地透支国家、政府的公信力，法律失去信用后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很有可能自此滑向动荡的深渊。以上种种，我想在此申明，当前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理性、包容、法治及和解精神，而不是镇压、清算、采取暴力不惜违法的立场。罪与非罪法律上写得很清楚，辩论归辩论、犯罪归犯罪，在一个辩论场上使用暴力这本身就等同于在道义上的认输，包括法轮功的一些说法、思想在内，如果是错误的或有害的，执政党和政府完全可以拿起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对事实及真理加以澄清，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有这个历史传统和能力，宣传部门不能再尸位素餐下去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司法机关企图用文字狱这种违法的野蛮的方式搞镇压。真理只会越辩越明思想却永远无法被镇压。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如果在世的话肯定不同意这样搞下去，他们肯定有信心也有耐心运用他们擅长的辩证法雄辩的与他们的敌人一较到底，如此一来，还能顺便发展一下自己的理论。不是法轮功讲“天灭中共”吗？我看如果按照共产党自己信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命题无疑是成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要历经产生、发展、消亡这一过程，运动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共产党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时自然也会自动消亡（马克思、恩格斯都谈到过国家、政党消亡的问题），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有生就必有死嘛，无论如何，你都无法回避这个现实，而重要的是你面对死亡及人生的态度。作为一个执政党或者政府无外乎有两种结果：要么承载其历史使命光荣的退出历史舞台；要么是不能履行它的责任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始终追求正义与真理，始终为人民谋福祉在其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时候自然消亡了这又有何不可呢？法轮功或者其他任何方面给予一些批评甚或谩骂难道真能伤害到一个充满活力肩负正义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站在时代的潮头不断追求进步的政党吗？一个卓越的政党难道不能把批评当作一种自身发展的动力吗？这些道理十分浅显大家都懂得，我想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因为信仰问题、言论问题、传播思想等问题，动辄得罪，这是十分滑稽的事情，早在 3000 年前我国西周时期，我们的老祖宗周公就提出了“明德慎罚”、“慎刑恤罚”的主张。在当今这个现代文明的世界里，各国对刑法的适用都设置了极高的门槛，这在我国刑事制度的原则及具体规定中也都可以看到，难道这都不足以防止再发生那些思想定罪、言论定罪的荒唐事情吗？

大家都知道，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待法律不可能回避国家立场、政治立场问题。可是一段时期以来，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我们为数不少的各级司法工作人员存在一种严重错误认识并明显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之上。法律既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那么，现阶段谁能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的意志呢？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

来看，在政治上 谁拥有最高的权力谁就可以代表国家意志，目前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再进一步说就是现任的由九个政治局常委组成的常委会，可是我们 发现，关于法轮功的问题，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九常委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明确一致的决议。中国人有领袖情节，具体到领导人身上，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胡锦涛主席和具有最高行政权力的温家宝总理他们两位对于法轮功的态度迄今为止也并不明确。无论是政治局九常委作为一个整体还是胡锦涛、温家宝作为个别领导人既然对 法轮功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那么这足以说明，所谓对法轮功采用刑事手段进行打压这其实只是个别人的态度，个别掌握一定权力者假国家之名对法轮功进行打压。而胡、温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常委可能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而已，他们的这一不是十分明确的态度耐人寻味也发人深思！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宜简单理解为采用刑事手段打压法轮功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意愿，是政治局九常委的集体意志。

其实在现代文明法治的国 家里，真正的国家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通过代议机制以法律的形式反映自己的诉求。人心可鉴，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认识到通常法轮功练习者因 其炼功或传播思想就受到非法打压和迫害完全是无辜的。最近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一场有关法轮功危害性的研讨会就可以证实我的以上观点，这个研讨会虽然带有鲜 明的政治立场但同时也足以说明：第一，法轮功的是与非、对与错仍然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需要不断深刻认识与反思。法轮功不是讨论的禁区也不应该成为禁区，人为 制造恐怖气氛造成人们谈法轮功色变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第二、思想信仰问题是不可能被镇压的，采取刑事手段搞镇压这条路不大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第三、真理 是伟大的，如果让他自行其道的话，必然会盛行于世。真理是谬误的强劲克星，他无所畏惧，所向无敌，惟有害怕人们解除他的天然武器——自由地论争和思辩；当 批判被允许自由进行的时候，谬误也就没什么可怕了。

下面是我对邓小明无罪的几点基本认识：

一、 对邓小明定罪根本违背了宪法

从 我国宪法上看，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已经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立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3 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和承认自己在人权问题上的责任。信仰自由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不可推卸的责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 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是中国法律体系中对宗教信仰自由所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保护，基本上与国际社会通 行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标准相同。当其他各种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规定的具体措施企图威胁信仰自由时，邓小明信奉法轮功的行为及活动宪法第 36 条就是其信仰自由 的最可靠的避难所。

除了宗教信仰自由，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以下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言论出版表达自 由、集会结社自由、研究创作

自由、和从事文化活动等项基本权利。邓小明作为一位合法公民当然享有上述权利与自由，按照宪法规定来说，即使邓小明真有传播、散发文章资料的行为其实也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只不过是正在沐浴着宪法的一缕阳光依宪行使表达自由、研究创作、学习交流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与权利而已！

言论出版自由这一表达权利按照宪法的规定每个公民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印刷出版你的言论、作品或其他你信奉的思想、作品，印刷一些出版物，这是又一个严格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力（大家都知道言论出版自由是一个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当然，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个人的言论出版自由也有其一定的界限，后面我会谈到。行使言论出版的权力其实我们每天也都正在这样做，比如说，在互联网的论坛及博客中发帖跟帖，甚或我们时常在网上发表含有批评党和政府的言论，因为网上发表的文章往往会有成千上万的点击率，其实这就是一种出版行为，面对不确定的公众，这个例子跟图书、报纸出版发行何其相似？只不过一个是用纸印刷，一个则是网上印刷，论其影响力恐怕网上的方式还要更大一些。如果我们批评了党和政府那么我们是否就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呢？我说答案是否定的，言论出版通常是思想的延伸，不同的观点需要通过辩论来加以解决，结论留待实践去检验。对于一个公民来讲批评政府是我们的权利更是一种责任，而对于执政党的执政、政府施政来讲是它必须承担的成本，这也是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早已明确写清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近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积累形成的官本位、权力至上文化以及奴性麻木的社会意识使得长期以来大多数公民还不习惯于过一种真正国家公民的生活，漠视自己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多年来，由于我国个别部门出于利益考量以及狭隘的意识形态作祟，对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无线电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发言等权利严格管控起来，试图搞经济上的垄断、话语权的垄断、以至文化、真理的垄断，这与中央的科学发展观、依法治国理念、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何其不同！为此人们时常生活在没有真相的恐惧当中，坊间流传的“做人不要太 CCTV 喽”！这近乎人们一种愤怒的表达，与此同时，严苛限制民间办报、发行出版物、办电台、电视台更有甚者老百姓自己安个“大锅”式的卫星天线收看自己喜欢的电视也要管。我国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禁止、限制公民的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也只是对单位的出版活动进行了规范，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如果对公民的出版行为进行剥夺限制无疑将背离我国的宪法属于严重侵权行为。今年正值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1998年10月中国政府还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明确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其它选择的任何媒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这一规定与我国宪

法对言论出版权利的保障完全一致。但是，这些书写到宪法上的权利如果人们长时间不懂得珍惜和利用，就很容易被不法份子侵夺盗走。大家都知道，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与作为一个人来说须臾不可分离，交流沟通是人的基本需求，表达自由也是一个社会得以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一旦这些权利遭到长期非法剥夺最终则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死亡，此时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将被包办代替不能正常运转而引发相续不断的灾祸！大家也都知道，缺乏自由与权利的社会只能是被垄断、被代表、被奴役的命运！

那么刚才说了，表达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呢？通过学习总结我国的宪法、法律以及国内、外的一些历史经验可得到一些结论，公民表达自由的界限就在于权利人行使言论出版自由时不得对社会存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从私权上看则不得侵害个人隐私、名誉及商业秘密）。联合国促进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年年提及并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关于国家安全、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约翰内斯堡原则》为我们的表达自由进行了准确注解划定一条清晰可见的界线。其中原则 5 规定：对保有观点的保护任何人不得因其观点或信仰而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歧视或制裁。原则 6 规定：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表达在遵循原则 15 和原则 16 的前提下，威胁国家安全的表达可受到制裁，只要政府能证明：（1）该表达意图激起即将发生的暴力；（2）该表达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暴力；并且（3）在该表达与该暴力的发生或与该暴力发生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且紧迫的联系。

把“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作为表达自由的界限，是人类社会在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中为公权、私权的正确关系找到的一个标准答案。以美国为例，在其历史上，对表达自由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所谓的煽动性诽谤罪。1798 年，联邦党人通过的《反煽动法》即把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一律认定为煽动性诽谤的刑事犯罪，到了 1917 年又有《反间谍法》来指控各种反战言论，冷战初期则演变成著名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的泛滥造成当时美国国内大批共产党和左派人士被捕并遭受残酷迫害。而美国最高法院和学者，在处理煽动性诽谤上，并非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共识。先后有 schenck（斯肯克）案创设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dennis（丹尼斯）创立的“明显和可能的危险”标准，直到 1969 年的 brandenburg（布兰登伯格）案才为 50 年来变化发展的“明显和现存的危险”标准划定了一个句号，并认定，除非鼓吹使用暴力或违法是旨在煽动或激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并有可能煽动和激起这样的行动，否则联邦宪法不允许州禁止或剥夺这样的鼓吹，从而加大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表达自由的保护力度。不过，即便如此，也要注意，在哪怕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几乎没有人试图对涉及政府官员的出版物加以任何事先限制，这与一些专制国家有天壤之别。诚如美国前任总统布什所说：“虽然，在历史的长河里，公正有过潮起潮落，但是历史的发展方向清晰可见，那是自由本身的轨迹，也是自由的创造者留给我们的路标。在政府强迫人们做出某种象征性言论的案件中，法院则会毫不含糊地宣布政府的行为违宪。在这种案件中，法院的理由是：“政府官员不可规定政治中的正统信条，也不可强迫人们以言论或行为表达他们的信念。无独有偶，在我国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出现了对知识份子及不同政见者因言治罪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甚至后来还曾一度在执政党的最高层形成过“两个凡是”错误的政治指导思想。这是一个焦点问题，只要一个公

民的表达行为不具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公权力则不得干涉追究。显而易见本案中邓小明即便散发传播了一些宣传品这也完全是他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一个社会如果表达自由不能根据宪法予以保障，那么，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有可能动辄得咎因言获罪！

二、从逻辑上看认定邓小明有罪将是荒谬的。

首先从违宪的刑法三百条本身规定的内容来看：“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从语言逻辑上看“组织和利用”这显然是一个联言命题，如要构成本罪则必须既要组织又要利用两者同时具备才行，本案中既然公诉机关对邓小明起诉，那末至多只是利用如何有组织可言呢？他有这个组织能力吗？有组织行为这一事实吗？而他组织起来的组织又在哪里呢？既然刑法三百条是一个联言命题那末，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犯罪，所以邓小明因不存在组织行为所以就不构成刑法三百条规定的罪名，公诉机关仅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一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起诉被告，属适用法律错误。

第二、按照人们的正常思维，如果想通过刑事司法达到推定邓小明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结论，那么按照逻辑规则，一个命题的确立即邓小明构成犯罪这个命题的成立需要符合大、小两个前提条件，我们不妨推演一下：小前提是：刑法上规定了利用邪教组织就构成犯罪，大前提是：邓小明具有利用邪教组织的情形，结论是：邓小明构成犯罪。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命题似乎可以确立，但仔细一想，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因为小前提是一定的即刑法的规定性，但大前提之中却有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何为邪教的问题？何种事物构成邪教也是需要逻辑推定才能知道，比如说如果法律规定：具有批评党、反对社会主义言论的宗教组织即是邪教（这也是一个小前提），宗教组织甲具有批评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大前提），那么宗教组织甲就是邪教。可是现在，在逻辑上我们暂时无法得到宗教组织甲就是邪教的结论，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还不存在一个认定邪教的小前提即我们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认定邪教的法律标准、法律规范来对邪教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进行概括。所以在上面第一个逻辑命题中因为大、小前提中同时存在邪教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却又始终无法明确，自然人们尤其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就不能想当然，仅凭直觉或靠一些政治觉悟、社会观念主观臆断的、感性的、自作主张把法轮功与作为法律概念中的邪教等同起来，既然邪教的问题没有解决，邓小明也就无法利用邪教组织构成犯罪。

利用逻辑规则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方面证明邓小明无法构成犯罪，比如：根据刑事诉讼法上的相关规定，有充分、合法证据指证并经合法的诉讼程序才能够认定邓小明构成犯罪（如果这又是一个小前提），而现实存在合法充分的证据并且追诉程序合法（这又是本命题中的一个大前提），结论：邓小明构成犯罪。

但遗憾的是，在本案中，因为，目前我们看到本案的侦查、审查起诉、一审皆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邓小明存在犯罪事实，证据之间尚存在重大矛盾侦查机关的取证无论从程序上还是提供的证据形式、证据内容都是违法的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的证据无法形成有效地证据链条，那么在本案中“充分合法证据以及程序合法”这个大前提就不可能存在，因此，邓小明也

就无法被证明构成犯罪。

三、从证据和法律程序上来看根本无法对邓小明定罪：

1、结合证据材料卷三第三页对证人吴霜的询问笔录吴霜称：“2008年6月17日上午8时，我和我的朋友王淑均在华阳富民路十字绣地毯店买东西时，看见店内茶几上放了一本法轮功书，我随手就拿起来翻了一下……”证据材料卷三第十四页对证人邓炼石的询问笔录：“昨天那两个女的来我们店里，她们看到铺子上有一堆书，最后他们看到法轮功的书就找我爸要，我爸说现在国家不允许就没给她们，她们一再要求我爸才给了一张光碟给她们。”又见证据材料卷一第九页第十一页吴霜均以见证人身份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本案中吴霜等人以要书为名引诱侦查、制造相关证据，对被告人邓小明完全是一种构陷的性质。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双流县人民检察院是否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依法进行审查并及时纠正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侦查行为的合法性直接决定本案相关证据是否有效。与此同时，在整个案卷中辩护人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被告传播、散发宣传品的证据，对于公民持有宣传品定罪的法律依据何在？

2、证据材料卷第7页《双流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明确显示该文件于2008年8月12日提出，而邓小明早于2008年6月17日被抓获，在整个案卷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呈请延长拘留期限报告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程序规定属于非法拘禁的性质，侦查机关这种滥用强制措施的行为侵犯了被告的人身权利，故而在此期间被告被非法拘禁期间的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并且双流县公安局应当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关于作为证据使用的电子证物检查笔录及搜查笔录方面，侦查案卷中所谓的《电子证物检查记录》，辩护人不知侦查机关将其作为何种证据使用！如果侦查机关拿它当作鉴定结论来使用，那末侦查机关以其同一系统内部单位双流县安公安局网监大队的检查记录作为鉴定结论则构成自侦自鉴违反了刑事诉讼程序并且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以及第一条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之规定，显然该笔录制作单位双流县公安局网监大队不具有鉴定资格；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搜查记录（即对电脑及存储设备内进行“搜查”并进行客观记录）那末根据刑事诉讼法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应当由当事人及见证人在场才具有合法效力，而在本案这一“搜查记录”中没有交待见证人身份因此就不能排除记录不真实甚至存在人为栽赃将原本没有的电子信息文档加诸于上的可能性。

4、双流县检察院《起诉书》中第三段末句称：“经成都市公安局610办公室鉴定，以上物品均属“法轮功”物品。”第四段：“本院认为被告人邓小明因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受过处罚后又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从以上描述上看，所谓法轮功宣传品的甄别依据是什么？成都市公安局610是否具有司法鉴定资格？对于这些文字资料在无内容鉴定结论的情况下作为证据使用如何避免偏见与主观臆断，这必然导致缺乏证据链条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5、从全部侦查案卷来看本案除了被告作为法轮功习练者自己持有的一些资料、用品及电子信息外无任何证明其具有犯罪行为的证据。双流 县人民检察院起初似也持这一观点，该院曾以证据不足为由而退回补充侦查（见《退补侦查决定书》）。而当检察机关退补侦查后侦查机关并未提出任何新的实质性的证据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 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但令人遗憾的是双流县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同时又是法律监督机关违反了上述规定，甘愿做制造案件违法追诉的帮凶！

综上所述，尽管侦查机关及有关部门的侦查取证行为采取了诸多非法手段甚至已经涉嫌犯罪，但是，最终仍然没有形成一个足以指控 邓小明构成犯罪的逻辑严谨的证据链条，审判机关此时不可不慎重司法务求严格按《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无罪推定、重证据，口供不能单独定罪”的刑诉原则 办事，避免成为滥用权力者的帮凶，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从犯罪构成上看邓小明不构成犯罪

1、邓小明不具有该罪的主体特征

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便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违宪性文件《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 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也只是规定对待法轮功修炼者应以教育为主，只惩办极少数构成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人员。

邓小明作为法轮 功信仰者虽然笃信法轮功，时有修炼。但邓小明只是一个信仰者而已，只是以自己的行为去践行自己的内心确信，他坚信“真、善、忍”的信条，即便他真的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传播自己的信仰那也是极正常的事情，就像基督徒愿意传播基督教、佛教徒愿意普度众生布施佛家信仰一样。本案中通过所有证据来看，邓小明不但不 是法轮功组织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骨干成员而且就连一般的传播、散发这些本属于宪法保护的行为都实难指证，因此他根本不具备主体的法律规定性。

在 1999 年法轮功被打压之前，官方确认全国各地法轮功信仰者总人数多达 200 万以上，社会有资料显示其信仰者达 9000 万以上。信仰者的动机都很单纯，完全是为了祛病健身修心养性，主观上没有反对现行体制的政治目的。其中许多法轮功学员，正是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不愿唯利是图，能坚守住做人良知的离 退休或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

邓小明与其他众多中国公民一样学习、修炼法轮功，被法轮功教义吸引，通过自己的修炼感受到法轮功的益处，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境界，与邓小明内心固有的对“真善美”的追求产生了共鸣，而认同法轮功信仰。邓小明没有因修炼法轮功教唆别人犯罪，没有组织、策划行为，也没有利用法轮功组织，只在自己的内心与思想深处以法轮功教义为指导修身养性，追求法轮功教义的“真、善、忍”。

邓小明作为法轮功信仰者，没有参与任何组织，也没有利用任何组织，根本与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人员无关，对公共领域和社会公众没有任何消极影响，更没有破坏国家法律，若认定邓小明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成立，则完全违背了全国人大决定的精神实质，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2、邓小明不具有该罪的主观要件。首先，邓小明认为法轮功指导信众从善行善，修身养性，不可能是邪教。邓小明把对善的追求作为其修炼的根本和唯一目的，不认可关于法轮功是邪教的论断。其次，邓小明修炼法轮功没有抗拒法律实施的目的。邓小明的行为是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表现。思想自由的含义不单是纯粹的大脑活动，表达自由则是思想自由的延伸。思想者、表达者把自己的思想外化为日记、手稿、文字标记、电子数据或通过其他媒介传播其认可的观念，若法律仍对其定罪量刑，则是对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严重侵犯。邓小明是一个思想者、信仰者、表达者，为了精神生活修炼、学习、交流，没有对他人造成消极影响，更没有煽动他人破坏法律实施。必须保护邓小明作为人应享有的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因为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要求，是基本人权，不容公权力肆意介入和侵犯。

3、客观方面因邓小明的行为不具有现实的危险性，这一点应属本案的焦点问题，显而易见的是，邓小明的行为更确切地说其思想离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尚距十万八千里，侦查机关不但无证据证明其主观方面的意图，从一般常识来看，更无从证明“明显即刻的社会危害性”的事实，这正是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公民宪法权利的屏障。

4、而从客体上来说，大家都知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侵害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而只有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表达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才具有法律维护保障的价值，而剥夺限制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表达自由的社会管理秩序因其违反宪法、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但不应当保护反而人人都应当起来努力摧毁之！很明显，社会管理秩序这一客体肯定是大多数人意志体现下的法治的秩序而不能是少数人意志体现下的人治的秩序，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表达自由等正是大多数人意志下的法治的秩序，唯有靠全社会共同努力坚决捍卫这种法治的秩序，社会才能不断发展进步，正义才能得以伸张。

五、对宗教信仰进行惩治的规范体系因违宪而无效，并且它亵渎了宪政精神和普世价值。

（一）刑法三百条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属于违宪无效的文件。

古先贤有云：“临事制刑，不预为法”！1997年刑法修订的现三百条规定的内容，即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它明显违反了宪法对于宗教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

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根据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可知刑法三百条因违反宪法规定而不具有法律效力。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七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等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与全国人大的立法相抵触，又据立法法第八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四）犯罪和刑罚；（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大家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全国人民意志的委托 代表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只有它才可能具备为维护社会秩序依宪制定刑事制度正当剥夺、限制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的权力，由此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9 年制定 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则不具有合法性，嗣后两高的关于刑事制度的一系列创制均属违法行为，严重违背宪法、立法法的规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不仅违反了立法制度更主要的是变相干涉剥夺了信仰自由而这一非法法律却还在选择性适用。由于国家机关执法人员 缺乏宪法意识，在实践中公民信仰者遭受来自执法机关经常性侵害的实例比比皆是。把仅仅是传播信仰、印制宗教书籍、说明真相、游行抗议、悬挂标语等传教行为 或表达思想的行为当作违法犯罪行为来处理，造成了相当普遍的冤案错案。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家里藏有法轮功书籍或光盘、仅仅因为电脑里存有法轮功资料就被关 押、强制洗脑、劳教或判刑的现象，极为普遍。

1、刑法三百条内容上的“邪教”不是一个法律范畴术语，世界各国刑法条文中，鲜见“邪教”一词。

不管是 2500 年前释迦牟尼传讲佛法，还是 2000 年前耶稣宣讲主的道，他们都遭受过当时其它宗教的指责和排斥。正教与邪教之争始终与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相伴，而宗教信仰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决定每一门宗教自称正教的同时很容易贬低或排斥其它信仰，乃至将其归为“异端邪说”。也就是说，信仰之间的孰正孰邪以及如何区分是超出世俗之外的话题，不是世俗的评判标准能够衡量和干预的。

正如耶稣所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一个世俗的政府显然不适合作为某种信仰属正教还是邪教的区分与评判者。更何况，一个将无神论思想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什么样的信仰是邪教，这显然是有悖常识 且难以让人接受的。从这一点看，中国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使用“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采用各种手段……”这样的描述来定义邪教除了表明该立法因负有反 法轮功这一政治任务而显示出的直接针对性外，无疑也表现出立法者对信仰这一属于神学领域的话题相关知识的贫乏。

信仰自由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成果之一，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于基本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体现了对人权、人性、公平、正义等人类普世价值的保护。各国刑法条文内容大同小异，这也是由于刑法所要保护的客体的共性决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条文中含有“邪教”、“不好的宗教”或者是“不好的信仰”等类似用语。在众多刑法条文中含 有“宗教”、“礼拜场所”、“信仰”等词汇倒是很多，但几乎都是在法条中作为被保护的客体内容（类似于中国刑法第 251 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宗教 信仰自由罪”），显示出现代文明国家对信仰自由这一天赋人权的保护。

除刑法之外，从各国立法看，实际上也没有法律意义上通行的国际或者国家 标准。法律规范的对象只能是行为，而不能涉及信仰和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单纯针对某种信仰的正和邪进行价值判断并决定是否予以取缔的做法无疑是中世纪“宗教 裁判所”行径，早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荒谬的且极具危害性。

2、 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名义对法轮功进行打压的非法性。

行 为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四要件，缺一不可。一则确定犯罪结构的刑法条文，如果没有需要保护的客体，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可做定罪量 刑依据的独立法条；一个行为，如果没有侵犯某则刑法条文确定的需要保护的客体，那么这个行为即与该法条确立的罪名无关。我们看一下刑法第三百条分别要保护的客体：第二款客体是“自然人的生命权”；第三款客体是“妇女的人身权、自然人的财产权”。我们着重看第一款，即“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从该款内 容完全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本意，即为了避免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在施行中遭到基于信仰原因的阻挠而设定。亦即，本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破坏了特定的法律、行政法 规的实施致使达不到立法目的，且情节特别严重。法轮功信仰者的修炼行为没有违反哪部具体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更没有破坏法律实施。

而破坏法 律实施应当有具体的遭到破坏的法律对像即破坏哪一条法律或哪一部法律，被破坏的法律必须是具体的法律而非抽象的法律，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会发现，邓小平作为信仰所习练的法轮功没有破坏任何一部法律或任何一部法律的哪一个法条，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举出一个例子来，可能有人会说，法轮功就是破坏 了刑法三百条这一条法律的实施，那么这时在逻辑上就会出现问 题，因为刑法三百条这条法律的实施只有当存在被破坏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到实施，如果没有“破坏行 为”，这条法律将永远无法实施，这就造成了习练或传播法轮功者实际上是在帮助刑法三百条这条法律的实施，所以这是个立法上的问题，立法者在逻辑上没有考虑 清楚就立出这条法律来了，刑法是一个体系，它有总则又有分则，具体的罪名和统领全局的刑事原则都有内在的联系，所以不顾宪法刑法体系的要求任意制造个罪名 出来并不是明智的做法。

每一宗教都是一种思想意识，包含一套价值体系和超验主张，它一旦产生，便如同人之生命一样，是一种事实，并不以法 律承认为前提。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了法轮功生存、发展的自由及公民信仰法轮功的自由。从世界范围看，除中国大陆外，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禁止它 的传播。民众难免产生疑问：难道中国大陆的信仰自由原则与其它宪政国家不同吗？到底谁的标准有问题呢？为什么众多国家的认识与中国有如此明显的差异呢？

对 邓小平这样的法轮功信仰者采取高压政策不但违反了普世原则和中国宪法，而且从实用及历史的角度来看，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法轮功原来在国内允许自由存 在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影响有限的宗教；但是，自 1999 年对法轮功采取高压手段以来，不但没有制止它的传播，反而使其影响力扩大到世界范围，成 为世界性的宗教。从历史上来看，对宗教、思想进行镇压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尽管过去的一千年里对各种“异端”的迫害不遗余力，但恰恰是当初被蔑为异端的宗 教成为当下的主流宗教。无论是宗教裁判所的鞭打和火刑，

还是法西斯和极权政府的强制洗脑，都无法摧毁人们内心和灵魂的选择。政治压制只能把宗教运动变成现实的社会运动，残酷的镇压除了制造政治恐怖气氛和人道主义灾难以外，也会制造激烈的社会政治运动。

强迫法轮功信仰者改变或放弃信仰，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带来的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人自危、谈法轮功色变，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清洗人们内心信仰，既超出了政府的合法权限，也超出了任何世俗政权的能力。我国政府应当检讨前期政策，适时做出调整，尊重普世原则，践行宪法，在中国早日落实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原则。

（二）对法轮功信仰者定罪亵渎了宪政精神和普世价值

1、对法轮功信仰者定罪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人类有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人类需要心理、情感、精神的慰藉和灵魂生活，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际遇、文化滋养和生命体验，致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信仰与思想情感。

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保持人性发展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信仰自由，就像生命的权利一样，不证自明。人类经过极为艰苦的奋斗、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终于在近代把信仰自由确立为一条普世规则。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8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受到压制，而有损其选择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人人有表明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所规定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也明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

信仰自由涵盖了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三个维度：第一，宗教自由原则，即作为公民信仰的对象，宗教本身有生存、发展的自由；第二，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即信与不信，信何种宗教，以何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第三，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团体、党派、组织、个人、包括宗教团体都不得采用暴力或其它手段干涉宗教的生存、发展自由，也不得采用暴力或其它手段干涉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

信仰自由意味着允许个人自主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形式，既可以选择信众众多的宗教，也可以选择信众较少的宗教或新兴的宗教；既可以选择已有的教派，也可以创立一个新的信仰体系；既可以是无神论，也可以是有神论、多神论或一神论。无论信仰真主、信仰上帝或者信仰法轮功，都属于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同时，公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各种宗教活动，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公民一旦没有参与宗教实践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一纸空文。

由上文可以确信邓小明行为的信仰性质，若对邓小明定罪，即是思想入罪、信仰入罪，表达入罪将与普世价值、法治精神及我国宪法背道而驰。

2、定罪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

在世界历史上政治朦胧时期，宗教与政权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宗教被立为正教，另一些则被贬为邪教、异端；有的被立为国教，另一些则惨遭打压、取缔；有些宗教干脆与政权合二为一，对其它宗教斩尽杀绝。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信仰自由最终被确立。由杰弗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宣称：“信仰什么宗教，是上帝赋予人的天然的权利，不受他人的强迫，如果允许政府把权力伸张到信仰领域，由官吏做主，那就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信仰自由。”

政教分离原则建立了一道政教“柏林”墙，它体现的人神分野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相互没有统领和依附的关系，它从理论上斩断了两只“手”：一只是教会伸向政权的手，任何教会休想通过设立国教攫取世俗权力；另一只手是世俗政权伸向宗教的手，统治者休想利用教会干涉人民信仰自由，用信仰增加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信仰是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宣教者无罪，信教者自愿，任何势力无权干涉。说到底就是人民有信“邪教”的自由，至少是信了“邪教”也不会失去人身自由。可以说，“邪教”在这个世界占了多数，这可以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导出：每一个教派都宣称自己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那么其他教派的教义就是荒谬的，当然这些教派就是“邪教”了。在无神论者眼里，所有的有神论都应归为邪教了。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再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有权宣布它喜欢的宗教为国教；同时，它也丧失了宣称它不喜欢的宗教是邪教的权力。因为一旦政权有认定正、邪教的权力，一神论信仰者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多神论宗教是邪教；反之，多神论信仰者掌握的政权就有可能宣称一神论宗教是邪教，而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所有的有神论信仰是邪教，信仰自由根本没有丝毫保障。可见，法律如果不能保护“邪教”，也必然不能保护“正常”的宗教。

信仰包括主观、个人属性的价值和无法验证的超验主张，是公权力不应涉足的思想领域，是政府绝无理由介入的灵魂事务。政府既无权力确立一种全民的信仰体系，也无权力评判或取缔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当下中国关于制裁邪教和取缔法轮功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完全偏离了思想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

3、对法轮功惩治违反了“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刑法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

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信仰属于思想层面，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信仰而遭受不公正对待；信仰本身或者信仰者这一身份不构成犯罪，不应受刑罚惩治。

有人会问，日本政府不是取缔了奥姆真理教这个邪教吗？事实是，日本官方并没有定性奥姆真理教为邪教，并且这个宗教团体仍然合法存在。1993年3月，东京地铁遭受沙林毒气攻击，12人死亡，5000人受到不同程度伤害。教宗麻原

彰晃是杀人主谋，他还涉及其他几起毒杀谋害案，共计 27 条人命。案件共经历了 7 年 10 个月，开庭 257 次，2003 年 2 月结束一审，宣判以麻原为首的 12 名凶犯被处死刑……。1997 年 1 月，日本最高司法部门否决了取缔奥姆教的动议，隶属于日本法务省的公安审查委员会在 2000 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中称奥姆教为“实行过无区别的大量杀人行为的团体”应予以“观察处分”，日本实际上维护了奥姆教的继续存在的合法性。1999 年 12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打击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两个法案，即《关于对实施大规模滥杀行为的团体进行限制的法案》和《破产特例措施法案》。前者要对“曾肆意进行大规模滥杀的”团体加强监控，后者则用经济手段对其进行惩罚。

日本政府没有做出取缔邪教，或者禁止教徒维持信仰的法案。难道日本不清楚奥姆真理教的危害吗？是立法机构想遗留祸根让东京再来一次混乱吗？显然都不是，而是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公权力的界限。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之罪；信仰这一精神层面的事务，已非政府和法律的管制领域。很显然，有些信仰会扭曲或背离了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以恶为善，杀人有理，蔑视人权。但是，只要它没有进入犯罪或预谋犯罪的刑法调整领域；或者虽然犯过罪，但已经治罪，目前也已经停止犯罪；在这些情况下只能加强监督，不得以其存在犯罪记录而强制清除大脑中的信仰和思想，这是现代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

对于某些离经叛道的教义，也只能由社会的舆论和公德去制约，通过批评和思辨，凭藉信徒的自由意志，自愿给予纠正。杰佛逊针对一些人唯恐正道不行、邪教惑世的忧虑，有一段名言：“真理是伟大的，如果让他自行其道的话，必然会盛行于世。真理是谬误的强劲克星，他无所畏惧，所向无敌，惟有害怕人们解除他的天然武器——自由地论争和思辨；当批判被允许自由进行的时候，谬误也就没什么可怕了。”人是社会的主体，需要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自由地接受信息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人如果被阻隔了外界的信息、剥夺了表达的空间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他的生活将缺少尊严；他的人性就得不到充分发展。信仰自由真正实现，就必需表达自由存在，这已经是现代人文精神的一部份。

（三）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过激、违法，有些已构成犯罪。

1998 年 7 月 17 日在罗马举行的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该规约于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现有 90 个缔约国。该规约第七条关于危害人类罪（一）8 规定：“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第三款界定的性别，或根据公认为国际法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而且与任何一种本款提及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本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结合发生即构成危害人类罪。”该款提到的行为包括：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酷刑、强迫人员失踪、种族隔离罪、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等。可见，基于信仰对特定宗教团体迫害构成危害人类罪。

宗教最核心的特征在于超验性，宗教信仰是价值观念上的认可，有一套独特的价值与知识体系，只要相信就行。就如上帝、真主或佛祖，他们面目如何，现在何处，难以回答，可能只在人们心中。宗教属精神领域，处于世俗的政权不宜

进入。中国确定邪教没有明确的标准，也没有激辩质疑，只是单方的强势话语。中国虽然没有加入上述规约，但这种没有正当程序、事实依据，一方缺位的判断与认定，已然违背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

国家工作人员负有在法定范围内履行职责的义务，超越职权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中国《刑法》第 251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当前，惩治法轮功信仰者的行动包括：监视、跟踪、窃听、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法轮功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对一个遵纪守法的信仰者采取上述措施，无疑都是违法的，情节严重的应负刑事责任。同时，由于“转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此种方式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也是非法的，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劳教制度本身违反宪法和立法法，本身没有合法性，依据违宪无效的法律限制公民的自由，是一种公然违法犯罪行为。对法轮功案件的实际侦查和审判过程往往存在着大量瑕疵，比如对律师介入法轮功案件的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未受尊重、未做到审判公开、各地 610 机构对司法机关的不当干涉、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等。

我认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过于激烈的运动式惩治行动，缺少对人权的基本尊重，违背起码的程序正义，有些行为构成违法犯罪；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刑讯逼供明显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依法治国原则，违背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理念，也与国际人权准则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六、结语。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知识的渴求、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对正义的求索。由于不同的进路与回应，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这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差异化的宗教信仰方面。这种差异、加上一些宗教对信众的排它性要求，宗教与政府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宗教内部各派别之间极易产生纠纷和流血冲突。经验表明，没有人能垄断真理，解决宗教问题必须遵循普世的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宗教自由原则、信仰自由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它们是一切实行信仰自由原则的法治国家必须承认与遵守的原则。本案看似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实际上是一起不寻常的宪法案件，一个关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信仰自由的大案。

诸位法官：请您遵照法律的规定直接宣判邓小明无罪。您的这一决定不但会帮助一个无辜的当事人、一个无辜的家庭维护我们的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从长远来说，还能帮助在本案中已经涉嫌违法犯罪的那些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让他们的错误能够得到及时纠正以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法律后果如前所述的滥用职权、枉法追诉、徇私枉法等等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些罪行今天不被追究并不代表将来永远不会被追究。法轮功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身没有面对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勇气与决心，不管任何理论、思想、信仰、学说我们都需要首先了解它认识它然后用我们的思辨能力、实践精神去加以检验，再来决定是热爱信奉还是批判否定作出取舍。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法轮功作为一种信仰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公正的对待其信仰者、练习者、传播者，彼此倾听，深入了解、真诚相处、互相善待，我们也必将得到公平的回报。用强权消灭思想从来都是徒劳的，谁都知道，肉体可

以消灭思想却无法强加。如果我们的司法机关能够通过一次又一次正义的司法判决抚平社会创伤致力于教化与警醒之职，能够与全社会一道用宽容的态度去面对它，我们的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不是相反。今天我们在这里获知 本案的案情，每个人的观点、所有案卷不仅是法律的证据更是历史的证据它们无不折射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身上的人性与人心的。法国大作家雨果曾说：“面对 罪恶，如果你不说不，你就是同谋”。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说过：“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激烈的萨特认为，当别人承受不义、迫害与暴力，一个人如果 旁观而不予抗议，那就是罪人。今天，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在面临办案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有所选择却无所作为意图将一切责任推到体制原由上去那其实就是 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明天回头看时，我们或许就会为自己的懦弱、自私、短浅而感到羞耻和悔恨！据我所知，近年来“法轮功”案件从普遍重判向轻判趋势发展， 并且在本案审判之前各地已经开始出现诸多法轮功案件发回重审、判缓刑、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范例，这充分说明人性良知正在发挥作用，同时也表明正义的彻底胜利已为时不远，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对待法轮功问题采取和解的立场才是明智的选择是大势所趋，没有人能够违背历史潮流！

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但这种发展绝不会是自发的，它需要每个有志者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去推动，哪怕作为单个人的这种推动作用十分微小，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进步正是汇聚起来这些点滴努力，不屈不挠为捍卫真理的斗争、牺牲而成就！

我们都有自己的妻儿、父母，当我们的亲人仅仅因为信仰问题就遭受残酷迫害、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甚至死于非命，我们自己将如何面对？漠视一个生命的黯然逝去、漠视他人的自由被非法剥夺，以沉默面对社会所处的不幸？只要有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大家都知道，国家机器无意识，少数人的意识并不能真正代表国家机器，但一个国家却可以 有意识，它正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和行动，如果我们每个人勇于坚守原则，敢于对一些错误观念、错误行为作斗争，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具备一个良好的意识。现在，让我们真诚面对眼前的这位同胞、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尊重宪法和法律、尊重他人的自由与尊严，承担起历史责任，勇于直面现实和自己的良知，作出 一个正义的判决，它也终将会被历史判决！

立此存照！

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谢燕益律师

2009 年 7 月 8 日

谢燕益：法轮功学员吴从美无罪辩护词

【前言】法轮功冤案不翻，国难未已！

谢燕益

作为参与过多起法轮功信仰案件的辩护律师，有责任也有条件从事实与法律的角度、历史的角度，面对是与非，认真总结过去一段时期的经历与思考。因为它不仅事关法轮功信众的基本权利、尊严与命运，这件事也必然关乎人道与正义，事关我们每一位中国同胞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良知、命运与尊严！以下是笔者作为辩护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出庭辩护、维权过程中的部分法律意见。

~~~~~⊙⊙~~~~~

## 法轮功学员吴从美无罪辩护词

谢燕益

对待法轮功问题采取和解立场才是明智的选择是大势所趋，违背历史潮流将会带来更大的人道灾难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

### 审判长、审判员：

我是北京市凯泰律师事务所谢燕益律师，作为吴从美的辩护人通过对本案的证据、事实、相关法律进行分析，认为对吴从美涉嫌破坏法律实施一案，二审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225 条、第 195 条之规定对吴从美作出无罪判决。

首先需要明确本案中辩护人所持有的一点立场，本人既非中共党员也不是法轮功练习者，尽管本辩护人比较尊重法轮功信众的这一信仰。我仅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法律工作者和一个有良知的公民有义务直面本案发生的事实，有义务讲真话、行正道为公民权利而辩。

本案的发生，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本案的审理工作，本辩护人认为完全是由于个别人的错误导致的，这完全是一场不必要的审判。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个别人的错误、个别人的意志并非等同于国家意志、

执政党的意志。我们需要将个别人的意志与国家意志、法律的意志、执政党的意志加以区分，个别人的意志不仅不能代表国家、代表执政党而且可能因其违法性是反国家、反法治、反党、反社会、反人类的。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不能因为个别人的错误而承担如此大的代价。我们每一位社会公民、党员、国家公职人员不仅不应该执行个别人的错误意志，而且还有义务、有责任坚决与这种错误意志、错误行为作斗争，以捍卫国家的正当意志、法律的正当意志、执政党的正当意志，坚持原则，不跟反法治、反党、反国家、反人类的恶行站在一起，如此才能真正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法治以及维护执政党的权威。作为一个党员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怎样做才是真正维护执政党？怎样做才对贵党更有利？而怎样做才是陷贵党于不义，因为个别人的错误让贵党蒙羞并且继续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如果你是一个公民、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一名党员应当好好学习一下《宪法》、党章，以及文革结束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决议，看一看历史，看一看人类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

本辩护人认为，包括吴从美在内的所有法轮功学员象你我一样，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姐妹。一段时期以来，对待法轮功的种种恶行、违法的做法，有些公职人员、司法工作人员由于无知，受到少数反法治、反党、反人类分子的利用，这些被利用的公职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本辩护人认为，他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可能真的认为抓捕法轮功以及对这一群体实行严刑峻法对国家有利是在贯彻国家意志、是在维护社会秩序，不能排除其用心、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由于他们受到蒙蔽、受到蛊惑，再加上对《宪法》、法律、历史以及一些常识一知半解产生一些错误认识，分不清什么是国家意志什么是个别人的意志犯了错误。而另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公职人员、司法工作人员，为了自己的权位、利益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没有法律依据，明知法轮功学员是无辜的，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在遭受异常的打压迫害的情形发生以后为了生命、生存与尊严被迫的申冤与抗争，法轮功学员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社会危害性，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及权利完全受到《宪法》法律上的保护。这些国家公职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明知我们国家、执政党内部一直以来存在一股反法治、反党、反国家、反社会、反人类的封建专制残余、腐败特权分子镇压群众、迫害人民不管其以什么样的名义，这些国家公职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明知在一个国家内部，合法意志与违法意志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存在，却仍执迷不悟、知法犯法，配合少数违法的当权者（国家公敌）倒行逆施、滥抓无辜者、起诉无辜者、审判无辜者、制造冤狱。违法的当权者不管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最终都难逃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公审、法律的制裁。对明知违法、明知为恶者、残害百姓、荼毒生灵者天理难容、国法不容！

明知作恶而为之，必不能被人类文明所接受必遭到历史的唾弃。正义往往迟到，幸运的是，正义却从不会缺席！只有让作恶者付出代价，良善才不会死亡！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对明知故犯者，从现在起就有

必要提出控诉，必须进行历史的清算，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让作恶者付出代价！有鉴于此，本辩护人善意提醒，在吴从美冤案中当事人及其家属有权利对一切制造冤狱的涉案人员展开全面的追诉控告。

关于本案下面有几个案例需要在此首先介绍一下：

2008年10月，湖南怀化，法轮功学员唐开菊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向爱梅、唐芳菊也分别被判缓刑三年。

2009年7月，湖北黄石法轮功学员熊凤莲被黄石中级法院判处缓刑。

2009年2月，沈阳皇姑区法院四位法轮功学员蔺怀宇、赵国良、蔡宗斌、刘桂凤被判免于刑事处罚。

判缓刑的案例还有上海金山区法院陆彩华、张红梅、葛肖天以及天津等地案例。

2010年5月福建福州仓山区法院判决法轮功学员叶巧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这个案子之所以要判缓刑主要原因是由于办案机关制造案件、制造证据被律师揭穿所以不得不放人，当事人叶巧明出狱后提出上诉并对相关责任人提出了投诉控告追究其法律责任。

2010年7月广州市民孔宇洁、李冠平被天河区公安局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抓捕，历经半年多时间的刑事羁押后，2011年1月19日下午，孔宇洁被无罪释放。

2010年11月，辽宁本溪司法机关对一名法轮功学员刑事拘留一个月后最终改为劳动教养所外执行。

2011年7月，南京司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马振宇刑事羁押一个月后改为劳教处理。

2012年，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爱英、王洪亮提起的上诉二审案件发回重审，嗣后，河北省武安市检察院提出撤诉，原一审有罪判决最终被推翻，2012年12月21日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武刑初字第199号刑事裁定书将案件撤销。

2009年1月，中国社科院对法轮功问题进行了研讨，体制内理论界对法轮功的理论探讨从此走出禁区。

虽然上述对法轮功学员的处理仍不免冤假错案、制造的案件，但近年来“法轮功”案件从普遍重判向轻判是个发展趋势，并且在本案审判之前各地出现诸多法轮功案件审而不判、发回重审、判缓刑、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做出其他处理的范例。

## 【第一部分】从价值理念和法律适用及证据上看被告人无罪。

首先，吴从美作为法轮功练习者，学习研究法轮功书籍理论，关注涉及到法轮功的一些信息动态，并且由于对自身命运的关切、对因其个人信仰遭遇的不公而鸣不平采取自我救济依法维权抗争的举措这都是她的个人权利。既然是法轮功信仰者即使她向别人传播交流其价值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好比我们有的人相信天赋人权、愿意秉持诚信、善良、宽容理性的人生态度一样也总是愿意向她人传播交流自己的思想理念。人的信仰、价值观属于精神领域的事情不可以强制。思想观点却可以自由表达和交流，我国《宪法》和法律做出了明确规定，严格保障信仰自由、言论表达自由、学术创作研究自由等这些基本人权。通过学习总结《宪法》、法律以及国内、外的一些历史经验可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公民的表达自由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形下才可以被限制，即煽动暴力并且这种煽动会产生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因此即便是比较极端的谩骂、攻击政府、针砭时政也都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

由于当前我国存在一些处理法轮功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虽然站在辩方的角度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的效力提出质疑，但就本案而言即便是按照上述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的规定，吴从美也无法构成犯罪。

首先，一审判决书第五页第二段、第三段称：“本院认为，被告人吴从美因传播邪教宣传品受到行政处罚，又继续传播邪教宣传品，其行为已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决如下：被告人吴从美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一款之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从语言逻辑上看“组织和利用”这显然是一个联言命题，如要构成本罪则必须既要组织又要利用两者同时具备才行，本案中既然一审对吴从美作出有罪判决，那末至多只是利用如何有组织可言呢？她有这个组织能力吗？有组织行为这一事实吗？而她组织起来的组织又在哪里呢？既然《刑法》300条是一个联言命题那么，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犯罪，所以吴从美因不存在组织行为所以就不构成《刑法》300条规定的罪名，一审仅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一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判决被告人，属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刑法》定罪的基本原则。

其次，针对一审判决书确定的所谓犯罪事实：“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从美因参与邪教组织活动，并传播邪教宣传品被行政处罚后，于2011年12月份在会理县城关镇城北小广场向路人散发“法轮功”宣传品，2012年1月17日又在会理县城门洞附近发放“法轮功”宣传品，

2012年1月20日再次到会理县城门洞附近发放“法轮功”宣传品。2012年5月29日，公安机关对吴从美的住宅进行检查，从其住处当场查获《九评共产党》、《2012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等法轮功光碟385张，法轮功破网软件51碟，《明慧周刊》、《转法轮》等大量法轮功书籍226册，法轮功磁带62盒，各种法轮功宣传单562份，真相币489张，不干胶标语876份，李洪志挂象三张等大量法轮功宣传品。”（见判决书第2页最后一段）

第一、如果以2011年12月份、2012年1月17日、2012年1月20日被告人在会理城北小广场、城门洞附近散发“法轮功”宣传品来指控被告人传播了所谓邪教宣传品，则该宣传品具体内容不清楚，没有物证，法轮功信众庞大，社会上存在的法轮功宣传品不能排除另有他人散发。整个案卷中没有任何物证，相关物证也未在一审庭审中出示并经开庭质证。没有证据证明吴从美制作、传播了所谓邪教宣传品。控方没有提出其传播、散发邪教宣传品的基本证据。（1）吴从美作为法轮功练习者自己因练功学习需要持有一些法轮功方面资料，没有证据证明其所持所有资料具有宣传用途。并且其持有的所谓邪教宣传品制作源不清楚，被告人及市面流传的法轮功宣传品来源不清楚，如果指控被告人制作宣传品就应提供电脑中的模本（电子文档）等源文件，并且应当将源文件与被制作文件进行比对吻合。（2）没有证据证明被传播的所谓邪教宣传品是否与吴从美持有的法轮功相关资料相一致，法轮功资料也并非等于邪教宣传品。（3）整个案卷中缺乏合法的鉴定结论，未能认定吴从美传播甚至持有的物品中哪些内容涉及到邪教宣传品，致使证据链严重缺失。

第二、如果以吴从美在其住所持有或藏有法轮功资料指控被告人，则不能构成犯罪，两高司法解释中没有任何一条一款规定家中“持有”或“藏有”法轮功书刊或宣传资料的构成犯罪。

第三、本案的合法来源不清楚，公安机关是如何获取案件的语焉不详？本案只有笼统的指控，没有具体的指控，仅仅因为吴从美是法轮功练习者，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规定，采取歧视性的办案方式，将她本人及家庭的一切都当作犯罪证据进行有罪推定，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除了言辞证据外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似乎一审办案机关认为此类案件没有必要提供证据）。而扣押物品清单也未经当事人清点、确认、签字，讯问笔录当事人一概否认，书证由县维稳办主任张勇作见证人。并且言辞证据基本是笼统指认并不明确清楚，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在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上属于明显不能单独定罪的情形。完全是强加于人，先抓人再罗织犯罪事实倒果为因。

第四、本案因为一些言辞证据得出所谓犯罪事实，采取主观猜测推断方式作出轻率的结论。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剥夺律师阅卷权、不公开审理、不出示物证，妄图掩盖本案制造案件、作伪证的种种行径。



综上，这个案子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拼凑的案子、制造的案件，先抓人，再挖证据，当事人吴从美被非法拘禁近十个月之久，结果不甚理想。吴从美因个人信仰被抓，把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彻底摧毁，浪费了巨大的司法资源，把无辜的百姓当做了人血馒头。过去一个时期里，吴从美多次被非法抓捕，非法迫害。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办案机关应该明确本案关于吴从美的焦点就是在其家中搜查到一些法轮功资料仅此而已。这是本案关于吴从美的基本事实，离开这些基本事实处理被告人就是欲加之罪，是把本案政治化是别有用心，对谁都没有好处。这类案子我发现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办案机关一旦抓捕了当事人往往容易把案件渲染的比较严重一些，甚至制造一些证据一些情节将案件政治化，期间常常出现一些人治思维，如果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对法轮功追究刑事责任、不判罪、不严厉处罚就是不讲政治、不爱国、不忠于我们的政府，最终往往被告人容易被进行有罪处理。

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适用我们的法律，是以无妄的政治意识把无辜的百姓当做了人血馒头制造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案件，摧毁了一个家庭，浪费巨大的司法资源；还是真切的贯彻法律的正当意志，疑罪从无，无罪推定，无论证据上还是法律解释、适用上贯彻刑事司法疑点利益归被告人的逻辑规则，还有《刑法》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明确规定（《刑法》第13条）？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上有如此多的依据足以导致对吴从美作出无罪的结论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我们如何贯彻实行？毋庸置疑，保障人权理应作为法律的首要价值取向，也只有一个将保障人权放在重要位置的政权才能持久稳定并有希望。

第五、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到目前为止也不存在一个认定邪教组织的法律依据和相关标准。与此同时，我国《宪法》却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36条）。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表达、文化研究创作交流等各项基本权利。《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刑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公法部门，是对自由的被迫约束也是维持社会秩序最严厉、最极限的选择，它绝不可以成为少数不法官员完成“假想的政治任务”达到个别目的的工具！无辜的百姓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某些人用来换取利益和权力的人血馒头！

在庄严的法庭面前，本辩护人想强调的是：制定法律的惟一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建立法庭的最终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所以法庭判案最终必须以正义为依归。法官需要的就是对正义、是非的判断，所以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法庭判案就是凭借人的良知，良知既是法律的最高准则，也是判案的最终方法。我们的法官要倾听内心的召唤听从自己的良知，毅然决然的作出选择，不为违法行为背书、不为历史

的债务买单。

大家都知道，国家机器无意识。从我们这个国家建立的第一天起，违法意志与合法意志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存在，国家的正当意志、社会的法治不是靠恩赐得来的，就是要靠每一个人用实践的勇气奉献的精神换来。法官、检察官在当前这个社会转型时期肩负着重大责任，在办案的过程中，有必要深入了解这些事实，有必要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作为一个具体人的这个被告人，我的当事人吴从美，一位年届七旬白发苍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婆婆，她淳朴善良，因信仰法轮功，面对肆意剥夺其信仰权利甚至对这一群体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压侵害，她的不平抗争应是作为一个人来讲的正常反应。并且她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我的当事人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不适当的行为，比如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报复社会破坏社会秩序、采用暴力等手段对抗政府进行过激违法犯罪行为等现象，我的当事人和她的家属，还愿意找律师辩护，对我们的司法机关、人民法院还寄予了希望和信赖、对法律还有着某种信任对人性和良知也有期待。如果非要说明我的当事人有罪那只有“腹诽”“言论犯罪”“思想犯罪”、“表达犯罪”了。很明显，我的当事人不是一个侵犯者而是一个受害人，对此我们不能抱有偏见。

当前我们这个社会的冤案堆积如山，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我们的司法机关承担着异常艰巨的责任，这个责任每个人都应担当，从今日始，如果本案能够作出一个无罪的判决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积极意义：第一、承担人民法院肩负的神圣职责。第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使得办案机关甚至意图将案件政治化的机关、个人不会背上历史的债务。第四、真正爱国维护依法治国的大局，让我们的社会从此开启和解之路，最终建立法治和平民主转型，开创真正和谐具有建设性的一个美好未来。在此我愿意将温家宝总理一段话送给我们的法官、检察官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本辩护人坚信，以刑事司法的方式对信仰者进行打压、迫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即将掀过，它违背天理、国法、公道、人心。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当事人采取非法羁押、刑事处罚，相关责任人都已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非法拘禁、制造伪证、徇私枉法、枉法追诉、枉法裁判以及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等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信仰者的信仰自由，对待法轮功问题采取和解立场才是明智的选择是大势所趋，违背历史潮流将会造成更大的人道灾难、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

**【第二部分】从犯罪构成上，被告人的罪名不能成立。**

### 一、被告人主观上没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故意。

被告人吴从美习练法轮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和提高心性，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其持有法轮功宣传资料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故意。

### 二、被告人客观上也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

信仰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思想领域的事。而人的思想是不能构成犯罪的，只有人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要求主客观相统一，不但主观上要有故意或过失，而且客观上要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不管一个人信仰什么，只要她在客观上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不能对信仰者定罪量刑。而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客观上并没有实施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实施的行为。

- 1、没有被告人吴从美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据。被告人究竟利用了哪个邪教组织，它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它的机构、成员、职能人员、管理形式等等都是什么？这个组织的住所地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吴从美是这个组织的什么官职？有什么能力可以利用该组织？谁听她的？她下的什么命令？怎么利用的？她有没有从该组织处接受过指令或资助等等？公诉人在法庭上并没有出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
- 2、没有被告人吴从美破坏任何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实施的证据。在庭审中，公诉人并没有指出吴从美的行为究竟导致了哪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全部或一部分不能在实际中应用或施行。

### 三、从犯罪构成的客体来看

关于《刑法》第 300 条。《刑法》第 300 条规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 300 条第一款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刑法》300 条第一款成立的要件有两点：第一点，必须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必须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二者缺一不可。

从第一点来看，1999 年民政部发了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的文件，但从法律上来看，非法组织并不等同于邪教组织，非法组织可以是不符合社团登记要件的团体都可以称之为非法组织。2000 年公安部发布了认定十四种邪教的文件唯独没有法轮功姑且不论行政机关是否具有认定邪教的法律权力。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 1999 年 10 月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公开宣称法轮功是邪教，紧接着 1999 年 10 月 30 日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 1999 年 11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再次把法轮功和邪教组织联系起来。辩护人认为，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内部通知更不能作为定案的法律依据。而且我们要问：江泽民的讲话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认定？是谁赋予他们认定一个修炼团体是不是邪教的权力？是否向被认定对象进行了告知？是否举行了听证？是否允许被认定对象申辩？如果允许申辩，具体程序是什么？由哪个机构受理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无论是国家领导人也好，还是国家权力机构也好，其权力的来源及合法性只能是《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赋予国家元首和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一个组织是否是邪教组织的权力，因此，无论是江泽民的讲话也好，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也好，都没有合法的授权，因此是无效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至于 1999 年 10 月 30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辩护人认为，这个决定虽然没有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但由于它直接违背了《宪法》第 36 条的“信仰自由”条款，因此是违宪的，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予以废除。

辩护人还认为，政教分离是一项通行的国际准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公认的普世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宗教组织不得干涉其信徒的政治信仰，同样，国家也不得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因此任何国家机关不得以任何手段强制被告人不信仰法轮功。同时由国家权力机关来认定法轮功是不是邪教，更是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粗暴干涉和践踏人权的行。我国《刑法》第 251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司法机关以“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打压、迫害、构陷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构成《刑法》第 251 条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事实上，法轮功只是一个松散的修炼群体，没有任何组织形态，更不是所谓的“邪教组织”，谁爱练就练，不爱练就不练，来去自由。因此，法轮功并不等于邪教，更不等于邪教组织，被告人修炼法轮功并不是“利用邪教组织”活动。

从第二点来看，本罪名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

“组织和利用”只是犯罪工具、手段和方法。所谓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是指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际施行或实际应用。所谓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它与我们通常说的违反法律或触犯法条是有本质区别的。违反法律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即违法，触犯法条是指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即犯罪，但无论是违法也好，犯罪也好，其本身并不能导致某部法律或行政法规不能被应用或被施行，而恰恰是法律的应用或实施的结果。而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则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导致某部法律或行政法规整部或部分不能在实际中应用或施行，这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能力的，有这种能力的人只能是拥有国家公权力的人。在本案中，被告人吴从美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一个普普通通的法轮功修炼者，她有什么能力或者权力能导致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全部或部分不能在实际中应用或施行呢？而且今天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没有相关证据证实被告人是如何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际施行或应用、以及破坏了哪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全部或部分的实际施行或应用。

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既没有利用邪教组织，也没有破坏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被告人的行为没有触犯《刑法》第 300 条第一款。

#### 四、从社会危害性来看。

- 1、从客观后果来看，从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来看，被告人吴从美家中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既没有在国际上引进轰动，也没有在国内造成任何影响。
- 2、从主观恶性来看，被告人是没有主观恶性的。被告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轮功修炼者，她一心想的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
- 3、从手段上看，被告人所采用的手段也是和平的方式，是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同时也没有侵犯任何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更没有损害公共利益，可以说没有丝毫的社会危害性。
- 4、从被告人及法轮功信仰者持有的一些资料的内容来看，即使这些物品被传播了也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这些物品大致涉及到三方面内容：第一、出世的意识形态理论、超验的世界观主张，在法轮功信仰者看来，这个世界分多个层次，多层空间世界由神佛主宰。这些信仰层面的问题人生观的问题由人自己选择对现实社会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对他们多年来因信仰遭受的不公、被妖魔化加以澄清披露，比如一些法轮功信仰者和一些媒体认为天安门自焚是制造出来的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法轮功习练者是好人而不是什么邪教组织等等，这些内容也不可能对社会有丝毫的

危害性。第三部分，无外乎涉及到对执政党、政府的一些谩骂、批评、一些历史评价，首先这些批评、谩骂为何发生有没有值得反思警醒的地方是其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次这些谩骂、批评、评价客观不客观对不对暂且不论，尽管本辩护人反对极端的情绪化的言论，但即使是极端的谩骂、批评也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而对于本案本辩护人要在此见证的是：

吴从美仅仅因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不可能构成犯罪！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我们的法治事业将丧失尊严！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我们的国家将难以长治久安！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恐怕若干年后这个荒谬的历史会让我们的后代难以理解！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则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私、疯狂、急功近利，有人不择手段用人血馒头邀功请赏有人却懦弱、麻木、冷血、亵渎责任！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无疑将对当事人的家庭造成持久的伤痛和灾难，当事人的丈夫、儿女、兄弟姐妹……又将为此从无尽的黄昏守候到黎明。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它在低估我们的检察官、法官、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智商的同时也羞辱了我们的良知、责任与勇气！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人类的良知、天理、人道、国法的底线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打着各种神圣名义的罪行将得以大行其道！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将会让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违法意志与合法意志的较量丧失斗志，让正当的国家意志得以伸张之日遥遥无期！

**辩护人：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谢燕益**

2013-03-28

~~~~~⊙⊙~~~~~

吴从美案举报控告专函

谢燕益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谢燕益，北京市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我的联系电话是：010-6907-1509，手机：135-2023-2026。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3号蓝堡国际中心1座1106室
邮 编：100026

我作为李令、刘合什布、杨鲁坡等涉嫌渎职犯罪一案之控告人，认为在本控告人受当事人吴从美及其家属委托担任其辩护人期间，了解到有关方面肆意违法、践踏刑事诉讼制度，明知当事人无辜，故意制造冤狱，致使当事人吴从美被非法拘禁至今长达十个月之久。有关方面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之行径已构成枉法追诉、枉法裁判等渎职犯罪造成重大冤假错案。其行径对当事人及其家属造成严重伤害，对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构成极大危害、情节十分严重，不依法严惩不足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不足以挽回国家司法机关、人民政府的政治声誉及执政形象；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对下列人员提出举报控告：

| 被控告人
(犯罪嫌疑人) | 职务 |
|-----------------|--------------|
| 李 令 | 四川省会理县公安局局长 |
| 刘合什布 | 四川省会理县检察院检察长 |
| 杨鲁坡 | 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院长 |
| 邱 云 | 四川省会理县法院刑庭法官 |
| 计兴快 | 四川省会理县法院刑庭法官 |
| 杨元宗 | 四川省会理县法院刑庭法官 |
| 王方运 | 四川省会理县检察院检察官 |
| 沙晓刚 | 四川省会理县检察院检察官 |

| | |
|-----|-------------|
| 张 勇 | 四川省会理县维稳办主任 |
| 王紫发 | 四川省会理县公安局干警 |
| 庄明青 | 四川省会理县公安局干警 |
| 文达明 | 四川省会理县公安局干警 |
| 黄丽萍 | 四川省会理县公安局干警 |
| 朱天国 | 四川省会理县公安局干警 |

提出对以上相关责任人的控告，是基于控告人相信，国家机器无意识，国家的正当意志不是靠上天恩赐而来的，也不是任何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能够决定的，而是，要通过体制内外坚守天理、国法的良知正义力量历经艰苦卓绝的努力，用合法意志战胜违法意志得来的。每一个人民警察、检察官、法官、政府工作人员；每一个律师、记者、教师、社会公民，哪怕地位再卑微，力量再弱小，只要愿意付出一份努力，愿意改变个人违法意志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历史与现状，并且相信未来中国，公民意志一定能够战胜专制意志，愿意看到因法治中国的早日到来，自己及家人、子孙后代的合法权利能够得到持久的保障，改变没有法治保障，大家都是“弱势群体”的现状。并且愿意看到，国家因公民意志愈加觉醒、法治精神日益彰显而得以真正强大。通过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合法意志与违法意志的较量，最终使法治中国的梦想早日实现！由于上述信念，控告人在自己当事人身陷囹圄之时，此前多次被非法拘禁、非法迫害、非法劳教，而今又被非法抓捕、非法拘禁十个月并且被枉法裁判有期徒刑。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法律权威，为求真正的减少社会对抗，为求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面对强权恣意妄为，控告人别无选择，只有穷尽法律手段对滥用权力者、违法渎职者追究到底，让其付出必要的违法代价，控告人坚信，只有让作恶者付出代价，良善才不会死亡！这个社会才有希望。

控告人希望通过控告追诉的努力，让违法者欲将人为制造的案件政治化的企图大白于天下；让更广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公众知晓当事人吴从美这样一位年近七旬、白发苍苍、手无缚鸡之力朴实善良的普通农村妇女，仅仅因其个人信仰（吴从美是法轮功信仰者）多次被非法拘禁非法劳教非法迫害的事实，这场残害百姓、惨无人道的游戏仍在继续进行当中。控告人认为，对包括吴从美在内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其坚持信仰就进行劳教、判刑等种种迫害做法都是违宪违法的行径，这种行径、这场运动是由于个别人的错误导致的，根据《宪法》、党章可知，这种做法根本不是执政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而是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反法治、反党、反国家、反人类的行为，实施这种倒行逆施行径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地位多高？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家敌人！这一行径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社会混乱、国家分裂，它违背天理、国法、公道、人心，最终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历史的公审；控告人希望更广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公众

明白，手中掌握权力者一旦违法，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将为祸甚重，希望掌握权力者能够引以为戒，审慎严格依法办事，善用手中权力。让胆敢将司法、行政权力当作侵害公民权利、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之违法者们明白，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达到个人目的、制造冤狱的伎俩不能得逞，将普通百姓当作人血馒头的罪恶行径一定会付出代价受到严惩！

本控告人介入吴从美涉嫌破坏法律实施一案二审程序后，通过会见当事人、查看案卷材料发现本案完全是人为制造的案件、拼凑的案件，先抓人再挖证据，倒果为因，严重违反法律程序。最终本案历经一审审判没有任何物证，吴从美家中持有的物品与指控的所谓犯罪事实也没有任何关联性，办案机关强加罪名、罗织事实，没有具体的指控只有笼统指控，其手段拙劣行径卑劣令人发指！仅仅因为吴从美是法轮功练习者在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以破坏法律实施这一错误的罪名构陷当事人（关于吴从美无罪冤屈的详细法律意见请见附件《对法轮功学员吴从美被判冤狱的法律抗议书》）。

上述被告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理应知晓，以《刑法》300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追诉定罪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述被告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理应知晓本案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上述被告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理应知晓，吴从美及所有法轮功学员都是无辜的，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在遭受异常的打压迫害的情形发生以后为了生命、生存与尊严被迫的申冤与抗争，法轮功学员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社会危害性，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及权利完全受到《宪法》法律上的保护；上述被告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理应知晓，我们国家、执政党内部一直以来存在一股反法治、反党、反国家、反社会、反人类的封建专制残余、腐败特权分子为了达到个人非法目的、非法利益不惜镇压群众、迫害人民不管其以什么样的名义；上述被告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理应知晓，一个国家，合法意志与违法意志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存在，作为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对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个别人残害百姓、倒行逆施的行径不仅不应该配合、执行、纵容而且有义务、有责任坚决与各种错误意志、违法行为作斗争，以捍卫国家的正当意志、执政党的正当意志，坚持原则，不跟反法治、反党、反国家、反人类的恶行站在一起，对侵害群众利益的种种恶行必须坚决予以反对作不屈不挠的抗争；上述被告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理应知晓，《宪法》法律的明确规定、以及文革结束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决议，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是非黑白、善恶对错、天理良知的底线，什么是正当的国家意志？什么是违法的个人意志？如何做才更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执政党；上述被告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理应知晓，为了自己的权位、利益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制造冤狱、迫害无辜必将遭到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公审、法律的严惩；上述被告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理应知晓，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是如何告别蒙昧、争斗、暴力、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进步的。

控告人认为，本案的发生并非偶然事件。通常来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会知法犯法。产生如此强烈的违法意志不惜公然违法，往往只有为了更大的非法目的或掩盖更严重的错误罪责才可能发生，对此希望受诉机关进一步调查了解本案发生的全部事实真相。

鉴于，李令作为吴从美一案侦查机关领导，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明知吴从美的无辜却滥用职权故意制造冤狱，造成当事人吴从美被非法拘禁并遭枉法裁判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李令作为单位负责人明知违法情形仍签署拘留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一系列文件，这些罪证足以证明其主观恶性及客观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97 条、399 条、第 238 条之规定，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枉法追诉罪、非法拘禁罪。

鉴于，刘合什布领导的检察机关发生对吴从美枉法追诉造成吴从美被非法逮捕、非法拘禁并遭枉法裁判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刘合什布作为单位负责人明知违法情形的发生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97 条、399 条、第 238 条之规定，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枉法追诉罪、非法拘禁罪。

鉴于，杨鲁坡领导的人民法院发生对吴从美枉法裁判一案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杨鲁坡作为单位负责人明知违法情形的发生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97 条之规定，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鉴于，邱云作为吴从美枉法裁判一案的审判长无论对本案枉法裁判本身当事人被非法羁押的事实还是剥夺当事人上诉权恶意压案，当事人上诉后不依法向二审法院移交案卷导致当事人被超期羁押二者均构成非法拘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99 条、第 238 条之规定，已构成枉法裁判罪、非法拘禁罪，对枉法裁判负有主要责任。

鉴于，计兴快、杨元宗作为吴从美枉法裁判一案的合议庭成员，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明知吴从美的无辜却做出有罪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99 条、第 238 条之规定，已构成非法拘禁罪、枉法裁判罪。

鉴于，王方运、沙晓刚作为吴从美枉法裁判一案的公诉人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明知吴从美的无辜却枉法起诉导致当事人被枉法裁判的恶劣后果，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枉法追诉罪、非法拘禁罪。

鉴于，张勇作为会理县维稳办主任，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明知吴从美的无辜，却作为见证人故意做伪证

导致无罪的人被枉法裁判，结合其特殊身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99 条、第 305 条之规定，已构成徇私枉法罪、伪证罪。

鉴于，王紫发、庄明青、文达明、黄丽萍、朱天国作为吴从美枉法裁判一案中侦查机关的办案干警，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据明知吴从美的无辜，却制造事实、制造证据、牵强附会，致使无罪的人受到枉法裁判被长时间非法拘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99 条、第 305 条、第 238 条之规定，构成枉法追诉、伪证及非法拘禁罪。

上述被告人明知上级个别人的违法命令但出于对个人地位、利益的考量，不能坚持原则，公然配合违法，依据人民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公务员法之规定具有明显的徇私枉法情节。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51 条上述被告人同时构成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罪。

本案是否另有同案犯，请受诉机关查清事实一并惩处。

综上所述，被告人认为，吴从美一案中出现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枉法追诉、非法拘禁、枉法裁判、非法剥夺宗教信仰种种违法犯罪情形并非就是国家机关的行为，而是少数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违法官员为达到其非法目的而滥用权力的个人行为。被告人始终坚信，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司法工作人员都愿意坚持法治与正义。通过受诉机关以及相关领导的努力一定能够将少数害群之马绳之于法，使个人责任与国家机关、人民政府的责任得以区分，使个别人之违法犯罪行为不由政府背黑锅买单。让人们充分了解，个别人的犯罪违法并非就等同于政府犯罪违法，政府不但不会包庇、纵容之而且必将严惩之，以使政府声誉、国家利益真正得以维护，以使中国社会的断裂和扭曲，尤其近年来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所造成的创伤能够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得到平复和医治！

此致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紧急报案举报控告人：谢燕益

2013 年 3 月 28 日

~~~~~⊙⊙~~~~~

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51 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 305 条：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397 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 399 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 238 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 234 条、第 232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附】《对法轮功学员吴从美被判冤狱的法律抗议书》  
及相关证据材料

~~~~~⊙⊙~~~~~

谢燕益简介

谢燕益提供

◆谢燕益，男，1975 年 3 月 20 日出生，笔名梁不正，祖籍广东电白。

◆作为北京人权律师，一直热心关注民权、民生为弱势群体鼓与呼，代理了诸多维权案件。

◆2005 年以来，在互联网先后发表

- ◇《社团的使命》、
- ◇《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
- ◇《市场政治论》、
- ◇《法治死亡论！》、
- ◇《中国十大反法之治》、
- ◇《政改破题——人大代表直选》、
- ◇《用 100 字揭开马克思主义的谬误！》、
- ◇《中国正在揭开土地兼并的大幕！》、
- ◇《美元加速贬值或将促进中国变革》

等文章痛陈时弊、主张变革而引发热评。

◆2003 年提起《宪政第一诉》起诉时任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不顾民意违反《宪法》利用等额选举方式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2008 年发表《和平民主运动研究》，积极推广和平民主文化倡导和平民主事业。

◆多年以来，谢燕益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向国家有关方面提出数十件法律建议案、倡议、公民意见以及公益诉讼案，其发起的旨在废止劳教制度的民间劳教纪念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法草案》立法建议及控告绿坝软件侵害公民信息权利案引人关注对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采访或报道过其人其事的媒体有：

- 《新京报》、《晨报》、《中国知识产权报》、
- 《中国财富》杂志、《南方都市报》、《凤凰网》、
- 《财经网》、《大公报》、《明报》、《竞报》、法新社、
- 香港有线电视、法国 24 电视台、英国天空电视台、中央社、

路透社、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希望之声、
《联合早报》、《中国商标评审网》、《东方律师网》、
《环球时报》、《博讯网》、《金融时报》、
《澳大利亚人报》、《南华早报》、德国之声、
《工人日报》、《新华网》、北京电视台等媒体。

谢燕益：信仰无罪-法轮功学员张建平二 审辩护词

张建平无罪辩护词

——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 谢燕益

对待法轮功问题采取和解立场才是明智的选择是大势所趋，违背历史潮流将会带来更大的人道灾难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



北京正义律师谢燕益

合议庭的各位法官：

你们好！

我是北京市凯泰律师事务所谢燕益律师，作为张建平的辩护人通过对本案的证据、事实、相关法律进行分析，认为对张建平涉嫌破坏法律实施一案，贵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对张建平作出无罪判决。

这里有几个案例我先介绍一下：

2008 年 10 月，湖南怀化，法轮功学员唐开菊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向爱梅、唐芳菊也分别被判缓刑三年。

2009 年 7 月，湖北黄石法轮功学员熊凤莲被黄石中级法院判处缓刑。

2009 年 2 月，沈阳皇姑区法院四位法轮功学员蔺怀宇、赵国良、蔡宗斌、刘桂凤被判免于刑事处罚。

判缓刑的案例还有上海金山区法院陆彩华、张红梅、葛肖天等案例。

2010 年 5 月福建福州仓山区法院判决法轮功学员叶巧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这个案子之所以要判缓刑主要原因是由于办案机关制造案件、制造证据被律师揭穿所以不得不放人，当事人叶巧明出狱后提出上诉并对相关责任人提出了投诉控告追究其法律责任。

2010 年 7 月广州市民孔宇洁、李冠平被天河区公安局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抓捕，从辩护律师陈武权处获得证实，2011 年 1 月 19 日下午孔已经被无罪释放。

2010 年 11 月，辽宁本溪司法机关对一名法轮功学员刑事拘留一个月后最终改为劳动教养所外执行。

2011 年 7 月，南京司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马振宇刑事羁押一个月后改为劳教处理。

2009 年 1 月，中国社科院对法轮功问题进行了研讨，体制内理论界对法轮功的理论探讨从此走出禁区。

虽然上述对法轮功学员的处理仍不免冤假错案，但近年来“法轮功”案件从普遍重判向轻判是个发展趋势，并且在本案审判之前各地出现诸多法轮功案件审而不判、发回重审、判缓刑、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做出其他处理的范例。

第一部分 从价值理念和法律适用及证据上看被告人无罪。

首先，张建平作为法轮功练习者，学习研究法轮功书籍理论，关注涉及到法轮功的一些信息动态，这是他的个人权利。既然是法轮功信仰者即使他向别人传播交流其价值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好比我们有的人相信天赋人权、愿意秉持诚信、善良、宽容理性的人生态度一样也总是愿意向他人传播交流自己的思想理念。人的信仰、价值观属于精神领域的事情不可以强制。思想观点却可以自由表达和交流，我国宪法和法律做出了明确规定，严格保障信仰自由、言论表达自由、学术创作研究自由等这些基本人权。通过学习总结宪法、法律以及国内、外的一些历史经验可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公民的表达自由只有在极特殊的

情形下才可以被限制，即煽动暴力并且这种煽动会产生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因此即便是比较极端的谩骂、攻击政府、针砭时政也都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

由于当前我国存在一些处理法轮功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虽然站在辩方的角度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的效力提出质疑，但就本案而言即便是按照上述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的规定，张建平也无法构成犯罪。

首先，一审判决书第7页最后一段称：“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建平、魏翔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其行为已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之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从语言逻辑上看“组织和利用”这显然是一个联言命题，如要构成本罪则必须既要组织又要利用两者同时具备才行，本案中既然一审对张建平及魏翔作出有罪判决，那末至多只是利用如何有组织可言呢？他们有这个组织能力吗？有组织行为这一事实吗？而他们组织起来的组织又在哪里呢？既然刑法三百条是一个联言命题那么，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犯罪，所以张建平因不存在组织行为所以就不构成刑法三百条规定的罪名，一审仅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一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判决被告人，属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其次，针对一审判决书确定的所谓犯罪事实：“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建平、魏翔在杭州市西湖区求是新村65幢505室内，通过境外网站‘明慧网’下载“法轮功”宣传资料并存储于U盘，后利用其单位的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制作“法轮功”宣传品800余份，并数次到公共场所进行张贴。”（见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

第一、如果一审以张建平散发10余份“法轮功”宣传单为由追究其刑责，因其未达到两高司法解释的数量要求而无法构成追责的法定条件。

第二、判决书第5页第10项“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照片，证实公安机关关于2010年11月29日对被告人张建平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求是新村65幢505室靠南侧房间的住处进行搜查，查扣疑似“法轮功”宣传品704份。”如果以此来指控被告人制作、传播所谓邪教宣传品则该宣传品具体内容不清楚，物证缺乏，相关物证未在一审庭审中出示并经开庭质证。扣押物品清单也未经当事人核实。没有证据证明张建平制作了所谓邪教宣传品。控方没有提出制作邪教宣传品的充足证据。1、张建平作为法轮功练习者自己因练功学习需要持有一些法轮功方面资料，没有证据证明其所持所有资料均具有宣传用途。并且其持有的所谓邪教宣传品制作源不清楚，如果指控被告人运用电脑制作就应提供电脑中的模本（电子文档），并且应当将源文件与被制作文件进行比对吻合。2、没有证据证明被传播的所谓邪教宣传品是否与张建平持有的法轮功相关资料相一致，法轮功资料也并非等于邪教宣传品。3、起诉案卷中缺乏合法的鉴定材料，认定邪教宣传品没有法律依据，鉴定机关不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属于自侦自鉴行为。综上这个案子本质来说就是一个制造的案件，先抓人，再挖证据，结果不甚理想。张建平因个人信仰被抓，

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彻底摧毁，浪费了巨大的司法资源，把无辜的百姓当做了人血馒头。

第三、张建平在其住所持有或藏有法轮功资料不构成犯罪，两高司法解释二其中没有任何一条一款规定家中“持有”或“藏有”法轮功书刊或宣传资料的构成本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宣扬邪教，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 处罚：（一）制作、传播邪教传单、图片、标语、报纸 3 0 0 份以上，书刊 1 0 0 册以上，光盘 1 0 0 张以上，录音、录像带 1 0 0 盒以上的；另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制作、传播两种以上邪教宣传品，同一种类的应当累计计算，不同种类 的不能换算，也不能累计计算。即便一审判决书中所列“从其住处查扣疑似“法轮功”宣传品 704 份是事实，那么，这 704 份是否属同一种类？有多少是制作的 又有多少属其他途径获得以及所谓宣传单的内容及用途均需要甄别确定。

我们的办案机关应该明确本案关于张建平的焦点就是其张贴了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仅此而已。这是本案关于张建平的基本事实，离开这些基本事实 处理被告人就是欲加之罪，是把本案政治化是别有用心的，对谁都没有好处。这类案子我发现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办案机关一旦抓捕了当事人往往容易把案件渲染的比 较严重一些，甚至制造一些证据一些情节将案件政治化，期间常常出现一些人治思维，如果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对法轮功追究刑事责任、不判罪、不严厉处罚就是不 讲政治、不爱国、不忠于我们的政府，最终往往被告人容易被进行有罪处理。

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适用我们的法律，是以无妄的政治意识把无辜的百姓当做了人血馒头制造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案件，摧 毁了一个家庭，浪费巨大的司法资源；还是真切的贯彻法律的正当意志，疑罪从无，无罪推定，无论证据上还是法律解释、适用上贯彻刑事司法疑点利益归被告人的 逻辑规则，还有刑法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的明确规定（刑法第十三条）？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上有如此多的依据足以导致对张建平作出无罪的结论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我们如何贯彻实 行？毋庸置疑，保障人权理应作为法律的首要价值取向，也只有一个将保障人权放在重要位置的政权才能持久稳定并有希望。

第四、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到目前为止也不存在一个认定邪教组织的法律依据和相关标准。与此同时，我国宪法却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三十六条）。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表达、文化研究创作交流等各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刑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公法部门，是对自由的被迫约束也是维持社会秩序最严厉、

最极限的选择，它绝不可以成为少数不法官员完成“假想的政治任务”达到个别目的的工具！无辜的百姓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某些人用来换取利益和权力的人血馒头！

在庄严的法庭面前，本辩护人想强调的是：制定法律的惟一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建立法庭的最终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所以法庭判案最终必须以正义为依归。法官需要的就是对正义、是非的判断，所以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法庭判案就是凭借人的良知，良知既是法律的最高准则，也是判案的最终方法。我们的法官要倾听内心的召唤听从自己的良知，毅然决然的作出选择，不为违法行为背书、不为历史的债务买单。

大家都知道，国家机器无意识。从我们这个国家建立的第一天起，违法意志与合法意志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存在，国家的正当意志、社会的法治不是靠恩赐得来的，就是要靠每一个人用实践的勇敢奉献的精神换来。法官、检察官在当前这个社会转型时期肩负着重大责任，在办案的过程中，有必要深入了解这些事实，有必要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作为一个具体人的这个被告人，我的当事人因信仰法轮功，面对肆意剥夺其信仰权利甚至对这一群体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压侵害，他的不平和抗争应是作为一个人来讲的正常反应。并且他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我的当事人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不适当的行为，比如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报复社会破坏社会秩序、采用暴力等手段对抗政府进行过激违法犯罪行为等现象，我的当事人和他的家属，还愿意找律师辩护，对我们的司法机关、人民法院还寄予了希望和信赖、对法律还有着某种信任对人性和良知也有期待。如果非要说我的当事人有罪那只有“腹诽”“言论犯罪”“思想犯罪”、“表达犯罪”了。很明显，我的当事人不是一个侵犯者而是一个受害人，对此我们不能抱有偏见。

当前我们这个社会的冤案堆积如山，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我们的司法机关承担着异常艰巨的责任，这个责任每个人都应担当，从今日始，如果本案能够作出一个无罪的判决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积极意义：第一、承担人民法院肩负的神圣职责。第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使得办案机关甚至意图将案件政治化的机关、个人不会背上历史的债务。第四、真正爱国维护依法治国的大局，让我们的社会从此开启和解之路，最终建立法治和平民主转型，开创真正和谐具有建设性的一个美好未来。在此我愿意将温家宝总理一段话送给我们的法官、检察官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本辩护人坚信，以刑事司法的方式对信仰者进行打压、迫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即将掀过，它是违背天理、国法、公道、人心的。学会尊重信仰者的信仰自由，对待法轮功问题采取和解立场才是明智的选择是大势所趋，违背历史潮流将会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

第二部分 从犯罪构成上，被告人的罪名不能成立。

一、被告人主观上没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故意。

被告人张建平习练法轮功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和提高心性，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其持有法轮功宣传资料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故意。

二、被告人客观上也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

信仰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思想领域的事。而人的思想是不能构成犯罪的，只有人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要求主客观相统一，不但主观上要有故意或过失，而且客观上要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不管一个人信仰什么，只要他在客观上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不能对信仰者定罪 量刑。而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客观上并没有实施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实施的行为。

1、没有被告人张建平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据。被告人究竟利用了哪个邪教组织，它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它的机构、成员、职能人员、管理形式等等 都是什么？这个组织的住所地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张建平是这个组织的什么官职？有什么能力可以利用该组织？谁听他的？他下的什么命令？怎么利用的？他有没有 从该组织处接受过指令或资助等等？公诉人在法庭上并没有出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

2、没有被告人张建平破坏任何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实施的证据。在庭审中，公诉人并没有指出张建平的行为究竟导致了哪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全部或部分不能在实际中应用或施行。

三、从犯罪构成的客体来看

关于《刑法》第三百条。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的 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刑法三百条第一款成立的要件有两点：第一点，必须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必须是破 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二者缺一不可。

从第一点来看，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 1999 年 10 月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公开宣称法轮功是邪教，紧接着 1999 年 10 月 30 日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 1999 年 11 月 5 日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再次把法轮功和邪教组织联系起来。辩护人认为，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内部通知更不能作为定案的法律依据。而且我们要问：江泽民的讲话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认定？是谁赋予他们认定一个修炼团体是不 是邪教的权力？是否向被认定对象进行了告知？是否举行了听证？是否允许被认定对象申辩？如果允许申辩，具体程序是什么？由哪个机构受理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

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无论是国家领导人也好，还是国家权力机构也好，其权力的来源及合法性只能是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赋予国家元首和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一个组织是否是邪教组织的权力，因此，无论是江泽民的讲话也好，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也好，都没有合法的授权，因此是无效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至于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辩护人认为，这个决定虽然没有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但由于它直接违背了《宪法》第36条的“信仰自由”条款，因此是违宪的，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予以废除。

辩护人还认为，政教分离是一项通行的国际准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公认的普世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宗教组织不得干涉其信徒的政治信仰，同样，国家也不得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因此任何国家机关不得以任何手段强制被告人不信仰法轮功。同时由国家权力机关来认定法轮功是不是邪教，更是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粗暴干涉和践踏人权的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司法机关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打压、迫害、构陷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构成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事实上，法轮功只是一个松散的修炼群体，没有任何组织形态，更不是所谓的“邪教组织”，谁爱练就练，不爱练就不练，来去自由。因此，法轮功并不等于邪教，更不等于邪教组织，被告人修炼法轮功并不是“利用邪教组织”活动。

从第二点来看，本罪名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组织和利用”只是犯罪工具、手段和方法。所谓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是指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际施行或实际应用。所谓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它与我们通常说的违反法律或触犯法条是有本质区别的。违反法律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即违法，触犯法条是指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即犯罪，但无论是违法也好，犯罪也好，其本身并不能导致某部法律或行政法规不能被应用或被施行，而恰恰是法律的应用或实施的结果。而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则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导致某部法律或行政法规全部或部分不能在实际中应用或施行，这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能力的，有这种能力的人只能是拥有国家公权力的人。在本案中，被告人张建平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一个普普通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有什么能力或者权力能导致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全部或部分不能在实际中应用或施行呢？而且今天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没有相关证据证实被告人是如何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际施行或应用、以及破坏了哪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全部或部分的实际施行或应用。

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既没有利用邪教组织，也没有破坏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被告人的行为没有触犯《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

四、从社会危害性来看。

1、从客观后果来看，从公诉人在一审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来看，被告人张建平家中持有一些法轮功资料，既没有在国际上引进轰动，也没有在国内造成任何影响。

2、从主观恶性来看，被告人是没有主观恶性的。被告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一心想的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是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

3、从手段上看，被告人所采用的手段也是和平的方式，是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同时也没有侵犯任何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更没有损害公共利益，可以说没有丝毫的社会危害性。

而对于本案我要在此见证的是：

张建平仅仅因散发了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不可能构成犯罪！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散发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我们的法治事业将丧失尊严！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散发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我们的国家将难以长治久安！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散发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恐怕若干年后这个荒谬的历史会让我们的后代难以理解！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散发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则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私、疯狂、急功近利，有人不择手段用人血馒头邀功请赏有人却懦弱、麻木、冷血、亵渎责任！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散发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无疑将对当事人的家庭造成持久的伤痛和灾难，当事人的妻子、子女、父母。。。。。。又将为此从无尽的黄昏守候到黎明。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散发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它在低估我们的检察官、法官、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智商的同时也羞辱了我们的良知、责任与勇气！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散发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人类的良知、天理、人道、国法的底线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散发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打着各种神圣名义的罪行将得以大行其道！

如果本案最终仅仅因“散发 10 余份法轮功资料”就对当事人科以刑罚，将会让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违法意志与合法意志的较量丧失斗志，让正当的国家意志得以伸张之日遥遥无期！

辩护人：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 谢燕益

2011-7-25

联系电话：010-69085033；13520232026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3 号蓝堡国际中心 1106 室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

邮编：100026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 禁曲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 <http://bit.do/139>